富饶的贫困

VISIT…

富饶的贫困

——中国落后地区的经济考察

2 020 7865 1

王小强　白南风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六年·成都

责任编辑：耀　岚
封 面 图：朱　岩
插　　图：孙景波
题　　图：曹　力
装　　帧：盛寄萍

走向未来丛书

富饶的贫困

王小强　白南风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960mm 1/32 印张 8.5 插页 14 字数129千
1986年6月第一版　　1986年6月第一次印刷
书号：17118·157　　印数：1—35,000

定价：1.35元

编者献辞

《走向未来》丛书和读者见面了。

她凝聚着我们的心血和期望。

我们期待她能够展现当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日新月异的画卷，反映人类认识和改造客观的曲折道路，记录这一代人对祖国命运和人类未来的思考。

我们的时代是不寻常的。二十世纪科学技术革命正在迅速而实质性地改变着人类的社会生活和生存方式。人们迫切地感到，必须严肃认真地对待一个富有挑战性的、千变万化的未来。正是在这种历史关头，中华民族开始了自己悠久历史中又一次真正的复兴。

在艰苦而又富有生命力的改革道路上，我们坚定了马克思主义的信仰，理解了科学的价值，并通

G0289/39-06

步深化了对我们时代和民族的认识。今天，我们听从祖国的召唤，热情地投身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潮流。

马克思有一句名言："思想的闪电一旦真正射入这块没有触动过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人。"* 今天，照亮我们民族的思想闪电，就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精神和我们民族优秀传统的结合，以及由此开始的创新！

《走向未来》丛书力图从世界观高度把握当代科学的最新成就和特点，通过精选、咀嚼、消化了的各门学科的知识，使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能从整个人类文明曲折的发展和前途中，理解中华民族的伟大贡献和历史地位，科学地认识世界发展的趋势，激发对祖国、对民族的热爱和责任感。

她特别注重于科学的思想方法和新兴的边缘学科的介绍和应用，把当前我国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以及文学艺术方面创造性的成果，严肃地介绍给社会，推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结合。

《丛书》是个新的园地，她将自始至终贯彻严肃认真的学风和生动活泼的文风。

---

*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卷，第10页。

《走向未来》丛书，从她一开始就受到老一辈共产党人关怀，受到学术界前辈的热情支持。

约四百年前，弗兰西斯·培根在《伟大的复兴》一书序言中，曾经这样谈到书中描述的对象，他“希望人们不要把它看作一种意见，而要看作是一项事业，并相信我们在这里所做的不是为某一宗派或理论奠定基础，而是为人类的福祉和尊严……。”我们怀着真挚的感情，把这段话献给《丛书》的读者，希望广大读者关心她、批评她、帮助她。

让她成为我们共同的事业。

《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

一九八三年六月于北京

前　言

近年来，笔者从事了一些经济考察。也许是由于插队的生活经历，我们在调查研究中，对落后地区的群众生活、经济发展，始终怀有某种感情上的关注。如今，斗胆将一些模糊而浑沌的感受，提供给“走向未来”的青年朋友们。我们一直这样相信：未来是从现在开始的。

中国正在发生一场伟大的变革。研究落后地区开发的理论意义，已被一些同仁所洞见。《世界经济导报》的编者曾在拙作《贵州农村调查报告》的按语里，一针见血地指出：“从世界范围看，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一个重要竞争，就是人才与人的素质的竞争。从这个意义上讲，这篇文章不仅对边远落后地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就是对我国沿海发达地区同样有借鉴作用”。落后地区的放大，或许就是落后的中国；落后地区开发的问

题，或许也是中国改革和发展中的问题；对落后地区开发的理论概括，或许对中国的发展具有同样现实意义。这确实是我们注重研究落后地区的另一个出发点，可惜，没能成为这本小册子的落脚点。尽管我们将落后地区作为独立的社会—经济系统来对待；尽管我们在调查研究中参阅了发展经济学的有关文献；尽管我们在写作中为了能将自己似是而非的见解在理论上有所拔高而作了种种努力，但终于都失败了。我们面对着一个没有能力完成的任务。这里抛砖引玉，企望有更多学术素质更好的青年朋友，投入这项研究。

本书第一章，申明注重落后地区开发研究的重要性。第二章没有思想内容，只是突出落后地区一方面贫穷、一方面资源极为丰富的矛盾现实。第三章企图表明一个见解："落后"这一概念的本质规定，不是产值的低下，收入的微薄，而是人的素质差。第四章批评了依赖"外援"的传统模式和基础结构建设先行的传统观点，提出落后地区经济振兴的首要目标是调整社会经济关系。第五章要说的是落后地区城市国营系统（包括准国营、集体）率先改革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第六章里尝试着对落后地区主导产业选择，给出一个优先发展"信息含量

大”的产业部门的新规范。第七章将我们认为很值得研究又实在没有能力和精力研究的几个问题，作了一个提示性的排列。书中的某些章节不厌其烦地罗列了一些数字和图表，超过了说明问题的需要。目的是使青年朋友们更多地知道落后地区的现实情况。

除了要为全书的简陋向读者致歉外，还有几点需要说明。

第一，这本小册子的材料使用，只限于内蒙古、宁夏、新疆、西藏、广西五个少数民族自治区和云南、贵州、青海三个少数民族集中的省份。中国的“落后地区”，虽没有一个明确的界限，但显然并不止以上八个省区。在人们的印象中至少甘肃省以及陕西的陕北、山西的雁北、四川的川西北、安徽的皖北、湖南的湘西、江西的赣南、广东的海南等等，都是一般公认的落后地区。

第二，对五区三省的分析，主要着眼于落后地区的共同特征。有意忽略了不同区域明显的特殊性。

第三，为了分析的方便，在将落后地区作为独立的社会-经济系统时，对落后地区中的中央直属企业（包括农场、林场等）没有涉及。

第四，由于深入考察的区域有限，只好集中地使用了我们了解较多的贵州和西藏的材料。

以上几点局限，都越发使这本小册子不可避免会出现这样或那样以偏概全的现象。

由于我们重复调查很少，手头现有资料支离破碎、挂一漏万，需要借鉴他人的研究成果。凡属借用，除一般统计资料外，均注明引文出处。另外，我们自己的调查材料和一些感受，大多也是与其他同志一起工作的结果。1980年的甘肃、陕西调查，是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陆学艺同志共同进行的。1981年的安徽、山西调查，1982年的安徽、广西、广东、福建、江西、辽宁、山西调查，1983年的山西、江苏、浙江调查，是我们参加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的结果。1984年初的贵州调查，有该组孙方明、陈锡文、高山和王晓鲁同志同行。同年四个月的西藏考察，是在有关领导同志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调查中《人民日报》社农村部卢小飞同志、《经济日报》社农村部李东东同志协助我们做了大量工作。同年下半年的安徽、江西、浙江、山西、广东调查，也都是在有关部门领导下进行的。1985年上半年河南、广东（含海南）调查，是与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刁新申、中国经济体

制改革研究所李文英和中国人民大学杜荷同志一起去的。

调查中，各地有关党、政和实际部门的负责同志与工作人员的大力支持，是研究工作得以开展的先决条件。我们几年来得以参加一些调查研究工作，也是和北京有关领导部门的领导和一些老一辈学者的关怀、支持分不开的。特别是杜润生同志的支持、关心、理解、爱护更增添了我们的力量、勇气和信心。

在写作过程中，中共中央办公厅办公室孙方明同志、北京经济学院卢迈同志、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博士研究生曹远征同志分别将自己贵州、新疆、青海的调查材料无私地提供给我们利用。刁新申同志、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张少杰同志参加了一些讨论并提出过修改意见。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硕士研究生沈远远同志绘制了部分图表。

总之，这本小册子如果有幸为读者提供某些一得之见，也是集体劳动的结果。当然，凡属缺点和错误，完全由笔者负责。

作　者

一九八五年七月

《走向未来》丛书顾问

（按姓氏笔划为序）

严济慈　杜润生　张黎群　陈翰伯
侯外庐　钟沛璋　钱三强

《走向未来》丛书编辑委员会

主　编：包遵信
副主编：金观涛　唐若昕
编　委：（按姓氏笔划为序）

丁学良　王　焱　王小强　王岐山
王晓鲁　尹蓝天　包遵信　乐秀成
刘青峰　朱嘉明　朱熹豪　阮芳赋
严家其　何维凌　张　钢　陈子伶
陈越光　易小冶　金观涛　唐若昕
秦晓鹰　贾新民　翁永曦　陶德荣
黄江南　董秀玉　樊洪业　戴士和

目　录

第一章　贫富两极…… 1

1—1 “马太效应”…… 3

1—2 落后的制约…… 9

第二章　矛盾的现实…… 17

2—1 令人震惊的贫穷…… 22

2—2 令人震惊的富饶…… 27

第三章　落后的本质规定…… 37

3—1 不发达的发达…… 40

3—2 双向积极性…… 45

3—3 人的素质…… 52

3—4 社会发育…… 61

第四章　出路何在…… 93

4—1 越输血越贫血…… 95

4—2 基础结构先行？……119
4—3 目标结构……128

第五章 改革……133
5—1 农村包围城市？……135
5—2 城市改革率先突破……149
5—3 改革的有利条件……154
5—4 改革的突破方向：流通……159
5—5 有时空结构的改革战略……178

第六章 百业待兴，眼抗牛耳……185
6—1 目标与约束……190
6—2 引进创造引进……195
6—3 超薄型平面垦殖……212
6—4 信息与产业……223

第七章 没有结束的结束……241
7—1 强化政府职能……243
7—2 人才开发与引进……248
7—3 平地建新城……251
7—4 民族与宗教……254
7—5 两小儿辨日……258

第一章

贫富两极

以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农村伊始，中国又开始了一场翻天覆地的革命。经济体制的改革，经济关系的调整，意味着诸种生产要素更合理地重新组合。不曾预料，发轫于贫困地区，滥觞于崩溃边缘的“要素组合新规则”，在全国推广之后，运动出了新的更加剧烈的不平衡。在包产到户的欢天喜地之后，区域间贫富差别的日趋严重，引起了国内所谓“三个世界”的划分，引起了“梯度”和“反梯度”理论的争论，引起了越来越多的人们对落后地区经济发展的关注。

1-1 “马太效应”

《马太福音》说：“让富有的更富有，让没有的更没有。”这句话被控制理论称为“马太效应”，用来形容“正反馈”。翻译成俗话，即原因与结果之间正比例的“越来越”的循环作用。作家发表文章，名气越大，发表越容易；发表文章越多，作家名气越大；当然再发表文章也就更容易。这是一个典型的“马太效应”。

我国地域辽阔，各地经济发展很不平衡。这本是谁都知道的事情。值得引起注意的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伟大变革发生之后，统计数据正在展现一个落后的越落后、先进的越先进的“马太效应”。请看图1—1。

我国正处于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转化之中。换言之，正处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化之中。人均拥有的工业总产值，更能说明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之间寸木岑楼的巨大差异。

图1—2中平均线以下几省、区与平均线以上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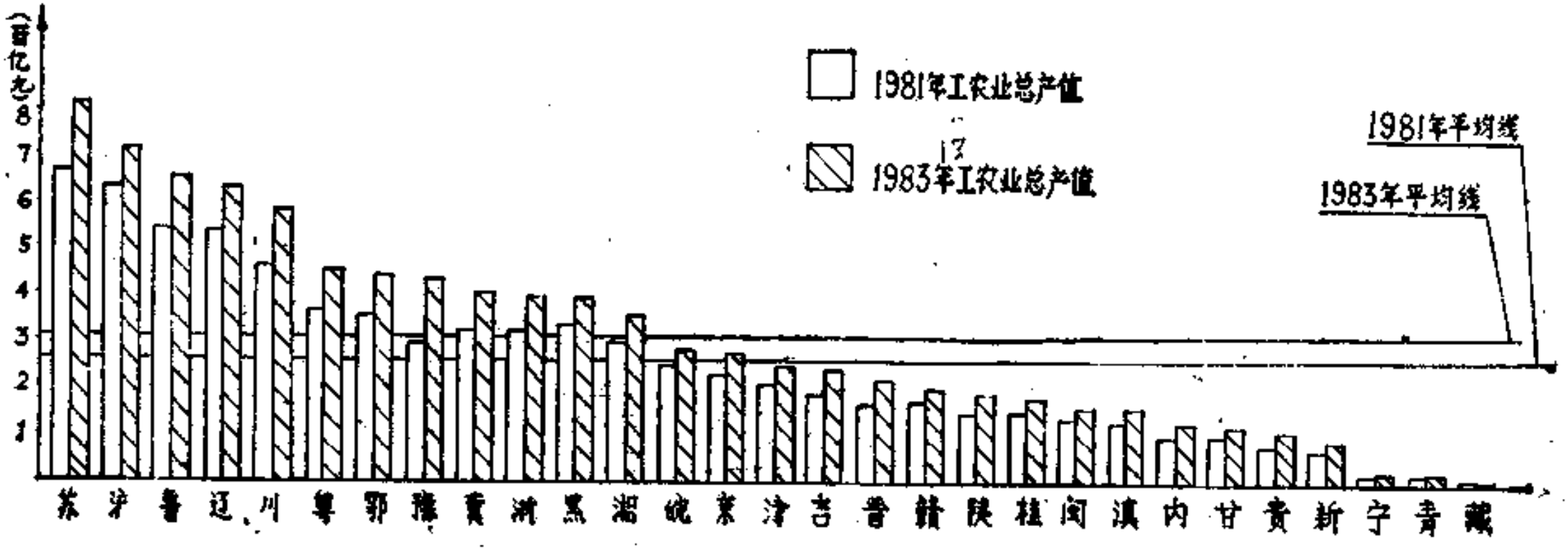

图1—1　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台湾除外）1981年与1983年工农业总产值的比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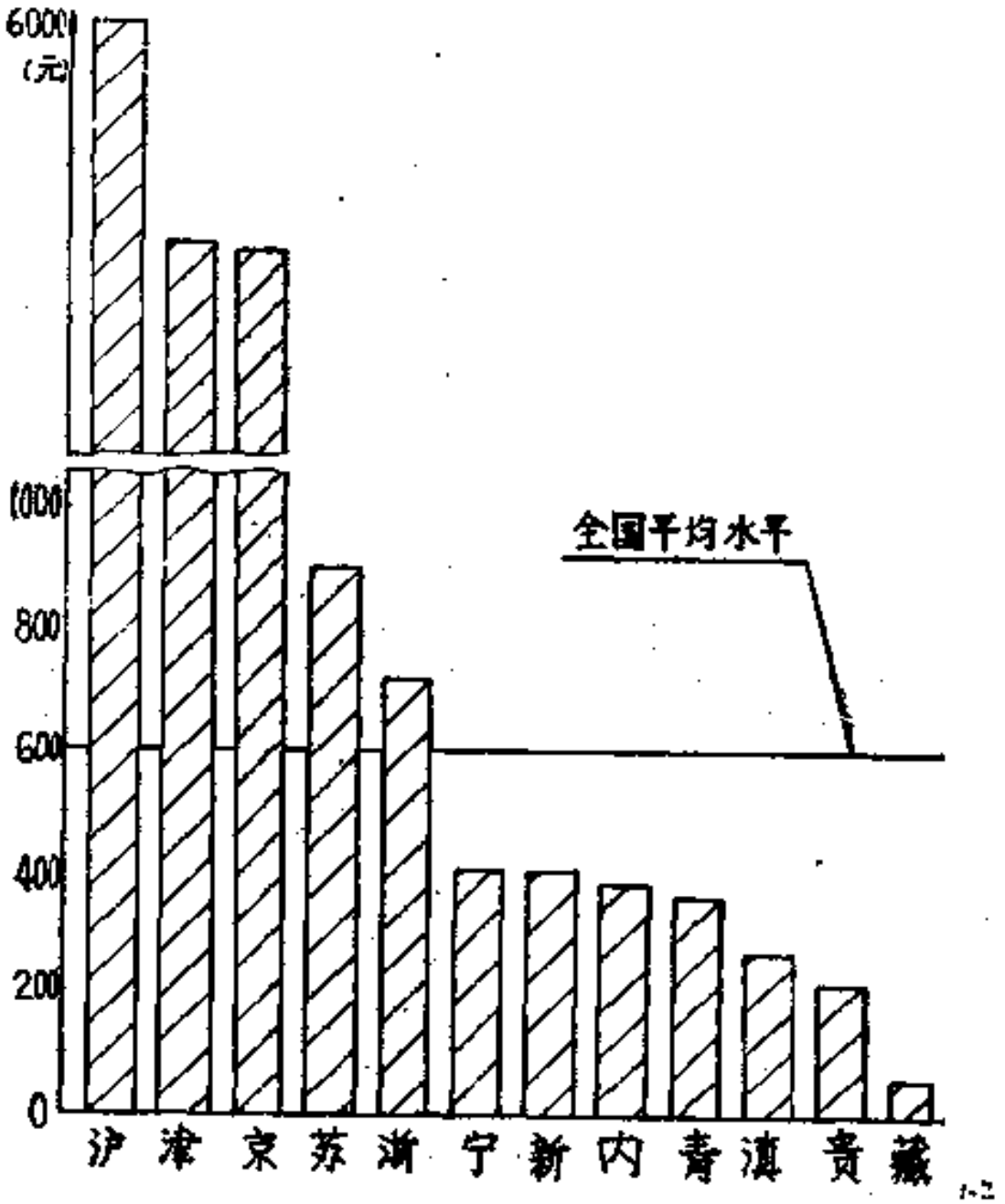

图1—2 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人均工业总产值比较(1983年)

江苏省比较，宁夏、新疆、内蒙古、青海、云南、贵州、西藏人均拥有的工业总产值，分别为江苏的44%，44%，42%，40%，29%，23%和7%。1983年西藏全区193万人口，“国家、集体、个人一起上”，工业总产值1.3亿元。同年浙江省温州地

区苍南县19万人口的宜山区，没有要国家一分钱投资，不计城市国营，仅农村家庭经营再生晴纶纺织品和塑料编织袋两项生计，年产值就达1亿多元。

极度不平衡并不新鲜，新鲜的是极度不平衡的极度发展。

表1—1　几省区1979～1983年工农业总产值平均年递增速度的比较（%）

省别	江苏	浙江	内蒙古	新疆	贵州	西藏
年平均递增	11.95	15.34	11.80	15.51	11.21	5.31

注：西藏统计是1980～1983年的。

各省、区的发展速度参差不齐。按道理，落后地区的发展速度只有远远高于发达地区，短期内缩小差距才有可能。以上数字展现的趋势，与我们的主观愿望并不一致。用江苏和西藏作极端的例子，简单外推，可以看出落后地区与发达地区差距继续扩大的最坏前景。

1983年，西藏工农业总产值相当于江苏的8.51‰；按两省、区近年来年均发展速度简单外推，在不远将来的1990年，这个指标就成了5.50‰。两省、区工农业总产值的绝对差额，将由818亿元上升为1808亿元，扩大221%。绝对差额的扩大速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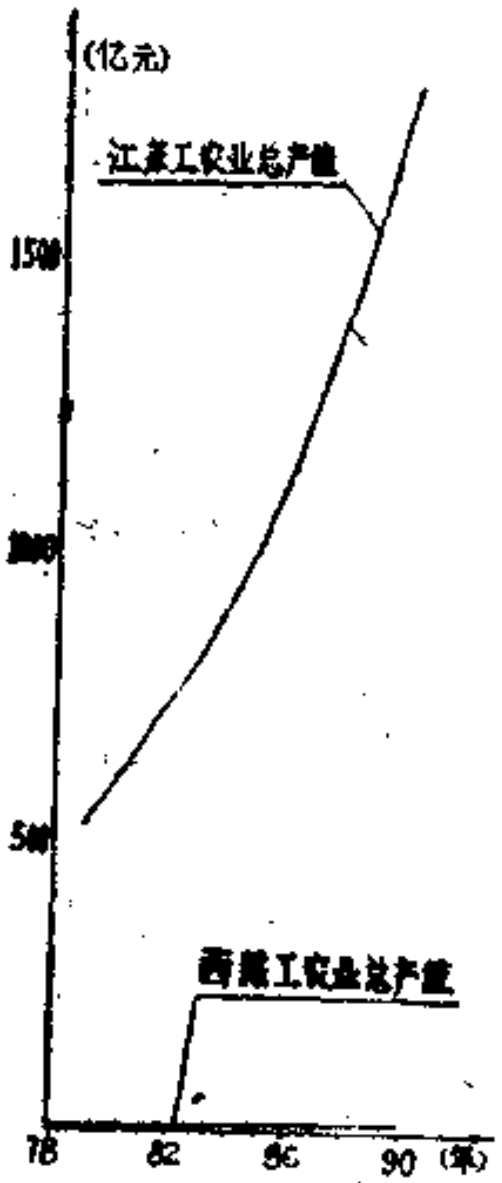

图1—3　西藏与江苏工农业总产值的可能发展（1978～1990年）

为年均递增12%，是西藏工农业总产值增长速度的2.26倍。也就是说，西藏要想在1990年时保持1983年与江苏省工农业总产值的绝对差额不致进一步扩大，从现在起，必须以年均递增204%的速度发展。这可能吗？

1-2 落后的制约

上述前景，是不可能出现的。不仅西藏不可能有204%的年均发展速度，而且江苏省也很难即使在1990年以前，仍保持年均递增12%的速度。从全国范围看，落后地区的不发达，将对整个国民经济和内地、沿海发达省份的高速增长，发生以下三个方面的制约性影响。

总需求相对不足

中国西部的新疆、内蒙古、宁夏、西藏、广西、云南、贵州、青海五区三省总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13.86%；1983年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只占全国的10.72%；人均占有社会商品零售总额水平在国家财政的巨额援助下，只为全国其他各省平均水平的74.6%，江苏省的63.6%。如果这些地区的社会商品零售总额能达到全国其他省份的平均水平，便可使现有商品零售市场扩大近百亿元。按上述省、

区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目前份额和平均增长速度计算，到1990年我国仅此一项损失的市场累计便达上千亿元。

落后地区投资需求不足，是对总需求发生约束性影响的另一个方面。在1983年全国1369.06亿元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中，包括占落后地区投资总额绝大部分的中央投资在内，五个少数民族自治区仅占6.24%；加上云南等三省，也不过9.93%。1983年五区三省的人均投资水平为95.63元，等于全国其他省份平均水平的68.44%。如果尽可能剔除国家直接投资因素，仅看“城乡集体所有制单位投资”和“城乡个人建房投资”两项，五区三省则分别为全国总额的3.76%和7.22%。五区三省的面积是江苏省的56倍，人口是江苏省的2.3倍，而“城乡集体所有制单位投资”八个省、区合在一起，才达5.88亿元，仅为江苏一省的27%，“城乡个人建房投资”也只是江苏一省的50%。以社会固定资产总投资额达到其他省份平均水平计，五区三省投资需求不足，到1990年将使我国市场损失500亿元以上。

这仅仅是按落后地区已有需求水平与全国平均水平的比较粗略估算的。乘数原理表明，最终需求的不足，还将导致对一系列中间产品的更大数量的

派生需求不足。我国投入产出表计算的完全消耗系数，按1983年固定资产积累构成计算，每增加一万元固定资产积累，要求国民经济各部门直接或间接提供2.42万元产值；按1983年消费构成计算，每增加一万元消费，要求国民经济各部门直接或间接提供2.03万元产值。以此为据，不说累进，仅以平均值加总，落后地区消费和投资的总需求不足，到1990年也将使我国整个国民经济失去近4千亿元的发展机会。这个数字相当于我国1978年全国工业总产值的全部，相当于1984年全国工业总产值的50%以上。

中国是一个技术落后的“小农大国”，一开始就倚重于国际市场来实现经济振兴，在强手如林的国际环境下，是不现实的。依靠国内市场，开发国内市场，是无可争议的基本战略。落后地区的落后状况（还不仅仅是上述五区三省），将日趋严重地在深度上和广度上制约着国内市场的开拓，对整个国民经济可能的发展，发生严重的拖曳作用。

整体性供给不足

占我国国土面积三分之一以上的贫困落后地区，恰

恰拥有我国经济赖以振兴的重要资源。仅以水资源为例：黄河等北方诸河年径流量占全国总径流量的18%。耕地面积和人口却分别占全国的6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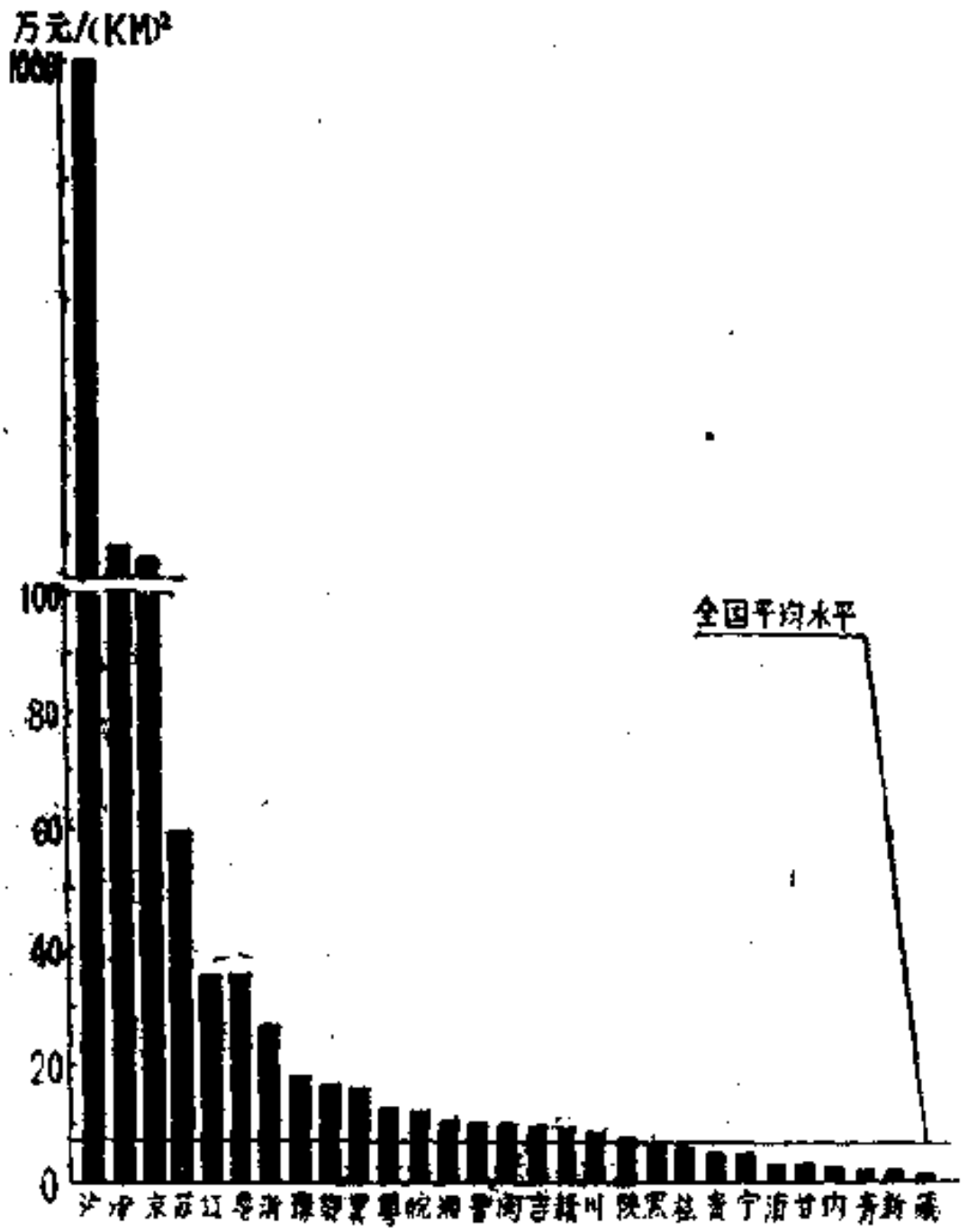

图1—4　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台湾除外）每平方公里工农业产值对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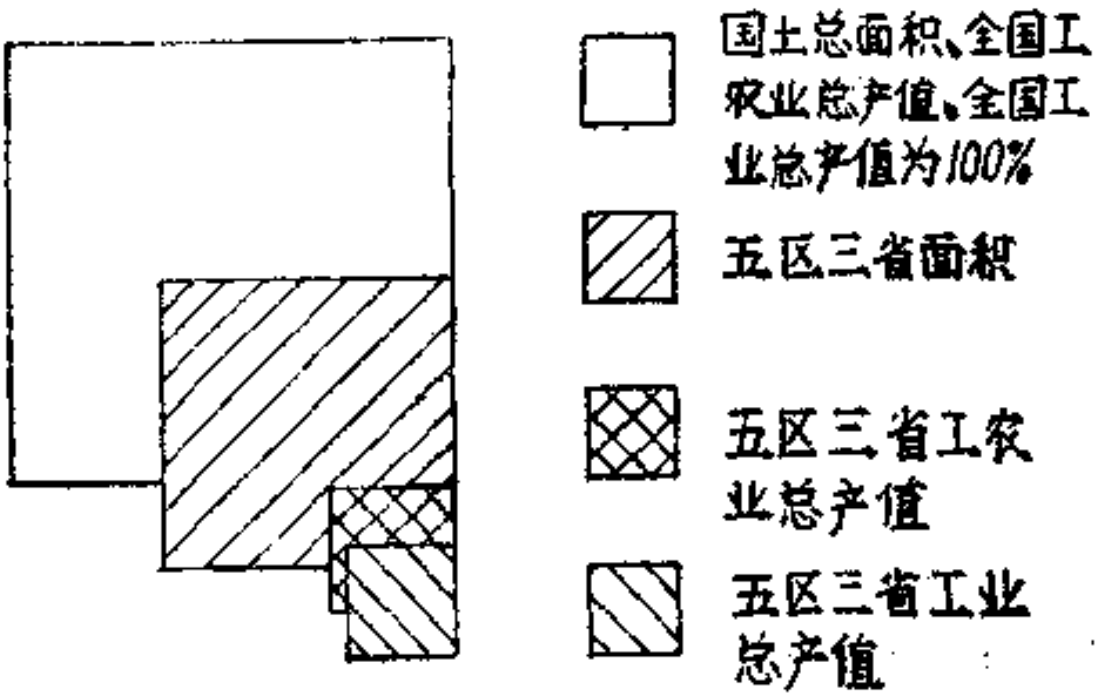

图1—5 新疆、宁夏、内蒙、广西、西藏五自治区及云南、贵州、青海三省面积、工农业总产值、工业总产值分别占全国的比例（1983年）

注：新疆、宁夏、内蒙、西藏、广西五自治区总面积430多万平方公里，按我国960万平方公里计，占总面积46%左右，工农业总产值1983年仅为全国的4.8%；加上云南、贵州、青海三省，总面积达560多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59%，工农业总产值也仅为全国的8.4%。假如说工业总产值较多地象征着现代化的发展，这个比例数字就更可怜了。1983年上述五自治区工业产值加在一起，仅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3.9%，加上云南等三省，也不过6.6%。

和46%。其中尤以海河和淮河为甚。这两个地区水量占全国的4%，人口和耕地却占全国的27%。目前海河流域的径流利用率已达67%，辽河流域达68%，淮河达63%，黄河达39%，内陆河达32%。

黄河流域浅层地下水的利用率达49%，海河平原已高达87%，仍满足不了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全国现有城市中，分布在北部和东部的154个城市已发生不同程度的缺水现象，据统计日缺水量已达880万吨。到2000年，按来水保证率P=75%估计，在全国40个分区中，21个分区供水不足，共缺水约1000亿立方米。由于缺水，不少地区地下水超采严重，形成大面积地下水漏斗，部分地区地面沉降，一些城市工业区的地下水资源已面临枯竭的威胁。与此同时，西部地区大量的水资源却在闲置浪费。长江径流利用率只有16%，上游利用率更低。西南诸河利用率则不到1%。

水资源的开发利用如此，能源、矿产等资源的利用亦如此（参见第二章第二节）。广大落后地区蕴藏的丰富资源能否尽快开发利用，决定着资源日趋匮乏的发达地区经济发展可能的速度，决定着我国国民经济已经发生并日臻加重的结构性失调可能改善的程度。

民族团结与社会安定

落后地区虽然人口在全国总人口中的比重不

大，但在全国少数民族总人口中却占了绝大比重。上述我国全部省级少数民族自治区和三个少数民族人口密集省份，生活着全国少数民族总人口的64%。面积相当于全国少数民族自治地方的93%，并且分别与苏联、蒙古、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锡金、不丹、缅甸、老挝、越南十一个国家接壤。漫长的边境线占我国陆上边境线总长度的90%以上。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与繁荣，对我国的民族团结与社会安定，关系重大。沿海、内地发达地区与边境、少数民族落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过分悬殊，有可能带来民族心理等方面一系列微妙的社会问题。可以断言，即使能够有办法通过国际环境解决国内总需求不足和结构性供给不足的经济问题，即使能够实现图1—3所描绘的江苏与西藏高度陡峭的倾斜发展，我们也无法在民族团结与社会安定问题上，排除“振荡”的可能性。

当前，有很多迫切需要研究决策的重大问题。不发达地区的不发达，并不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然而，从一个不太长的时期看，研究解决落后地区的落后问题，无论是对我国的经济发展还是社会安定，都将具有不容忽视的重大战略意义和理论意义。

第二章

矛盾的现实

“我国第一个购买飞机的农民出现在中州大地，他就是河南省郑州市郊区赵乡专业户郭元英。他勤劳致富后不忘乡亲，花了一万九千五百元购买了一架‘蜜蜂三号’飞机，赠送给乡政府，用于全乡的农用施肥、治虫等。”

“他的房间里摆着电视机、收录机、双缸洗衣机，院里停放着嘉陵摩托车、汽车；当我们在他的会客室里，吸着带咀的凤凰牌香烟，喝着清香的茉莉花茶，欣赏着院内盛开的鲜花和低飞的家燕；当看到这兴旺发达的一切时，我们怎么也没有想到，仅仅八九年前，郭元英还在为吃饱肚子而奔波！”

——黄正根，《第一个买飞机的农民》，《半月谈》，1984年第9期。

“北京市朝阳区南磨坊公社平乐园大队二十七岁的女青年程秀芝，在去年年底分红之后，将一架八十八键、三踏瓣、工艺精良、造型典雅、价值一千六百八十元的中型立式钢琴迎进家门，成了座落在首都东郊的北京钢琴厂自一九五〇年生产出第一台国产星海牌钢琴以来的第一位农民顾客。”

——戴晴：《京郊农民程秀芝喜购钢琴》，《光明日报》，1984年2月17日。

“闻名雁北的运输专业村——山西省阳高县观上村，是个仅有七十九户、三百多口人的小村庄，……仅电视机、收录机、收音机全村今年就购买了四十六台（架）。男女青年的西服更是时兴哪样买哪样，在大同跑运输赶车的中老年社员，每人起码有一到两身七十元以上的套服。到了农闲，观上村的人家成群结队地到大同、北京、包头等地旅游去。观上村农民说得好：‘咱挣大钱，生活上就应讲究点舒适、美气。’今年，全村生活消费六万八千多元，人均二百多元。”

——《挣大钱　会花钱　花了大钱再挣钱》，《中国青年报》，1984年12月13日。

“十一月二十二日，郏县安良乡塔林坡村二百七十户农民，举行了饭菜花样比赛。”

——《塔林坡村农民举行饭菜花样比赛》，《河南日报》，1984年12月11日。

“如今，西丰县西丰镇幸福村农民真正过上了幸福生活：‘细粮成了家常饭，做饭很少冒炊烟，家用电器户户有，新式家具满房间。’……现在全村一百三十八户，一百一十户有了电视机；一百二十多户有了电饭煲；半数以上的人家有了洗衣机。还有不少农民手里攥着钱，准备买高档商品，特别是彩电和摩托车。”

——《幸福村家庭消费发生巨变》，《辽宁日报》，1984年12月3日。

“富了以后怎么办？史志民敢于消费，创业兴家。近三年来，他新盖起了六间砖木、钢筋混合结构的房屋，添置了大立柜、高低柜、双人沙发、单人沙发、钢丝床等十七件大中型新式家具，还买来了大彩电、六喇叭台式收录机、洗衣机、摩托车等高档消费品。史志民外出办事骑嘉陵，穿着讲究，

全家六口人每月的生活费用没下过二百元，不少人到他家参观后说：‘农家院真象个小宾馆’。”

——杨志龙：《十万富翁史志民大胆兴家创业》，《人民日报》，1984年9月28日。

……

2-1 令人震惊的贫穷

场景一：

距省会兰州市仅四十余公里的甘肃省榆中县上庄公社，所有生产队去年人均口粮才40—100斤！老百姓靠借帐买返销粮。仅国家贷款一项，人均欠102.60元之多。上庄四队，32户，174人，全社中等水平，1979年工分值仅0.19元，超支户占71.8%。1979年人均口粮54斤。全队共有65床被子，新的3床，旧的35床，又烂又脏、漆黑一团、经纬不分的27床，户均2床，近3人1床。毡13条，平均3户炕上才能有一户有毡。三分之二左右的土炕上根本没有铺的，只有1张破席，春夏秋冬，寒来暑往，一家

老小就睡在肮脏的土炕上，几人伙盖一床破被。全公社49个生产队，有48个队人均收入40元以下；家产在30元以下的（除房屋、猪羊）有188户，占13.4%。在15元以下（这就意味着除去一张破席，一团烂棉花和锅、碗、筷外一无所有了）的41户，平均30户就有1户！上庄七队宋同安，一儿一女，一家三口，只有一床十几年的烂被子，连炕席都没有，睡在两张拆开的水泥袋上，全部家当只有一个几十年的烂面柜，一个案板，一口小锅，三个碗，几双柳条筷子，除此而外竟别无它物。马滩二队张伦青，本人当过志愿军，6口人，4个孩子，全家睡在一个炕上，没有炕席，仅有一床被子，还是十几年前从部队带回来的。全公社25—30岁男青年758人，没有结婚也没有对象的288人，占38%！全社七千多人，竟有4371人没有棉衣、裤或棉衣、裤破烂不堪。一到天晴，很多孩子都趴在草堆、田埂上晒屁股！并且这些缺衣少食的人民都是在海拔2300—2800米的高寒阴湿山区生活着。

——陆学艺、王小强：《包产到户的由来和今后的发展》，《农业经济丛刊》1981年第2期。

场景二：

1981年新疆塔城地区人均收入在60元以下的穷队共135个，阿勒泰地区人均收入在60元以下的穷队81个，占全区生产队总数的20%。西部的县平均每三户有一户欠债。牧民住房简陋。北疆地区有八万多户牧民，其中有一万六千多户毡房破烂不堪。南疆有四万一千多户牧民，其中有一万四千多户没有毡房，夏季露宿核桃树下，冬季住土洞或在烧热的沙土上过夜。

——吉小明：《新疆畜牧经济考察》。

场景三：

贵州省1983年是粮食总产最高年，农村人均产粮不过523斤，人均口粮不过366斤。一般人是不够吃的。据省经委对87县32914户调查，1983年人均产粮700斤以上的户占43.6%；同时，人均收入100元以下、口粮300斤以下的贫困户仍占20%。较发达的安顺地区，人均收入80元，口粮400斤以下的农户仍占15%左右。安顺地区关岭县是全省最早实行责任制的县。到1982年全县工农业总产值翻了一番，成为全国一百多个翻番县之一。该县1982年粮

食生产创历史最高水平，人均产粮也不过474斤。1983年受灾，人均口粮下降到350多斤，基本不够吃。目前全县有18%的生产队人均口粮在300斤以下。据县委对215个贫困队的调查（分别占全县农户总数和农村人口数的11.24%和10.88%），人均口粮276斤，人均纯收入39元，人均衣服1.6套，户均被子1.4条，平均3.57人一床。其中包包公社6个队91户499人，人均口粮294斤，收入33元，衣服一套（即只有一衣一裤）。户均被子一床，合5.48人一床。鸡场公社岭岗等14个队，272户1368人，人均一套衣服，户均不到一床被子，5.56人一床。该公社黄泥宝生产队，18户73人，只有10条被子，按一户一床算，有一半的人家居然连被子都没有。总平均7人一床。关岭县上关公社1983年口粮385斤，没有被子的农户占10%左右，没有住房，住在四面漏风的草棚里的农户也占10%左右。全社70～80%的农民一年到头只穿草鞋。

广大山区既缺衣少食，又缺医少药。安顺全区每千人拥有卫生技术人员和病床分别为全国平均水平的66.7%和45.5%。镇宁县六马区方圆620平方公里，9个公社近5万人，区医院仅有12个床位，无透视，无化验。9个公社卫生所，每所2～3人，都是

民办公助，未经专门训练。乐运公社5473人，卫生所1981年仅有价值31.5元的医药器械。全区地方性甲状腺肿患者占总人口6.35%。其中镇宁、关岭、紫云三县患者占人口比例竟分别高达18%，20%和23%！

笔者在关岭县考察了柏油路边安隆公社所在地——团园河大队胡家凹生产队。群众的贫困程度令人震惊。该地距县城20公里，海拔1400米。当时大雾弥漫，阴雨连绵，笔者身着毛衣毛裤加羽绒衣，尚感寒气袭人，而当地居民几乎全是两件单衣。十四、五岁的姑娘有的连裤子都没有，两腿赤裸裸地冻得通红。走访的6户人家，家家都是透风漏雨的泥坯草房，人畜同居一室。锅里煮的是玉米糊和白菜，粮食均只能吃到来年三四月。孩子们瑟瑟发抖地蜷在火堆旁。杨开明一家九口，两床破被。杨和一个孩子躺在漆黑一团的床上，上吐下泻两天多了，没钱去看病。社员王德虎，爱人携大女儿三年前外出卖药，一去不返，杳无音信。家里没有床，没有被子，女儿睡在“阁楼”上的草堆里，他身着一件三年前国家救济的烂棉袄，睡在距牛两米之遥的草堆里。

——白南风、王小强：《人、社会结构与社会系统开发——从贵州看落后地区发展问题》。

……

2-2 令人震惊的富饶

在人们的思维习惯里，贫穷往往与荒凉联系在一起；落后的原因，往往是资源约束过于严峻。倘若真是如此，倒也心静了。令人不能平静的是，当有谁希图探究贫穷的原因时，往往首先碰到的是落后地区自然资源令人惊诧的富饶。

云南：有名的植物王国。仅1.9万平方公里的西双版纳，就有高等植物3500余种，可供利用的经济植物1000多种。云南的矿藏资源，锡、铅、锌的蕴藏量占全国第一，其中铅锌矿居世界第三位。铜、锑、镍占全国第二，金、银、铝、钨、钛、锆、汞以及铁、锰等黑色金属也有相当储量。煤炭储量达140亿吨，在西南各省，仅次于贵州。磷矿储量约200多亿吨，全国少有。岩盐储量可供全省用数百万年之久。云南大理石，驰名中外。大理点苍山连绵数百里，到处有大理石。地质部门资料表明，目前世界上可供利用的矿产共140多种，云南

就发现130种之多，其中80种已探明储量，可供开采利用。云南的地热资源，单是天然出露的温泉就有数百处，占全国出露温泉的25%。

广西：除宜农的自然资源外，还享有“有色金属之乡”的美誉。全区70多个县有矿，已探明矿种17种。有色金属中的锡、铅、锌、锑、钨分别占全国总储量的第一、二、三、四、五位。锰矿资源占全国储量的33.7%，汞、铅、钽、铌在全国也占有一定位置。广西水电资源占全国第六位。在已探明的73种非金属矿中，名列全国前10位的有26种。水泥原料——石灰岩储量达15亿吨，居全国首位。

青海：矿物资源已探明的有石油、盐、钾、铁、铜、煤、铅、锌、镁、硼砂、石棉、水晶、云母、硫磺、铬、金等60多个矿种，产地270多处，其中储量达到大型或中型规模的矿产地50余处。据地质部1979年核定，按全国矿种品位、储量排序，青海矿藏列为全国第一者有10种，列为第二位的4种，列为第三位的有5种。光柴达木的盐，储量达500多亿吨，占全国陆地盐储量的一半以上。

内蒙古、新疆两区：除拥有全国第一、二两大天然牧场外，内蒙古的煤炭储量居全国第二，稀土储量占全国的98%，是全世界其他各国总储量的

400%。新疆的白云母、蛇纹石、“和田玉”也都居全国第一。在全国已探明147种矿产资源中，新疆有117种。准噶尔盆地油气聚集量至少80亿吨以上。全区煤炭已探明储量和远景储量分别占全国的2.3%和35.64%。赵紫阳总理曾感叹地说：“新疆自然条件‘得天独厚’”，“象这样各种条件具备的地方，在世界上也是不多见的。”①

西藏：一直是旱魃肆虐的不毛之地，岂不知西藏的水力资源名列全国第一。藏北高原共有湖泊370多个，是我国湖泊分布最多的省区。全区年径流量均值为全国各省平均水平的4倍；地下水补给量是全国平均水平的3倍多。人均径流量超过加拿大，名列世界第一。丰富的水力资源，加上日照时间长，太阳辐射强，温差大，光合作用强度大，使西藏成为发展种植业的好地方。谁能料到，小麦单产的世界纪录，竟是在这块靠吃国家返销粮的土地上创造的呢？

在这片“不毛之地”上有林地蓄积量为全国平均水平的5倍，略低于黑龙江，屈居全国第二。人均占有森林面积及蓄积量均为全国第一，为第二名

① 见《人民日报》，1983年9月2日。

——黑龙江省的4.7倍和12.3倍。其中人均蓄积量超过荷兰170%，遥居世界之最。西藏盛产多种名贵药材，如麝香、鹿茸、贝母、虫草、天麻、胡黄连等。其他野生动、植物资源也应有尽有。

西藏发展工业的矿物资源同样丰饶。目前已探明的即有铁、铬、铜、铅、钴、压电水晶、熔炼水晶、脉石英、硫、盐、砷、硼砂、重晶石、瓷土矿、石膏、白云母、石墨、刚玉、煤等。这些矿遍及全区，多为富矿。其中硼砂、铬占全国第一，铜占全国第二。精硼、天然金刚石则乃稀世珍品。

贵州：煤炭保有储量仅次于山西、内蒙，居全国第三位。磷矿储量全国第三，品位和开采条件为全国第一。铝储量居全国前列，产量占全国总产四分之一。汞储量居全国第一。稀土储量在全国前几名之内。此外，还有铅、锌、铁、锑、钒、铜、钨、锡、金、银、锰铁、硫铁、重晶石、石膏、水泥用石灰岩、砖瓦粘土等多种丰富矿产资源。

贵州省河网密度大，分布均匀，水量丰富。人均占有地表水量，是全国平均水平的1.4倍。全省水能理论蕴藏量为1876.9万瓩，可开发资源为1325万瓩。东、南、西、北、中均有供大中型电站的水能资源分布，供小型电站之用的水能资源则遍布全

省。水电投资成本平均不到1分/度，开发极为有利。

全省境内有维管束植物254科1300属5500余种，汇集了多个植物区系的成分。优良的自然条件，使这里的木材年生长量高于东北一倍以上。杉木、油茶、油桐、漆树、乌桕、华山松等具有悠久的种植、利用传统和多种优良品种，全省各地均宜生长。油桐、漆树早在唐代即已栽培、加工和利用。现桐油产量居全国第二位，全省广为分布的“小米桐”，优质高产，称雄海内，其“六马桐油”在东南亚颇负盛名。曾使“商贾辐辏”的漆树之利，现仍为全国第一，主产于大方县的大木漆，誉满中外。桕油产量为全国第三，正安县的凤尾桕良种，驰名全国。杉木三五年成林，二十年便供斧柯，享有盛誉的“十八年杉（锦屏十八杉）”、“苗木”均生于此。此外，还有棕皮、栓皮、五倍子、木耳、香菇、青冈子、土茯苓以及松香、松节油、芳香油等30多种林副林特产品。药用植物有2500种以上，天麻、杜仲、厚朴、吴萸、白芍等海内外久享盛名。

栽培的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不包括蔬菜）达30多种，从亚热带到暖温带的作物几乎应有尽有。

目前已收集到的18种大田作物，品种达5550多个，尤以水稻、玉米、油菜、大豆等作物的地方品种为多，其中有些独特的品种资源颇具利用价值。举水稻为例，有千粒重高达50多克的丹寨“三粒寸”，具有特殊滋养作用的“黑糯米”，清香扑鼻的“香稻”，蛋白质含量高达15%以上的兴义“红冬谷”和惠水“金包银”，还有能适应冷、阴、锈、烂等不良环境的多个品种。

油菜产量曾居全国第二位。其中，有含油量高达46%的品种，如遵义“竹丫油菜”、余庆“高油菜”；有角果四室的特殊品种，如赤水“四轮油菜”。

蔬菜有70多种，主要品种250多个，包括清脆香甜、含纤维质极少，贵阳“水果萝卜”，含糖量高达8%以上的“黄平南瓜”，特抗软腐病的“五里关甘蓝”等一系列优良品种。

烤烟是贵州省的著名产品，人称“贵烟”，特点是色泽金黄，富有油润，组织细致，燃烧性好，早在50年代就以其“金黄粉底色鲜亮，油润光滑细如绸”而遐迩闻名，为国内名牌高档香烟（熊猫、中华等）不可或缺的原料，也是出口烟叶的重要货源之一。优质高产的品种有册亨“打宾烟”、惠水

“摆金烟”、独山“基长烟”、兴仁“巴铃烟”和岑巩“白筋烟”等。

贵州是茶树的原产地之一，历史悠久，品类繁多，茶叶内质好，具有香味浓郁的特点。名茶种如曾为贡品的贵定“云雾茶”、石阡“坪山茶”，远销国外的“都匀毛尖茶”，以及“湄江茶”等。由于生态条件优越，茶树在杭州一年发芽3～4次，在这里要发4～5次，并且大都是云雾茶。

栽培果树计有16种230多个品种，野生、半野生果树近30种，亚热带和暖温带水果均有生产。除主要栽培品种柑桔、苹果、梨外，还有桃、李、杏、柿、葡萄、花红、樱桃、香蕉、芭蕉、咖啡、核桃、板栗、银杏等。野生水果有猕猴桃、刺梨、杨梅等。“威宁黄梨”、“安顺雪梨”、“惠水金盖梨”、“兴义海子梨”、“清镇花红”、“惠水金线柑”，“兴义大红袍”桔子等，均具有特殊的品质和风味。毕节、织金的“穗状核桃”每枝结果二三十枚，威宁的“露米核桃”成熟后自然裂壳，为世间稀有珍品。曾博得朱德同志赞赏的威宁“黄元帅”苹果，果型、果肉质地、糖酸比以及风味等，在全国也属罕见品种，极有出口潜力。猕猴桃广为分布，年收获量可达1000万斤左右。新发现的水果

之王——刺梨，维生素C含量为甜橙的50倍，堪称“维生素C大王”；用其加工的食品，不仅味美可口，且能保存高含量的维生素C，是特殊作业人员、老弱病人及广大消费者的重要营养食品，有着极其广阔的国内外市场。当地有句老话：“黄瓜上市，医生得势；刺梨上市，医生背时。”可窥其营养价值之一斑。此果惟黔最多，全省野生年收获量可达1200万斤。

贵州省山多草茂，天然草场广阔，利用时间长。可用作饲料的农作物副产品较多。畜禽品种齐全，牛、马、猪、羊、兔、鸡、鸭、鹅、鱼、蜂等都有许多优异品种。关岭、思南、独山、清镇黄牛和思南、剑河、惠水水牛，适应性强，耐粗饲料，个体较大，肉用性能好。誉满全国的“关岭牛”，屠宰率达56%，净肉率达40%，体型矮小的黔西马，关节强健，蹄坚实，行动敏捷，适宜山区驮运。地方猪种五大类55个品种、多有性成熟早，繁殖力强，母性好，哺育率高，肉质好，鬃长质韧，耐粗饲料，适应性强等优点，为外国猪种所不及。黔西北高原的可乐猪，黔东南边缘地带的香猪，中部地区的关岭猪，黔北地区的复兴猪，都各具特色。此外黔东北的沿河山羊，黔西北的威宁山羊，

以及威宁县的曲水鸡，黔东南的三穗鸭等，均为难得的优良地方品种。

……

面对如此的丰富资源，工也好，农也好，林也好，牧也好，真可以说是干什么，成什么。

第三章

落后的本质规定

什么是落后，居然成为发展经济学入门的一道难题。几乎所有的发展经济学著作，第一章往往就是关于如何识别“落后”的学术讨论。总产值、人均产值，国民收入、人均收入，增长速度，生活质量……等等，等等。人们搜肠刮肚用各种经济指标，希图证明“落后”的准确经济学含义。可是，如果有谁想用这些经济指标去发现造成落后的原因时，他从这些经济指标中所能得到的唯一信息是：落后的原因是落后。

同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同是需要改革的“大锅饭”经济体制，同是而且首先是揭橥于落后地区的农村联产承包制的改革，农村居民生产积极性极大焕发几年之后，不同区域之间，为什么竟然出现了如此明显且日趋扩大的差异？原因：同样政策环

境下，人的行为不同。结论：落后的本质规定，是人的素质差。

3-1 不发达的发达

落后地区人民生活的困苦使人震惊；落后地区自然资源的富饶更使人震惊。而真正耐人寻味的是，落后地区贫穷人民在富饶资源面前的表现——在干什么成什么的资源基础上，干什么不成什么。

以贵州为例，70%以上的县有煤资源，粘土资源亦颇丰富，砖瓦却要跑到湖南、四川去买。当地同志说："贵州把煤拉到四川，换回四川的泥巴。"

宝贵的森林资源利用率低，浪费严重。木材加工成品仅利用了立木材积的20%不到，采伐剩余利用率仅7%，加工剩余利用率仅5%。虽然全省处处皆煤，每年却仍要烧掉大量木材。全省民需材每年超过100万立方米，其中70%是被当作薪炭材烧掉的。五十年代，70个县生产木材，现在已有51个县木材不能自给。五十年代2～3根木材1立方米，目前往往要10根以上。

历史悠久的桐油、生漆、油茶、乌桕籽等传统产品的产量，至今未达到历史最高水平。素为黔之骄傲的油桐籽，1956年收购量就已达1.78亿斤了，近十年来却一直在1亿斤左右徘徊。

贵州省曾为我国柞蚕四大产出省之一，1956年就已有1.43万担的产量，时过27年，只剩下5574担，为1956年产量的39%。桑蚕，贵州与四川同时起步，50年代时均为1万担左右。至1982年，四川发展到130万担，贵州仍不到1万担。

享誉已久的贵州云雾茶，1949年产量2.65万担，1980年发展到16.8万担。遗憾的是，这5.3倍的增长，是以种植面积扩大43.7倍得到的。1949年茶叶亩产233.5斤，1982年只有33.9斤，为1949年的14.5%。

有可能打入国际市场的贵州柑桔，目前总产仍未恢复到解放初期的水平。黔西梨稳定产量在1000万斤左右，只能运销200～300万斤。水果加工能力更差。惠水县水果种类繁多，产量丰裕。1981年收购桔子7万斤，加工量只占5.8%；李子9万斤，加工量只占6.1%；杨梅1.5万斤，加工量只占1.5%。目前基本上无竞争对手，发展前途极为远大的水果之王——刺梨，全省年产1200万斤上下

（均为野生），发展几年了，仅有34家企业加工，全部收购量仅占其野生产量的1%左右。

与资源的闲置和浪费并存，是资源的破坏。一方面自然土壤中的荒山草坡大多未开发利用；另一方面，在人口集中地区大量毁林毁草陡坡开荒，在人少地多地区普遍实行刀耕火种轮歇开荒。全省每年约有40万亩火烧迹地和70多万亩伐林迹地。加上年复一年的铲草皮积肥，造成多数山岳土层薄浅，基岩裸露，水土流失极为严重。

根据不同年份航片计算，清镇县近15年来，裸岩面积每年增加5千亩，普定县每年增加8千亩。全省每平方公里水土流失量，1959年以前为553吨，1961年为657吨，1979年为758吨，1980年为910吨。至1981年，全省旱地竟有一半以上分布在30°以上的陡坡上。水土流失面积已达3.5万平方公里，占总面积20%左右；跑水、跑土、跑肥的坡地1300万习惯亩，占旱地总面积81%。全省每年河流外泄泥沙近5800万吨，相当于38万多亩耕地的肥沃表土。经折算，约含氮11.6万吨，磷8.7万吨，相当于近年来全省年平均施用氮、磷化肥总量的314%和83%。

“烧一山，种一坡，收一箩，煮一锅。”越穷越垦，越垦越穷。结果是天不下雨旱，天一下雨

冲。坡上的地冲掉，沟里的地冲坏。雷山县人民祖祖辈辈千辛万苦造成17万亩梯田，一场大雨冲掉2万亩，永不能恢复，群众跪在地上哭。普定县1983年一场大雨，造成滑坡，一个7户21人的自然村被淤石盖满，户户死人。这个村本来上有大乔木，下有青桐林，三股清泉水，浇灌7亩良田。后来，树被砍光，开荒种地，结果导致了这场悲剧。山上砍伐，祸及平原。地处平坝地区的安顺县，本不曾开荒砍树，1983年6月22日一场暴雨，水冲沙压耕地532亩，减产300多万斤。近年来，纳雍、织金、威宁、盘县等地，陆续出现了滑坡和泥石流，数千亩地被淹没，一百多人丧生。

……

事实证明，有了丰富的资源优势，不等于就有了经济优势，这个道理，已被人们普遍接受。“把资源优势转变为生产优势，把生产优势转变成经济优势”，今天已成为一句时髦的绕口令。然而我们最终面临着一个朴素的问题：谁去转变？

谁去转变，是所有问题的关键。“谁”，不仅决定着什么是所谓“资源”，而且决定着用什么手段去开发所谓“资源”。其实人们所说，包括前章

所述的“资源”，是压根就存在的客观物质。不管你叫它什么，也改变不了它的存在。脱离了主观判断，脱离了人对它的认识，它的存在毫无意义。你今天忽然把几十万年就固定存在的煤炭当成了“资源”，是因为你认识到它能烧，而且具有了采掘、运输以及燃烧它的手段；同理，你今天不当成“资源”甚至当成障碍而加以破坏的东西，也许当你对它有了新的认识和新的利用手段时，它也就成了宝贵的“资源”。如果我们承认人类认识具有无限性的哲学，那么这话也可以倒过来说：凡被你认为不是“资源”的东西，只不过说明你尚不具有认识它的能力和利用它的技术手段而已。所以，对于人类，所谓“资源”，是社会-经济结构和人的素质的函数。对应不同的经营方式和开发手段，资源的含义不同。对于多种经营、综合利用、深度加工和专业化、商品化生产的立体开发方式，贵州如此丰厚的自然资源，可以构成任何一个现代社会-经济系统迅速发育的良好基础；而对于倒山种地、单一经营、自给自足的平面垦殖生产方式，满山遍野的林木蔓草，就不仅不是什么“资源”，而且是救穷致富的严重障碍了。设身处地地想，谁不愿在平坦坦的沃土上种庄稼呢？汗流浃背、刀砍斧斫地乱砍

滥伐，还是人家为吃饱肚子而付出的艰辛劳动哩。

3-2 双向积极性

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实行，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报刊杂志上连篇累牍地宣传，我们的调查报告中也不乏其例。

“温州地区人口密度高达525人/平方公里，每个农业人口只有0.55亩耕地。189万农业劳动力中，就有80～100万剩余劳力。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农业生产大发展，农村商品经济也获得迅速发展。

苍南县金乡镇成了一个以生产经营铝制标牌、塑片产品和红膜证卡为主的小商品产销基地。该镇人均耕地0.36亩。1979年，全镇5,600人无事干。自大量发展以上三类商品生产以来，全镇已有各种机械设备2000多台，约合固定资产200万元。全镇15——45岁人口中，从事三类商品产销的占90.8%。1982年估计产值1,500万元，比1979年增加5倍，相当于该镇农业总产值的近30倍，人均年收入达380元。60%以上的居民新建了楼房。个人存款余额比1978年增加了25倍！

苍南县宜山区是再生腈纶纺织品和塑料编织袋产销基地。全区人均耕地0.47亩。72,576个劳力，农田耕作仅需2万劳力。该区有悠久的土纺土织传统。1979年，在当地传统工艺的基础上，发展起腈纶边角废料再生纺织业。1982年全区拥有各种纺织机械设备33,000多台，约合固定资产1，100万元。从事纺织生产的人员占劳动力总数的92.6%。当年纺腈纶纱2,300万斤，生产出腈纶再生毛衣1.5亿件。近四年生产了纺织品约4.6亿件，平均每10个中国人就拥有4.6件宜山织的毛衣。1982年纺织品产值达9,315万元，比1979年增加了20倍，人均收入430元中，该项收入占320元。

瑞安县的莘塍区和塘下区，是塑料拉丝的产销基地，为塑料编织袋生产提供原料。莘塍区人均耕地0.46亩。社队企业与联合体共同承担工、副业生产。1982年社队企业总产值为2,066万元，从业人员15,517人；全区208家联合体，从业人员4,727人，其中从事塑料拉丝生产的有184家，4,526人。1983年上半年，这184家联合体产值达893万元。从1977年到1982年，莘塍区私人储蓄增长了7.9倍。

乐清县柳市区是五金电器产品的产销基地。在温州地区几个专业商品产销基地中产值最高。1982

年全区社队企业工业产值达70,251万元，比1978年增长了1.8倍。1983年1——7月即7,000万元。1982年4月，柳市区的工商税收曾高达149万元，80%以上是工业企业税收；当年全区工商税收达1,055万元。1981年该区社队企业税收971.81万元，上缴集体积累781.71万元。从1977年到1982年，全区城乡居民储蓄增长了33.8倍。

永嘉县桥头镇是近几年来形成的小商品交易市场，以经营钮扣、表带为主。全镇人均0.3亩耕地。这个市场有606个摊位，每天上市交易的有3,000多人。市场的日成交额一般为6至7万元，有时高达10万多元。近两年上交税收近100万元。1982年仅钮扣一项，销售额就达2,000多万元。

瑞安县仙降区仙降公社作塑料底人造革皮鞋，1982年产值500万。目前全社14个大队都从事该项生产，其中4个大队有80%的农户作鞋。1979年有4个月靠地瓜丝度日的仙降大队，1982年481户社员拥有700多台缝纫机，产鞋400万双，获利60万元，该项收入在社员总收入中占64%。两年来27%的农户盖起了两层以上的楼房。1981年的私人储蓄是1978年的92倍。

在很短的时间中，宜山、柳市两区和金乡镇的

工业产值已分别占该地工农业总产值的81%、85%和97%！工业生产已由副业上升为主要产业。随着工业的发展，农业生产水平也迅速提高。1982年，几个基地的粮食总产都超过了历史最高水平。金乡镇1982年粮食总产481万斤，亩产1,596斤，比1973年分别增长了14%；宜山区1982年粮食总产比1983年增长1成多；桥头镇三年粮食总产增长27%；柳市区1982年粮食总产23,178万斤，亩产1,658斤，分别比历史最高年（1980年）增长3.9%和4.5%。

短短几年时间，这几个区成片成镇的楼房平地而起，座落在几元、几角、几分、几厘钱一件的'小商品'上。是谁创造了奇迹？没有国家投资，没有人规划设计，是责任制解放了千百万农民家庭！”

一个“松绑”，就松出商品经济的歌舞升平。只要“思想解放”，改革，竟是如此轻而易举。

贵州省早就思想解放了。从1979年底就开始大面积推行家庭联产承包制。“松绑”，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极大地缓解了三十年来在“大锅饭”体制下始终不能解决的群众温饱问题。值得注意的是，还是这个积极性，同时创造了毁林开荒的奇迹。1980年全省毁林开荒32.25万亩，1981

年50.6万亩，1982年虽采取了管制措施，毁林开荒仍达30.56万亩。“松绑”焕发出的巨大生产积极性，三年时间毁坏森林113.41万亩，被人称之为继1958年“大跃进”时的“大炼钢铁”、“十年浩劫”中的“以粮为纲”之后的第三次大破坏。

是讽刺吗？是对那些把改革简单归结为“松绑”的轻飘见解的讽刺；是对那些小看落后地区开发研究之理论意义，以为照搬西方商品经济模式即能解决中国发展问题的简单认识的讽刺。

谁都知道，我国正处于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化的历史过程中。既是转化，又是进程中，就有一个两种不同经营方式在时空上的交替过程。在这个“新老交替”之中，调动生产者的积极性，意味着有可能同时调动发展自然经济和发展商品经济两个方向的可能性。没有积极性，不论是什么经济都不能发展。但是，有了积极性，并不等于改革就完事大吉。责任制焕发出了广大农村居民救穷致富的积极性，同时也必然焕发出不同农民对富的不同追求，必然焕发出发展自然经济和发展商品经济两种具有不同社会含义的积极性。这本是题中应有之义。

对应贵州的毁林开荒，温州调查报告片断的结尾，必须添加一个累赘的定语：“是责任制解放了

千百万农民家庭的发展商品经济而不是发展自然经济的积极性！”

是否应当严格地说，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制的改革成功，不仅是在一般意义上调动了农村居民的生产积极性，而且是在特殊意义上调动了大部分地区农村居民发展商品经济的积极性。当然，这里丝毫不含有否认落后地区应当给农民“松绑”的意思，什么时候腿脚活络也比绑着强；这里也不是说落后地区农村居民发展生产的积极性没有发达地区农村居民高，干活不使劲。提出“双向积极性”的学术意义，首先能使我们看见表现在产值、国民收入等一系列经济指标背后更深层次的问题。

落后地区的真实落后程度，要比我们在第一章里用产值、发展速度等经济指标作成的耸人听闻的图表更严重。因为这些产值、速度等经济指标，相当一部分是通过自然经济的开发手段完成的。难听点说，甚至是通过自然经济的开发手段对自然经济发展的障碍同时也正是商品经济发展的资源大规模地排除——破坏完成的。这方向上的一正一反，直接影响到我们对落后地区已有产值或速度的主观评价。应该说，落后地区用自然经济手段实现的产值或速度越高，落后地区的落后就越严重，越突出。

由于经济实际运行的复杂，目前尚没有找到一种方法，能使这种方向上为负的产值或速度在统计上用阿拉伯数字表现出来。但是，明显的事实是，只要继续有荒可垦，有山可烧，落后地区的产值或速度就有可能继续提高，与发达地区的差距，也有可能比如今帐面上表现得更少。

摆在学术工作者面前的另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同一个责任制，会焕发出发展商品经济和发展自然经济两个方向上完全南辕北辙的生产积极性。三十年来，农村仍然很穷，很落后，原因是“大锅饭”体制捆住了农民的手脚。“松绑”是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的根本措施。但是，改革，并不因此而结束。如果说，对应具有西方经济学“经济人”假设资格，具有按商品经济原则从事生产和经营的发达地区居民，简单地“松绑”，至少能在“大方向”上直接带来商品经济的发展；那么，对落后地区“松绑”之后出现的自然经济发展的明显倾向，这种思想方法，就显得风飘水浮了。落后地区的现实，也许还有被发达国家和地区环绕的落后中国的现实（当然，并不只是开荒这一种现实）提醒我们：在对僵化的“大锅饭”体制申发出足够应有的义愤之后，真正需要展开的，是面对实际且理论意义巨大

的研究。

双向积极性，是我们研究中始终无法回避的基本问题。因为两种积极性的方向不一，力量却是同样地巨大。当贵州、云南的农民挥汗如雨地大砍其树之际，江苏、浙江的乡镇企业正如雨后春笋般地风起云涌；当西藏、青海的牧民顶风冒雪地流离颠沛之时，全国农村46.7万个新经济联合体，已有60%以上分布在沿海地区。① 最早“松绑”的贵州和最晚“松绑”的温州，最富资源的贵州和最缺资源的温州发生了什么？一个包干到户，转瞬间象出瓶的魔鬼，将沿海地区的传统流通体制冲得七零八落，捉襟见肘。同样是它，在贵州提前放出了几年，闹腾了一阵开荒砍树之后，竟偃旗息鼓，消声匿迹，融化在自然经济的凝固之中了。

何以使然？

人的素质。

3-3 人的素质

在西藏。

① 《人民日报》，1985年6月24日。

耦耕、木犁、“二牛抬杠”，几千年如一日，至今仍为农业生产的主要方式。多数地区通行撒播，前边播种，后面老鸹跟着吃。几乎所有日常运输全为自己的脊背，无论是收庄稼，还是盖房、铺路，水、草、石头、泥巴，都是一背就走，是不用小车的。老百姓对铁匠、木匠、石匠、皮匠、屠夫等“能工巧匠”，至今仍存有心理上的芥蒂，认为这些“分工分业”者是下等人、贱民、黑骨头的思想，远未消除。除了与世无争和宿命论的消极思想外，宗教中迷信色彩的影响，依然存在。生产、生活中遇到灾害或困难时，许多人求助于鬼神而不依靠自身的力量和创造性。遇虫不灭虫，遇旱不抗旱，烧香磕头，做法事请神。贝母是菩萨的心，万万不可多采。毛虫爬进糌粑口袋，也不能抓，那是杀生。修公路造孽，汽车一路驶来，皂白不分地轧死一系列小生命。就是富了，也忘不了神。昌都地区好不容易冒出一个“万元户”，结果修了一座经堂；以后又冒出一个“万元户”，又修了一个经堂，而且更大、更漂亮。于是，第一个“万元户”不服第二个“万元户”的气，下定决心，继续致富，要修一个更更大、更更漂亮的经堂。

在云南。

许多山区视放火烧山为人类行为之正宗，至今把做买卖、商品交换当成不光彩、不道德的勾当。养猪养鸡是为了自己吃，养牛是为了给别人看（夸富）。一户农民要种十多种以至几十种作物，以求自给自足。勐海县西定区有个重点户，杀了口猪在区上卖，卖了三天还没有卖完——没人买。勐腊县义武区一个哈尼族大队，大队长根据上级指示，下令群众去赶集。结果自己却在赶集的半路折了回来，——怕丢人。①

在贵州。

农村从事技术活的手艺人，大多为外省人。上至修桥铺路、烧砖盖房，下至修皮鞋、弹棉花，几乎全被湖南、四川、广东等省来的人包了。本地人学手艺、学技术的寥寥无几。有些必不可少的工程也甘心年复一年地请外省包工队来干，甚至连小工都不出，要外省包工队带来，安心作甩手掌柜，看着别人赚钱。笔者在贵州调查沿途，曾问过几个极为简单的盖房铺路小工程，从师傅到小工，全是外地人。

问：本地人为何不干？

答：不愿干。——？

① 张少杰等：《西双版纳地区经济考察》

是忙于种植业？安顺公路、铁路发达，位于黔滇咽喉要道，历史上即是商贾辐辏之地。地处平坝，又为地区所在地，社会进化程度远高于一般地区。即使如此，1983年水稻良种的播种面积比上年陡增22%，也不过占水稻总播种面积的42%；杂交玉米比上年陡增了25.8%，也不过占玉米播种面积的10%。山区就更别提了。黔南州罗甸县城关公社幸福大队会计黄世雄，是由省农科院科研人员李桂莲负责技术指导的科技示范户。1982年，李动员黄拿出二分地，采用地膜技术发展早熟蔬菜，为李无偿提供生产资料和技术指导。黄只同意给一厘地。后经县里同志反复做工作，这位大队会计才勉强同意。当李提早下种，覆盖地膜时，寨子里的人都劝黄不要冒这个险。一位本家甚至打赌说："要是盖上这东西还能长出菜来，我情愿输你一亩黄瓜！"①

镇宁县六马区，困难户中只有20%的户提出救济申请。大量农民甚至不知有社会救济这码事。

紫云县宗地公社中洞生产队15户63口人，祖祖辈辈住在一个暗无天日的山洞里，不洗澡，不洗衣服，吃洞里的水。亩产242斤，猪养得长毛细腿，

① 孙方明等：《不发达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

疾驰如飞，最重不过90斤。民委知道后，拿出三万元盖房子，让他们搬出来住。并用大轿车把能走动的人拉到贵阳去参观，使其接受新的生活方式。结果，居民们据此推断自己洞里肯定有宝，所以国家才费这么大劲动员他们搬家。于是，不搬了。

……

面对这样的素质，不要说没有多少智慧而言的“松绑”方案了，就是凯恩斯活转过来，又能奈之何呢？

不是资源的匮乏，不是产值的高低，也不是发展速度的快慢。人的素质差，才是所谓“落后”概念的本质规定。

人的素质，是一个抽象的模糊概念，可以从多种不同的角度加以区别和评价。人的素质，也具有多方面的表现意义，相应于不同的需要，有各种不同的素质要求。这里强调的人的素质，是相对于社会经济发展，尤其是商品经济发展而言的。直白地说，特指人从事商品生产和经营的素质。

1982年10月，我们在江西省的不发达地区——吉安地区（原井岗山地区）对农村居民的进取性

（企业家精神）进行了考察。调查采取问卷形式进行，在进取性量表中，包括创业冲动、风险等八个类别的指标，① 以其综合评分度量农民在进取性方面的态度、价值和行为。

① 量表中的八类指标分别如下：

改变取向　一个农民如果愿意为了提高产量、收入或生产效率而打破传统和习惯，改行新的农作技术、生产品种或经营项目等等，则进取性较高；反之则较低。

新经验　是否愿意追求或接受新的经历和体验，也同样说明农民在进取性高低方面的差异。

公共事务参与　对于公众的事情，如队（村）里的公益事业或者涉及各队（村）生产、生活方面重大问题的讨论和决策，是积极参加，还是在一定程度上参加，还是根本不关心，反映了农民进取性高低的另一方面。

效率感　效率感可从两方面衡量：一方面是生产和生活方面的独立性与自主性，另一方面是对科学技术发展的关心和信赖程度。这二者的高低都反映了农民进取性的高低。

见识　见识的多少，譬如说，可以列出多少自己想到的队（村）里面临的问题，从另一方面对农民的进取性进行了度量。

创业冲动　这也是衡量农民进取性高低的一个指标。譬如，是否愿意或在什么程度上愿意通过自己的艰苦劳动成为"冒尖户"。

风险　是否愿意冒风险或承受困难和挫折。譬如在劳动致富过程中所担心问题的多少和疑虑的大小，所担心问题发生后是放弃还是继续这种努力，也都反映农民进取性的高低。

计划性　度量农民进取性的最后一个方面，是农民在生产和生活方面的计划性的强弱。

调查结果表明，在本地农民与外省移民（绝大部分为浙江籍农民，因修水库由国家安排迁居至此）之间，存在着相当显著的差距。同一地区，同样环境下不同人群的素质差异，更能显示出人的素质差才是落后的本质规定。

表3—1 进取性比较

职业、身份	人 数	进取性综合评分均值
本地农民	377	54.61
本地社办企业工人	177	63.81
外省移民	108	67.42
合 计	622	59.16

在没有多少农村企业的落后地区，社办企业工人，大多为当地农村居民之精华，其现代化程度较高，眼界、见识、抱负、文化、知识等，一般要大大超出一般农民的水平。而上表的有意思之处在于，主要为浙江籍农民的外省移民，并没有经过专门挑选，其进取性综合评分的均值，不仅高于吉安地区本地居民，而且居然高于本地社办企业工人。如果以频数和频率计算，按各取三分之一的原则，将进取性评分的总分再划分为低、中、高三个区间，

则外省移民落入高分组的人数比例，大大高于本地农民和社办企业工人。人的素质差异竟如此悬殊。

表3—2　　进取性评分的分布

进取性等级区间 / 职业、身份 / 频率(%)	低 (1～53分)	中 (54～65分)	高 (66～100分)
本地农民	46.9	31.6	21.5
本地社办企业工人	21.5	32.1	46.4
外省移民	15.8	26.8	57.4
合　　计	35.0	31.0	34.0

与发达地区相比，落后地区农村居民普遍存在着进取不足而守成有余的明显特征。如：创业冲动微弱，易于满足；风险承受能力较低，不能抵御较大困难和挫折，不愿冒险；生产与生活中的独立性、主动性较差，有较重的依赖思想和听天由命的观念；难以打破传统和习惯，接受新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及大多数新事物、新现象；追求新经历、新体验的精神较差，安于现状，乐于守成，等等。这已是“既成事实”。

糟糕的是，这个既成事实，正在不断创造着新

的事实。

落后地区与发达地区一样，都在经历一个由传统到现代、由守成到开拓的观念变迁。由于落后地区人的观念变迁动力不足，速度自然较慢，则必然使其在这个一切都在飞速变化的变革时代，日益落后于发达地区的步伐，不断扩大着它们在人的素质方面的原有差距。在江西吉安地区的问卷调查中，19.6%的本地农民“对目前的生活水平”表示不满意，外省移民则有32.4%的人持此态度。相反，表示满意的，外省移民只有25.9%，本地农民却高达41.4%，**而外省移民的实际生活水平还略高于本地农民**。对于我们列出的在致富过程中有可能担心的问题，如“冒尖后别人会眼红”、“技术不过关会造成失败”、“不清楚政策，怕违反政策”、“政策会改变”等等，本地农民有32.3%对其中一类以上问题表示不担心，而外省移民中的同类比例却高达66.7%。

人的素质差异，表现出对现在以及对未来态度的明显差异。这种进取性的差异，在实际经济活动中，就成为第一章描绘的“马太效应”的原始动力。一步撵不上，步步撵不上。人的素质越差，越不思进取，当然也就越没有进取。反之，素质越

好，越思进取，当然也就有可能实现进取。人的素质差，不仅造成了目前落后地区落后的结果；而且还可能是造成将来落后地区更落后的原因。落后地区居民与发达地区居民进取性上的明显差距，特别是这种差距日趋扩大的倾向，最终预示着产值、国民收入等经济指标差距继续扩大的不良前景。

3-4 社会发育

家庭联产承包制实施之后，落后地区居民与发达地区居民截然不同的行动，使我们不得不摈弃在经济指标与社会指标之间划等号，甚至以经济指标取代社会指标的传统思想方法，开始从整个社会系统的发育程度来考虑问题。

如果将人类活动看成是一个统一的自然历史过程，那么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就几乎成了同义语。经济不发展，社会显然不能发展；反之，社会不发展，经济当然也就不能发展。二者似乎是同一事物的两面。用一种较长的眼光解释历史，这种思想方法是足够了。然而，在不同国家、不同区域之间，

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存在着巨大差异而又互相激烈碰撞、冲击的现代社会，人们碰到的研究课题，往往主要的不再是全人类的必然归宿，而是某一具体民族、具体地区在某种特定阶段经济如何振兴等问题时，就要不可避免地经常碰到社会发育程度与产值等纯经济指标表示的经济发展水平，在某种意义上可以互相脱离的现实。

五十年代，我国与日本的经济发展水平，用一系列经济指标看，是差不多的。资源占有水平，我国则极大地优于日本。结果，人家起飞了，我国落后了。个中的机关显然不能用中国人个头大小或者是智商的高低来解释。归咎于“大锅饭”体制，是常见的说法。倘若追究起来，还是有些牵强。“大锅饭”体制，毕竟不是日本人而是我们自己设计的。这本小册子碰到的问题，难就难在与上述问题相类似。如果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经济统计数字看，温州与贵州并没有十分要命的差距。随改革的阀门打开，短短时间里，两个地方的发展陡然出现了急剧的变化。如何解释这种现象，有助于我们提高对落后地区落后的认识。不管愿意不愿意，事实是经济指标表示的经济发展水平与社会发育程度不重叠。换言之，经济指标表示的经济发展水平，

不能直接用来说明社会发育程度。在没有具体指标之前，我们也只能硬说，尽管三中全会以前，温州与贵州的经济指标所表示的经济水平没有有意义的差距，但两个地方的社会发育程度却有明显的差距，前者积累了商品经济发展的“历史冲动”——其实是经济指标停留在很低的水平，但社会发育程度已满足了商品经济发展的要求；后者则保留了自然经济的惯性——换言之是社会发育程度还没有达到商品经济发展阶段的要求。因此，才会有农村改革之后，两个地方经济系统如此不同的运动轨迹和发展水平日趋拉大的差距。

下面，让我们从人的素质出发，对落后地区的社会发育状况进行尝试性的描画。

在吉安地区农村居民的进取性考察里，我们将进取性综合评分与个人基本情况作了复相关系分析，以此测定影响进取性高低的诸因素。排除若干不相关因素后，结果如表3—3。

表3—3　　影响进取性的诸因素

因　　素	偏相关系数	位　次
经营项目	0.242	1
国家扶持	-0.198	2
文化水平	0.162	3
大众传播	0.123	4
流动距离	0.107	5

注：1. 这里的偏相关系数表示在消除了其他因素的影响之后，单独一个因素与进取性之间的相互联系程度。在满足一定显著性水平的条件下，偏相关系数越大，表明该因素对进取性的作用越大，即在各因素中的权重越大。

2. 给定显著度为0.01（通俗地说，即犯错误——把不相关当作了相关——的可能性不超过1%），凡达不到此显著水平的因素，均被视作相关不显著，在表中已被剔除。

社会-经济结构

由表3—3得知，经营项目与进取性的偏相关系数达0.242，在诸因素中位居第一。经检验，显著度达到了0.001。这说明，经营项目的多少及复杂程度与农民进取性的高低有非常密切的联系，经营项目越丰富，越复杂，则经营者的进取性越高。与其它各因素相比较，经营项目对进取性的影响是最大的。

经济结构

经营项目单一。这是落后地区农村的普遍现象。

表3—4 五区三省与其他地区农业总产值的结构比较

1983年

地区	农(作物栽培)、林、牧、渔业(%)	副业(%)	在副业中：村办工业(%)
五区三省	87.0	13.0	5.3
非五区三省	82.0	18.0	14.3
全国	82.6	17.4	12.9

五区三省的副业，尤其是村办工业产值比重明显低于其他地区。个别省份的产值结构对比，则更为悬殊，见表3—5。

表3—5 贵州等四省农业总产值的结构比较

1983年

地区	农(作物栽培)林、牧、渔业(%)	副业(%)	在副业中：村办工业(%)
青海	92.6	7.4	5.5
贵州	83.0	17.0	5.4
江苏	74.0	26.0	24.1
浙江	70.9	29.1	24.1

在每百元农业产值中，来自副业的产值，浙江

省有29元，江苏省有26元，青海省仅有7元多；来自村办工业的产值，浙江和江苏各有24元，青海与贵州仅有5元多。

经济类型简单。落后地区绝大部分农村居民局限在家庭范围内，从事传统项目的经营。除一些互助性的松散联系外，真正跨家庭的村、乡内部社区性经济组织甚少，跨社区（乡以上）以纯粹经济关系为纽带的行业性经济组织，更属凤毛麟角。这里仅举乡镇企业为例。

表3—6　贵州、江苏乡镇企业比较

1983年

地　区	单位数（个）	从业人数（万人）	产值（亿元）	国家税金（亿元）	纯利润（亿元）
贵州	13549	20.89	3.47	0.24	0.47
江苏	70580	454.08	168.70	12.18	16.73
贵州/江苏(%)	19.2	4.6	2.1	1.97	2.8

撇去更差的西藏、青海等地区不说（如青海，1983年仅有乡镇企业2000个，仅为江苏的2.8%），即使较发达的贵州，乡镇企业个数也仅达江苏的19.2%，从业人数仅达江苏的4:6%，产值仅达江苏的2.1%，还不及后者缴纳国家税金的三分之一。

江苏省乡镇企业包括种植业、养殖业、工业、建筑业、运输业、商业和服务业。乡镇工业中，包括冶金、煤炭、化学、机械、电子、建筑材料、食品、纺织、缝纫、皮革、造纸等15个行业，可谓品种繁多，门类齐全。近年来，该省乡镇企业进入了开展多种形式联合，向专业化生产方向发展的新时期，城乡联合、跨地区联合、为大工业配套生产、参加专业公司组织的协作性生产、乡镇企业系统内部的联合等等均有了很大发展。1983 年无锡县 733 个乡镇企业，与上海、抚顺、无锡等市大专院校和科研单位挂钩协作，引进科技 项 目949项。常州市强调城乡工业结合，拟将乡镇工业一批批组织进各种“一条龙”生产体系中去，第一批进入 者 就 有县、乡企业256个。武进县乡办工业生产的一些电子元器件为上海“飞跃”、“凯歌”牌电视机配套，被上海报刊誉为“最佳配角”。无锡县有200多个乡镇工业分别参加县钢铁、印刷、电扇、锅炉四个总厂和一个专业服务公司的协作配套生产。

江、浙一带蓬勃发展的乡镇企业，连同大量涌现的专业户，多种形式的新经济联合体，户办和联户办的企业，以及以一项或多项副业为主体的多种经营专业村、专业乡，使农村经济关系异常活跃，经

营方式多种多样，经济联系广泛而复杂，城乡沟通程度很高，对于改善人的素质作用甚大。同时，在每万乡村人口中，江苏省有925.6人在乡镇企业中工作，贵州却只有89.5人，仅为江苏的9.7%，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延缓了落后地区人的素质的改善和提高。

社区功能①

落后地区农村的基本社区功能严重不足，表现得与经济结构同样明显。同全国其他地区类似，落后地区大部分乡村的基本社区是以集镇和小城镇为中心的集镇区。集镇区的功能节点——集镇或小城镇，是由社会经济生活的内聚力极化而成的社区中心，其基本功能是对整个集镇区在经济、社会、政治等方面的服务、协调与管理。社会经济生活的内聚力是由人、信息、资金和物质的流动而形成的，这些社会基本要素的流动频率越高，流量越大，则社区内部的一体化程度越高，不同单元之间的各种联系（如人际关系）越紧密，从而集镇或小城镇的极化程度越高，功能也就越完善。功能健全的集镇和小城镇，可以在商业、金融、生产服务、技术服

① 由于我国大城市的建立具有更多的超自然性质，而且后面还要有所涉及，故此处顺水推舟，仍以农村社区的情况描述。

务、工商管理、税务等经济方面，信息沟通、教育、文化生活、医疗卫生、生活服务等社会方面，以及行政管理、公安、司法等政治方面，对整个集镇区进行生产与生活上的服务和协调。因此，集镇的服务面积即集镇的密度，以及集镇是否存在具有上述功能的制度（机构）与组织，便成为度量基本社区的功能是否有效和完善的客观标准。

在落后地区，由于自然环境封闭，社会基础结构落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致使人、信息、资金、物质的流动不畅，社区内聚力不足，极化程度也就较差。因此，无论是在集镇和小城镇的数量还是在功能上，落后地区都不能与发达地区相比。

从集镇的密度看，江苏省62个县，有县属镇（建制镇）135个，平均每县2.2个。浙江省62个县，有县属镇158个，平均每县2.5个。贵州省82个县，只有县属镇115个，平均每县1.4个。大量存在的是非建制镇的乡镇。在江苏，有乡镇1765个，连同建制镇一起，平均每县共有30.6个集镇和小城镇。江苏全省平均每百平方公里有1.83个集镇，远高出每百平方公里0.6个的全国平均水平。江苏省每个集镇区的平均面积为54平方公里，仅为全国平均数169平方公里的32%。落后地区由于集镇稀少，

致使集镇区中距离集镇较远的地方难以得到名符其实的服务、交流与管理，大大降低了社区功能的有效性。如贵州，由于地处山区，很多地方只有区所在地是集镇，乡所在地只是普通的自然村。这时若把乡视作基本社区，则由于缺乏最基本的制度建设，社区功能很不完整；若把区视作基本社区，则又由于区域过大，且山高谷深，农民与社区中心以及其他社区成员的接触甚少，难以构成名符其实的基本社区。

从制度和组织的角度看，江苏省集镇与小城镇共有8095个商业、服务业网点，3042个农村集市。而贵州，集镇的商业经济活动十分有限，成交额仅有江苏省的36.2%。随着农村商品经济以及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江苏省集镇商业活动在经济形式、经营层次、流通渠道上逐步多样化，集镇商业一般都具有国营公司、供销社、集体商业、乡镇工厂门市部、多种经营服务公司、劳动服务公司、个体户、集市贸易等十多种形式和渠道。

在生产服务和技术普及方面，由于江苏省乡所在地基本上都是集镇，机构与组织较为齐全。贵州省由于大部分乡设在自然村，一般只有供销分社和信用社，其余机构如农业技术推广站、林业站、水

利站、兽医站、供销社、农行营业所，以及粮站、工商所、税务所等等，若有的话也都设在区所在地。服务范围大，服务人数多，专业技术人员又严重不足，再加上在自然环境和交通、邮电方面的不便，生产与技术服务几近于无。一般农民常年根本见不到技术员，有的地方几年都见不到。位于安顺——贵阳公路旁，距安顺市仅十余公里的安顺县大西桥公社，连公社书记都难得见到区农推站的人员。至于科普资料，公社、大队一级一般是无从问津。而在江苏，近三分之一的乡建立了科普组织，54个县编印了科普小报（平均每10个农户订阅一份），50个县定期举办科普广播讲座，五百多个乡镇开办农业技术学校。同时，还在集镇和小城镇上恢复和新建了119所农村职业中学，有561所普通高中附设了农业职业班。

在文化生活方面，到1983年底为止，江苏省已建农村集镇文化中心886个，文化站2223个，基本作到了一乡（镇）一站。集镇影剧院364座，80%以上的乡镇有了固定放映场所。全省县以下（包括县属镇和乡镇）图书发行点已达5330多个，平均每个集镇区2.8个。而在贵州，包含城市在内，全省仅有电影院190座。安顺地区，区社文化站仅有47

个，占区镇、公社个数的11.19%。公社文化站几近于无。全省共有供销社图书门市部和专柜400多个，不足江苏省的七分之一。

人际关系

与发达地区比较，落后地区的人际关系，明显具有经济关系商品性弱和社会关系传统性强两个特点。

1983年，江苏省农副业产品商品率达70%，贵州不超过40%，青海仅有30%左右。按乡村人口计

表3—7 贵州与江苏农村居民商品关系的比较

1983年

地区	每乡村人口平均社会农副产品收购额（元/人）	人均社会商品零售额（元/人）
贵州	57.54	146.69
江苏	205.50	338.19
全国	161.42	278.00
贵州/江苏(%)	28.0	43.4

注：由于城乡比例的不同，人均社会商品零售额中不能看出广大农村人口真实的商品消费情况。如贵州，按全省人口计算，社会商品零售额为全国平均水平的52.8%，实际上，该省城镇人口的社会商品零售额为403.41元/人，与全国水平488.8元/人相差不算太大；而乡村人口的社会商品零售额却只有86.51元/人，仅为全国水平213.09元/人的40.6%，每人足足少了126.58元！

算社会农副产品的人均收购额，贵州仅相当于江苏的28.0%；人均社会商品零售额，贵州只相当于江苏的43.4%。

由于经济发展呆滞，分工分业不发达，经济关系简单，社会关系因此简单而同一，社会结构同质性很强。从作为社会基本元的人和家庭来看，由于没有更多的选择机会，各自在社会生活方式（包括生产）以及价值观上也无大区别。社区，成了无数无差别个体的机械组合，象马克思所说，是同名数的简单相加。由于绝大多数农民的经济活动局限在家庭形式上，社区性的经济联系与组织很少，超社区的行业性经济组织罕见，在社会组织与社会关系上，落后地区农村往往仍以血缘为主。地缘组织甚少，业缘组织更绝无仅有，基本尚处于“首属群体”（初级群体）为主要社会生活形式的阶段。与发达地区比较，落后地区人的社会经历少而单纯，活动空间也更为狭小，家庭、邻里、朋友圈、村落、村群即为其主要活动区域。由于交通、信息状况和社区功能的严重不完善，连集镇区范围的社会活动都很少。社会组织及人际关系形式单一，人与人的互动以面对面的方式为主，互动频率很低。人与人的结合方式仍以情感为主要纽带，建立在理性

基础之上的相互利用、合作、竞争的成分不高。

经济结构、社区功能、人际关系三方面内容综合而成社会-经济结构，最终表现在经营项目的多寡和可能选择的空间上，形成对人的素质首要的影响。

社会基础结构

教育

在进取性调查里，文化水平与进取性的偏相关系数为0.162，达到了0.001的显著水平，在诸因素中

表3—8 全民文化水平比较

1983年

地区	全民平均受教育水平	全民平均受教育年限（年）	全民文化程度（人/万人）					12周岁以上人口的文盲率（%）
			大学	高中	初中	小学	文盲半文盲	
西藏	0.39	2.5	42	121	361	1647	5179	70.5
贵州	0.82	4.0	39	296	1142	2878	3210	47.6
全国	1.11	5.0	55	660	1780	3540	2350	31.9
西藏/全国（%）	35.1	50.0	76.4	18.3	20.3	46.5	2.2倍	2.2倍
贵州/全国（%）	73.9	80.0	70.9	44.8	64.2	81.3	1.4倍	1.5倍

注：全民平均受教育水平系采用加权法计算，大学4，高中3，初中2，小学1，文盲半文盲0。全民平均受教育年限的计算标准为：大学14，高中10，初中8，小学5，文盲半文盲1。

占第三位。这表明，农民的文化程度对进取性是有较大影响的。文化程度越高，进取性越强。文化水平的等级排列顺序为：文盲；初小；高小；初中；高中以上。

全民受教育水平差距如此悬殊，直接和落后地区教育事业之不发达密切相关，请简单浏览以下诸表：

表3—9　各类学校的在校学生比较

1983年

地区	平均每万人口在校学生数(人/万人)				
	高等学校	中等专业学校	普通中学	农业中学和职业中学	小学
五区三省	7.7	12.5	357.1	8.3	1383.8
非五区三省	12.4	10.9	440.8	12.5	1315.6
全国	11.8	11.2	429.1	11.9	1324.7

注：除小学、中专外，五区三省的每万人口中在校学生数均低于非五区三省和全国水平。中专生较多，与落后地区高等学校升学率较低有关，许多初中学生放弃“进高中→上大学”的道路，而选择中等专业学校。因为在上大学机会较少的情况下，唯其如此，农村学生才能脱离农村，城市学生才能避免待业。小学生较多，与对少数民族实行的人口政策有关，落后地区的小学适龄人口比例大于其他地区。

表3—10　各类学校在校学生分省比较　　1983年

地区	平均每万人口在校学生数(人/万人)				
	高等学校	中等专业学校	普通中学	农业中学和职业中学	小学
西藏	5.2	5.2	93.3	0.0	647.7
贵州	5.9	12.8	284.0	6.5	1433.3
湖北	15.5	9.3	505.7	16.1	1405.2
辽宁	18.5	14.1	500.7	21.8	1181.0
西藏/辽宁(%)	28.1	36.9	18.6	0.0	54.8
贵州/辽宁(%)	31.9	90.8	56.7	29.8	121.3

表3—11　普通教育的入学率和升学率

1983年

地区	适龄儿童入学率(%)	小学升学率(%)	初中升学率(%)
贵州	81.2	51.5	27.4
全国	94.0	67.3	35.5

表3—12　教师负担学生数

1983年

地区	平均每个教师负担学生数(人)			
	高等学校	中等专业学校	普通中学	小学
贵州	4.0	9.1	18.8	27.3
全国	4.0	7.3	16.9	25.0

表3—13　贵州省校舍和教职工宿舍

	应有面积（万平方米）	实有面积（万平方米）	实有/应有（%）	备　注
小学校舍	719.0	428.4	59.6	应有面积按3.5平方米/人计算
中学校舍	345.1	203.1	58.9	应有面积按4.5平方米/人计算
教职工宿舍	320.0			应有面积按42平方米/户，解决70%计算
合　计	1384.1	631.5	45.6	

表3—14　贵州省最基本的教学设备——课桌凳

1983年上半年

	应有数（套）	实有数（套）	实有/应有（%）	备　注
小学	2056800	1452300	70.6	应有数按一生一套计算
中学	787400	726400	92.3	
合计	2844200	2178700	76.6	

注：也就是说，有23.4%的学生即665500人没有桌凳，他们除数人挤坐外，有的只好站着听课。

表3—15 贵州省教学仪器设备

	应有数(万元)	实有数(万元)	实有/应有(%)	备注
中小学	1994.1	250	12.5	应有数系指按部颁二类标准配备
大专院校	6590.0	2090	31.7	应有数系按部颁标准计算
合计	8584.1	2340	27.3	

注：根据对10个县(分布在全省各个地区)的2368所小学、199所初中、30所完中、7所中专师范的调查。

表3—16 贵州省实验课开课率

1983年

	小学自然课中的实验课	物理、化学中的实验课		
		初中	完中	中师
能开出100%的(%)	0	0.5	13.3	0
〃 80% 〃	0.30	2.5	20.0	0
〃 60% 〃	2.10	3.0	6.7	28.6
〃 40% 〃	1.18	6.0	16.7	0
〃 20% 〃	0.26	9.0	10.0	14.3
〃 10% 〃	1.52	8.0	20.0	14.3
不能开的 〃	94.64	71.0	13.3	42.8

注：如此大量的学校无法开实验课，教师只好纸上谈兵，大发"空对空导弹"。

高等教育比普通教育也好不了多少。据贵州省教育厅的同志说，大学中基础实验课平均可开出60%，专业实验课20～30%，基础课可开出66%，师专可开出50%。新建院校则更差，如六盘水大

专班，一般理化实验也要将学生专程送到几百里以外的毕节师专去作。

教育部门办的学校尚且如此，大量的农民办学校之状况就不必再说了。

资料来源同表3—15。

表3—17 成 人 教 育

1983年

地区	平均每万人口成人教育在校学生数（人/万人）		
	成人高等学校	成人中等学校	成人初等学校
贵州	3.4	4.3	157.6
全国	11.0	95.1	79.7
贵州/全国(%)	30.9	4.5	197.7

注：1.成人高等学校包括广播电视大学、职工大学、业余大学、农民大学、函授大学、夜大学、管理干部学院、教育学院、中学教师进修学院。成人中等学校包括成人中等技术学校、成人中学、小学教师进修学校。成人初等学校包括小学班和扫盲班。

2.可以看出，无论是成人高等教育还是成人中等教育，贵州的水平都大大低于全国。而成人初等教育的数字高于全国，恰恰是由于贵州文盲半文盲比例高之故。按分类统计，在每万人口中，贵州小学班为6.2人/万人，仅为全国水平23.1人/万人的18.5%；而扫盲班却高达154.2人/万人，为全国水平51.6人/万人的3倍。

文化教育事业的落后，造成落后地区居民文化教育水平的低下，同样影响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人的素质的提高。落后的文化水平，使相当多数的人

满足或局限于直接经验所能把握的事物和传统事物，缺乏追求新经验和接受新事物的欲望及能力，直接影响人们的进取性、经营能力和掌握现代知识、技术的能力及干部的工作能力和管理水平。

信息沟通

在进取性调查里，农民对大众传播工具的利用程度与进取性的偏相关系数为0.128，在诸因素中占第四位。大众传播利用的等级是按照农民听广播和看报纸的天数排列的，其顺序为：从不；很少；一星期几天；每天。

这二者之间呈现出相关关系，表明农民进取性的高低与大众传播水平的高低是有联系的，听广播和看报纸的次数越频繁，则进取性越高。有关信息沟通的事业发展，对落后地区人的素质的影响，同样至关重要。

五区三省面积占全国总面积的58.85%，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13.86%，1983年邮电业务总量仅占全国的11.41%。请看表3—18至表3—20。

如此巨大的差距，再加上交通不便，无疑为落后地区的邮电服务带来极大困难。如西藏，邮电局所的平均服务面积竟高达10,169平方公里，而每平方公里的邮路长度仅有61米，架空明线杆路长度

表3—18 五区三省与其他地区邮电业务量的比较

1983年

地 区	人均邮电业务总量（元）	人均函件（件）	人均报刊期发数（份）	人均电报（份）	人均长途电话（张）
五区三省	1.79	2.74	0.19	0.20	0.18
非五区三省	2.23	3.55	0.23	0.17	0.27
全 国	2.17	3.44	0.22	0.18	0.26

注：除电报外，五区三省的各项指标均低于全国和其他地区，而电报份数多，是由于其长话使用率远低于全国及其他地区之故。

表3—19 贵州与浙江邮电业务量比较

1983年

地 区	人均邮电业务总量（元）	人均函件（件）	人均报刊期发数（份）	人均电报（份）	人均长途电话（张）
贵 州	1.10	1.72	0.12	0.10	0.11
浙 江	3.15	5.85	0.22	0.23	0.40
贵州/浙江(%)	34.9	29.4	54.5	43.5	27.5

表3—20　五区三省与其他地区邮电通讯网比较

1983年

地　区	每一邮电局、所的平均服务面积（平方公里）	邮路密度（公里/平方公里）	架空明线杆路密度（公里/平方公里）
五区三省	720.0	0.168	0.110
非五区三省	89.8	0.958	0.645
全　国	191.4	0.477	0.319
五区三省/非五区三省	8倍	17.5%	17.1%

表3—21　贵州安顺地区邮电服务状况（1）

1983年第四季度

	订报率（%）	亲投率			
		合　计	其中		
			每天一次	两天一次	三天一次
公　社	100.0	100.0	44.1	44.4	11.5
大　队	58.2	63.5	27.3	28.8	7.4
生产队	20.3	45.7	16.5	22.6	6.6

注：订报指主要报刊，即《红旗》、《人民日报》、《贵州日报》中任何一种。

仅有8.7米！在五区三省中邮电通信网最为完善的贵州截至1983年底，还有32个区（占6%）无直达电路，75%的公社（近2900个）无邮电所，与全国

水平（35.3%）相比，高出1.1倍。省内14个县城（占17%）要在三天后才能看到省报，70%的公社（近2700个）二至四天才得到一次邮件投递。安顺地处交通要道，已是条件甚好的地区，邮电服务状况仍令人吃惊。

可知，有41.8%的大队和79.7%的生产队未订主要报刊，有36.5%的大队和54.3%的生产队是靠捎转得到邮件报刊的。后者仅为全国水平的66.8%和65.9%。以上数字是出自于正式报表，据该地区邮电局负责同志提供的数字，水平还要低，如表3—22所示。

表3—22　贵州安顺地区邮电服务状况（2）

	数目（个）	订报的(个)	订报率(%)	亲投率(%)
公　社	329	328	99.7	95以上
大　队	2755	1332	48.3	20左右
生产队	22299	4434	19.9	17左右

照此数字，竟有一个公社未订主要报刊，有80%左右的大队和83%左右的生产队要靠捎转。况且，亲投数字中，还包括了一部分公路沿线和集中在区、公社所在地的大队和生产队。

自然条件和社会经济水平均居全省前列的安顺地区尚且如此，其它地区以及全省平均的水平就可想而知了。就是在安顺地区中，也不乏水平更差的县份。笔者到过的镇宁县即为一例。

表3—23 贵州镇宁县邮电服务状况

1983年第四季度

	订报率（%）	亲投率（%）			
		合计	其中		
			每天一次	两天一次	三天一次
公社	100.0	100.0	28.1	71.9	—
大队	16.5	15.0	7.4	7.6	—
生产队	4.2	3.0	1.0	1.8	0.7

有83.5%的大队和95.8%的生产队未订主要报刊，85%的大队和97%的生产队得不到亲投1 1981年，镇宁县1731个生产队中甚至没有一个队订阅《贵州日报》。该县六马区区长说："邮路只通至公社，再往下走要等熟人顺路捎转，日报变成周报、半月报、月报。"

至1982年，贵州全省电话普及率为0.23部/百人，仅为全国水平0.46部/百人的1/2。农村电话为

0.06户/百人，为全国水平0.10户/百人的60%。这不过是纸面上的数字，其中有多少能够使用或保持畅通，尚属疑问。从统计上看，有98.9%的公社、18.6%的大队和4.8%的生产队通电话，而实际上，真实的数字远低于此。因为：

第一，这个数字中包括了区、公社所在地和周围一些大队、生产队，以及大队所在地的生产队。电话通到区、公社或大队，则这些大队、生产队都算作通电话。电话共用，分别统计，故上述数字不可叠加。安顺地区，329个公社（占100%）、474个大队（占17.4%）和1930个生产队（占9%）通电话，照此计算，共有2733个电话用户。实际上，全部农村电话只有1213户，连其一半都不够。

第二，全省现有农话线路，85%是1956～1958年合作化、大跃进时架设的，至今未大修过。农话线路多为"用户线"，即直径2.5～3.0毫米的弯钩铁线，经10年左右，就因生锈腐蚀致使线径过细而不能使用了。据笔者实际调查，安顺地区共4213公里电话线路，45%失修，40%的线生锈，而且，都是20年前的老线路。即使是从县至区的2596公里线路，也有50%失修。该地区关岭县32个公社，8个不通电话。镇宁六马区9个公社，2个公社半通，1个不通，

而且已经是两年多不通了。区里若要开会，花钱雇人通知，5元钱一天，把边远的4个公社一个个跑到要花4天时间。紫云县打狼公社，仅8个大队，开会要提前六天派人通知，才能一一跑到。

第三，新设立公社的电话归县里管，不归地区以上的邮电部门，故通电话的公社比例要比省、地邮电部门提供的数字为小。安顺地区，新增公社20个，只有6个架了电话，余14个都不通，而从前面邮电局提供的数字看，公社一级却是100%通电话的。

广播电视的情况更加不妙。请看表3—24。

表3—24　贵州广播电视状况

1982年

地　区	广播人口覆盖率（%）	电视人口覆盖率（%）	有线广播入户率（%）
贵　州	22.5	20.6	6.1
全　国	64.1	57.3	44.0
贵州/全国	35.1	36.0	13.9
居全国位次	第29位	第25位	第26位

可知，广播及电视的人口覆盖率均仅为全国水平的1/3强，有线广播的入户率则还不及全国水平

的1/7，竟有93.9%的户没有有线广播。

1982年，贵州全省仅制作了41小时的电视节目，占全国地方节目5622小时的0.73%，与青海并列为全国倒数第二，仅高于西藏。到了1983年，这项指标进一步下降到17.9小时，成为全国倒数第一。这17.9个小时分布在335个电视节目（居全国倒数第二）上，每个节目仅3.2分钟。

交通运输

在我们关于进取性的调查里，农民的流动距离与其进取性的相关系数为0.107，在诸因素中占第五位。这说明，农民活动范围越大，到过的地方越远，越多，见识越丰富，则进取性越高。

流动距离的等级是按照调查对象所到过的地方的远近排列的，其顺序为：本县、本省外县，邻省，隔省。

要流动，特别是经营性的流动，首先得要有交通条件。于是，又引出一些比较表格来。

五区三省的平均运输线路密度仅相当于其他地区的19.0%，全国平均水平的37.5%。与非五区三省平均水平相比，新疆、西藏、青海、内蒙的运输线路密度分别为其6.7%，8.1%，10.6%，17.4%；若与江苏这样的发达地区相比，则分别为其3.2%，

表3—25　落后地区与其他地区运输线路密度的比较

1983年

地　区	运输线路密度（公里/平方公里）	地　区	运输线路密度（公里/平方公里）
五区三省	4.20	非五区三省	22.05
其中：新疆	1.47	其中：江苏	45.55
西藏	1.79	广东	34.23
青海	2.33	浙江	32.85
内蒙	3.83	福建	32.79

3.9%，5.1%，8.4%。

贵州运输线路密度不算很低，达17.45公里/平方公里，甚至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由于山高谷深，全省现还有17.6%的公社和47.9%的大队不通公路。在通公路的社队中，还有相当一部分实际上是半通半不通的。镇宁县六马区，9个公社，真正通公路的只有3个，均在区所在地的周围。半通的3个，纯粹不通的3个，后者连公路的影子都没有，均距区公所数十公里之遥。70个大队，只有13个通公路。区公所距县城64公里，亦处于半通状态，1982年有整整一个月至县里的公路、电话都不通。因此，光看通车里程不行。在落后地区，普通存在着公路技术标准低、质量差、通过能力小的问题。

表3—26　贵州公路运输状况

1982年

	公路占运输线路长度的比重（%）	等外公路占公路通车里程的比重（%）	公路运输成本（元/千吨公里）	公路运输油耗（升/百吨公里）
贵　州	90.1	77.5	192	11.1
全　国	85.1	39.0	163	8.1

公路是贵州省交通运输的大头，所占比例达90%以上，高于全国平均比重。在这些公路中，列等公路（四级以上）只占公路总里程的22.5%，等外公路所占比例则高达77.5%，为全国之最，高过全国平均水平一倍。由于路面质量太差，吨公里运输成本和油耗也均高于全国水平。

交通运输的发展，尤其是公路运输，与社会经济的发展关系极为密切。一方面，没有交通运输的发展，商品经济的繁荣是不可能的。据中国汽车工业公司1983年底的调查，全国农村平均每增加万元产值，公路运输货物周转量就要相应增加150～180万吨公里。恶劣的交通状况，大大限制了货物的流通与周转，必然严重阻滞商品生产的发展。这在落后地区甚为明显。

五区三省的人均货物周转量仅为全国平均水平

表3—27　五区三省与其他地区人均货运量比较

1983年

地　　区	人均货物周转量（吨公里/人）
全　国	930.9
非五区三省	1349.2
五区三省	594.9
其中：西藏	202.1
云南	216.9
青海	281.7
贵州	387.7

的63.9%，非五区三省地区的44.1%。西藏、云南、青海、贵州与非五区三省相比，仅为其15.0%，16.1%，20.9%和28.7%。

当然，一个地区货物周转量的多少，不仅取决于供给（交通运输状况），还取决于需求（经济发展状况）。而在落后地区，供给的限制作用无疑更大。贵州著名的六马桐油向外运输有相当部分要靠马驮，一匹马驮几十斤至百把斤，要走2～3天。六马区坝草公社，曾有10多万斤蔗糖因运不出来而化成水。全区几百万斤龙须草运不出去。大量的青桐果和青桐枝同样烂在山上。梨子、橄榄无人要。芭蕉运不出来，100斤只能卖1元多钱。镇宁县沙子公社

甲闹乡，年产黄果30万斤，烂10万斤，因运输靠马驮，要走2天才能拉出来。紫云县打狼公社，卖猪要请四人抬，跋山涉水，来回两天，仅路费开销便花去30～40元，占卖猪收入的40%。

另一方面，交通运输状况落后，也使人的素质大受影响，它与落后的信息沟通、智力开发、技术服务一起（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它们的发展），并通过对于商品经济的阻碍，使人难以摆脱闭塞、落后、无知、守旧和不思进取、安于守成的状况。请看表3—27。

表3—27　贵州、青海旅客周转量与全国平均水平的比较　　1983年

地　区	人均旅客周转量（人公里/人）	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
全　国	302.0	—
贵　州	75.0	24.8
青　海	109.1	36.1

旅客周转量低，意味着人的流动少，人的活动半径小，因而其见识、新经验、改变取向、接受新事物的数量和能力都大受影响，从而延缓了人的素质由传统到现代，由保守到进取，由守成到开拓的变迁过程。

到此为止，我们初步完成了包括人的素质、社会-经济结构和社会基础结构在内的落后地区社会系统发育程度的勾画。显然，与发达地区相比，这是一个幼稚得多的社会系统。

到此为止，我们也走完了本章的分析全过程：落后的社会基础结构，延缓了社会-经济结构和人的现代化进程；传统的社会-经济结构和商品生产素质低下的人，无法有效地开发和利用各种资源，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而资源开发、利用水平及人的素质的低下，又牢牢拖住了社会基础结构步履蹒跚的腿。这就是幼稚社会系统及其贫困恶性循环，它告诉我们：研究落后地区的经济开发问题，必须拓宽视界，同时面对“经济人”假设之外的非经济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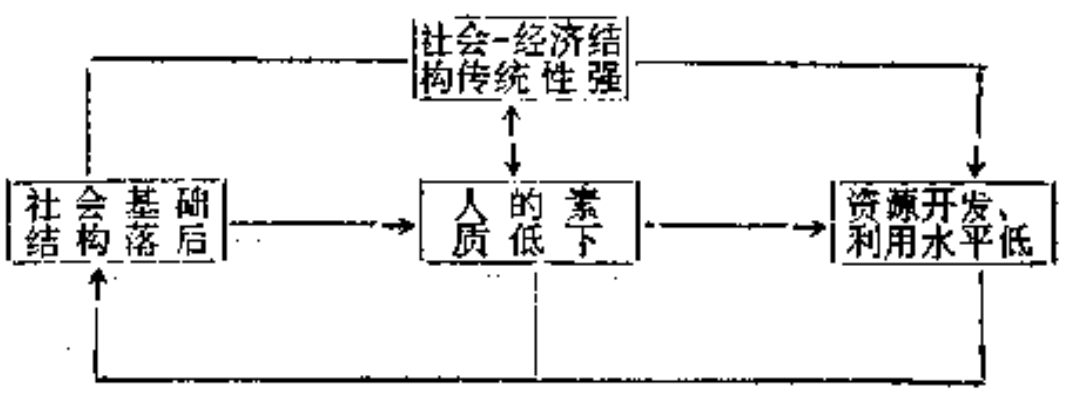

图3-1　幼稚社会系统

第四章

出路何在

桓公观于厩，问厩吏曰："厩何事最难？"厩吏未对，管仲对曰："夷吾尝为圉人矣，傅马技最难：先傅曲木，曲木又求曲木，曲木已傅，直木无所施矣；先傅直木，直木又求直木，直木已傅，曲木亦无所施矣。"

《管子·小问篇》

4-1 越输血越贫血

援助，是帮助落后地区摆脱贫穷的必然行动，也是六十年代发展经济学对落后国家经济发展的通行观点。

"国家在民族自治地方的基本建设投资，从1950年到1980年的三十年中共计达691.12亿元，在财力方面，国家每年对少数民族地区发放各种贷款、救济款和生产补助费等，仅民族地区补助费、边疆建设事业补助费、基本建设补助费，支援不发达地区发

展资金等专款，每年即达10亿元左右。”① 如果说“全国一盘棋”，占国土面积60%左右的地区只花了全国几千亿基本建设投资中的700亿，确实不是多了，而是少了。但是，如果用发展经济学的眼光，把这些地区看成是相对独立的经济体系，考察中央财政支援与本地经济体系的相对关系，不谈经济效益，不谈这些地区对全国的贡献，问题也是相当严重的。

表4—1 黔、青、蒙、藏四省地方财政收入与中央财政补贴

1983年

项目 \ 地区	贵州	青海	内蒙古	西藏
地方财政收入(万元)	87233	15637	69000	-5988
中央财政补贴(万元)	68224	54226	180000	68655
中央财政补贴占总收入的比例(%)	43.89	77.62	72.29	100.00
中央财政补贴相当于地方财政收入的比例(%)	78.21	346.78	260.87	~

财政入不敷出，是落后地区的共同特征。这与每年上交中央财政近百亿元的江苏等发达省份，

① 施正一：《要从战略眼光来看待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战略的问题》，《民族经济学研究》，第二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41页

是不能比拟的。但是，中央财力支援下的经济建设搞了多年，这些地区财政支出的大部分、甚至全部至今仍然依赖中央财政补助，显然是值得研究的。

储蓄剩余

资金不足，是落后地区的题中应有之义。借债也好，白给也好，总需要有外援。据此，西方学者钱纳利和斯操特在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中，曾在哈罗德等人客观经济分析的基础上，发明了“两个缺口”模型，即

从总支出方面看：$Y' = C + I + E$，即总支出等于消费加投资加出口；

从总供给方面看：$Y' = C + S + M$，即总供给等于消费的供应加储蓄加进口。

这两个恒等式合起来，便是 $I - S = M - E$，即投资和储蓄之差等于进口和出口之差。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这是两个缺口：一个是$I - S$，即储蓄缺口；一个是$M - E$，即外贸缺口。根据这个分析，发展中国家一方面由于人均收入水平低而储蓄水平太低，如需要提高投资率，那就需要利用外国储蓄；另一方面由于增加投资需要购置大量的外国机

器和设备，便会出现外贸入超。换言之，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既要应付外贸逆差（即外汇不足）问题，又要处理储蓄不足问题，这都需要外资。外资可以弥补这两个缺口，因此在政策上就要注重外援。这个理论在五十和六十年代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很有影响。

五十～六十年代，英美等资本输出国外援的数量曾一度增加很快，印度等发展中国家也曾得到很多外资。从绝对值上说，有了外资肯定与没有不一样；但是，若以摆脱贫困和落后的目标来要求，效果是令人失望的。对应我国落后地区的发展过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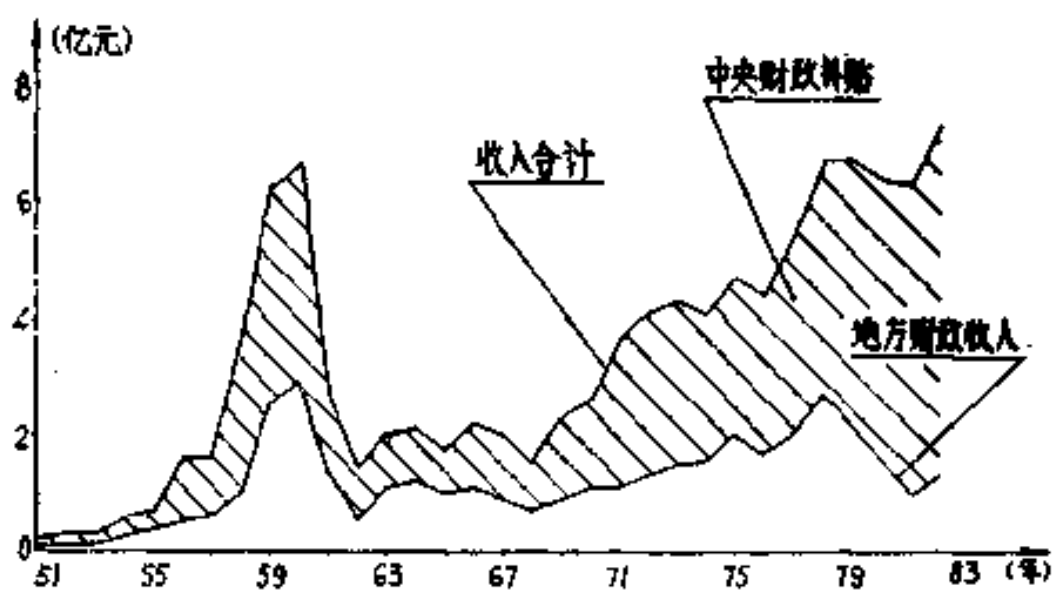

图4—1　青海地方财政收入与中央财政补助30年来的变化

注：本地财政收入占财政总收入的比重，最高为1965年的60.10%；以后逐步下降，1982年仅为17.8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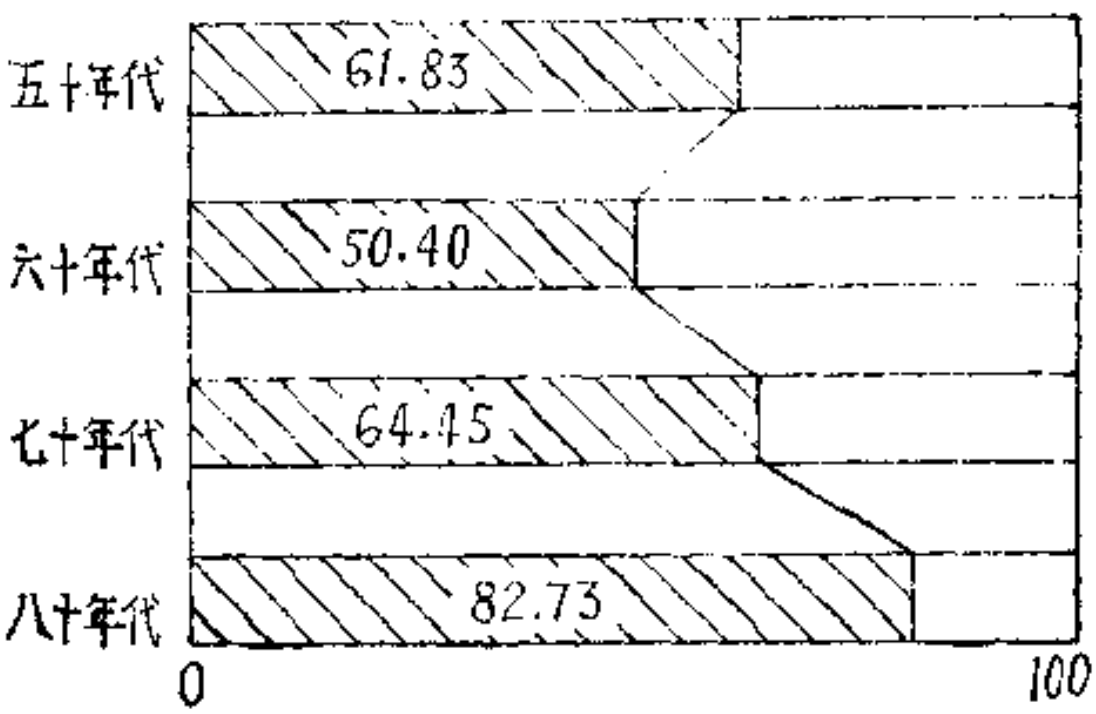

图4—2　青海中央财政补贴占地方财政总收入的比重

看，这种简单依赖外援的理论，更显得大谬不然。按说，有国家无条件大量白给的资金，又不需要象外资那样还得谈判和还本付息，落后地区的问题早应该得到很好的解决，结果呢？

从1951～1983年，青海省地方财政收入合计406507万元，中央财政补贴737145万元，等于地方财政收入的181%。中央财政补贴占地方财政总收入的比重，已由50年代的62%，上升到80年代的83%。地方财政收支越来越多地依赖中央财政补贴过日子，已成不可逆转之势。

西藏的情况是最不理想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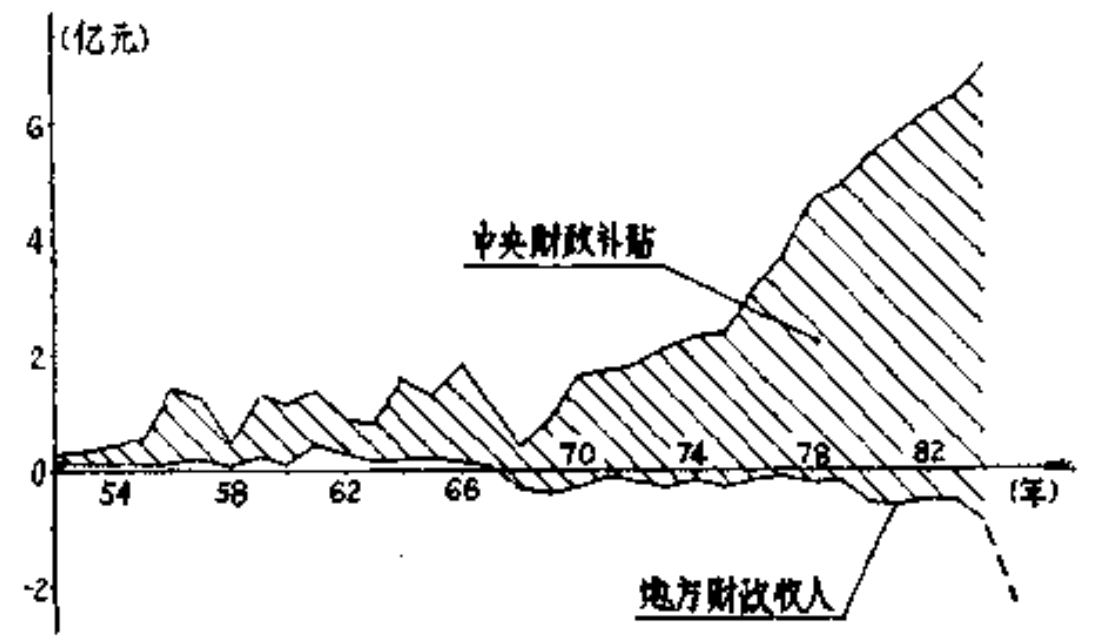

图4—3　西藏地方财政收入与中央财政补贴

1983年，全区国民收入5.8亿，国民收入使用额10.5亿，使用额竟为收入额的180.79%。这完全是靠中央财政补贴支撑的。

从1955年开始，中央财政补贴就占了绝对优势。1967年地方财政收入曲线过零点至今，再也没有成为过正数，财政收支100%地要靠中央财政补贴来维持。西藏1952～1983年累计，中央财政补贴708815万元，地方财政收入干脆－16294万元。三十余年的平均趋势是，青海的中央财政补贴平均以每年14.3%的速度递增，本地财政收入的平均增长速度仅为9.4%。也即是说，本地财政收入增加1元，需要中央财政补贴相应增加1.52元。西藏更干

脆，中央财政补贴平均每年增长14.97%，地方财政收入则以年均14.12%的速度递减。中央给的钱倒成“赶星”了，补贴越多，收入越少，亏损越大。

财政收支指标，鲜明地表明落后地区缺少资金的困难。但是，财政赤字与经济学“储蓄不足”所代表的社会投资资金不足并不是一码事。从统计数字上说，虽然银行系统的年末存贷差额不能反映资金供求的实际水平，但和全国平均水平比较，落后地区的资金不足，似乎并不严重。相反，在全国资金紧张、很多省份贷大于存的情况下，落后地区的银行系统则几乎都是存大于贷。而且越落后，存差越大。1982年新疆银行存大于贷，相当于年末存款余额的43%。1983年青海银行在1982年存大于贷10亿元的基础上，存款余额增加了15%，贷款余额只增加10%，年末存差额居然与贷款余额一样多，相当于存款余额的50%。同年，落后地区中较先进的贵州银行倒是贷差行，不过贷差只相当于年末存款余额的0.79%，几乎可以忽略不计。1984年，全国银根异常宽松，诸多银行为争基数送款上门的情况下，贵州资金竟外流了7亿多元，相当于当年地方财政收入的80%，**等于把中央给的近7亿财政补贴全部外流。**

西藏农村是全国最穷困的农村之一，按“两个缺口”理论，也应是资金最不足，或曰“储蓄不足”程度最严重因而也是最需引进“外资”的农村之一。1983年，农业银行农村居民存款年末余额4424万元，贷款余额仅1160万元。全年“社队生产费用贷款”和“社队生产设备贷款”两项，居然没有发生额。信用社1983年存款余额13082万元，各项贷款余额仅1469万元；存差竟相当于存款余额的89%。全年贷款累计发放，也才1877万元；就按单位贷款一年只贷出一次计，也有86%的存款连窝都没动。

落后地区发生的究竟是“储蓄缺口”，还是“储蓄剩余”？究竟是投资需求不足，还是资金供给不足？究竟是缺钱花，还是有钱没处花？这个问题十分费解。就眼前的帐面数字能否说明，虽然落后地区找国家要钱要的很厉害，但至少并不一定存在西方发展经济学说的那种“储蓄缺口”。由于我国银行存贷款利率不能浮动，年末存贷差额又不能反映资金运动的实际规模，我们尚未找到循财政赤字和银行黑字线索，继续挖掘其理论含义的途径。至少贵州巨额资金外流和西藏农村86%存款一次未动的事例，更重要的是在落后地区实地考察的感

觉，使我们敢于作出一个危险而大胆的假设：中央给的钱，**并不是满足由本地投资需求而产生的资金不足**的。因而**中央财政补贴的资金运动与本地经济的资金运动，事实上处于“老死不相往来”的分割隔绝状态。**

“两个缺口”模型的前提假设有二：

第一、落后地区有超过当地资金供给能力的投资冲动。——所以才会发生由于收入水平低而导致的储蓄不足与投资需求旺盛之间的“储蓄缺口”；

第二、从长远看，一段时间内的“外资”引进，能够使落后地区吸收先进技术，扩大“出口”，以最终平衡“外贸缺口”。

第二个假设显然要以第一个假设为前提。落后地区不仅要有投资致富的主观愿望，而且要有投资致富的现实资金运动和能力，才谈得上通过扩大出口抑或进口替代等发展战略，最终平衡“外贸缺口”的可能性。穷，并不直接等于缺钱。在江苏、浙江等一些人的素质较高的地区，投资致富冲动导引出的资金需求，是会与储蓄水平所能实现的资金供给，发生相当明显的差距。这些地区银行系统大多贷大于存，仍不能满足投资需要，民间高利信贷十分活跃。在当地资金运动已经充分活跃起来的条件

下，投入或引进“外资”、购进先进技术设备，很快即能使“外资”与“内资”的运动融为一体，加速资金运动，扩大投资规模，增强经济实力。而在人的素质较差的落后地区，居民致富愿望往往通过不用交换（因而也不用钱）的自然经济手段实现，这时即使投入资金，甚至大规模地投入资金，只要不能很快改变自然经济的生产方式，当地资金运动就会与外部输入资金的运动，形成格格不入的“两张皮”。这就是西方发展经济学“两个缺口”模型，在我国落后地区，“储蓄缺口”变成了“储蓄剩余”，财政资金不足而信贷资金过剩的根本原因。固然，据此得出结论说落后地区毋须中央财政补贴，无疑是荒谬的。突出落后地区“储蓄剩余”的目的，只是企图指出，在“两个缺口”理论最重要的“经济人”假设不存在，“自然人”货币投资动力不足的条件下，靠与内部资金运动不相干的外部资金输入造成的所谓“经济发展”，必然成为自然经济沙漠上的海市蜃楼。

“外资”买“外货”

1983年，西藏人均工农业总产值364元。中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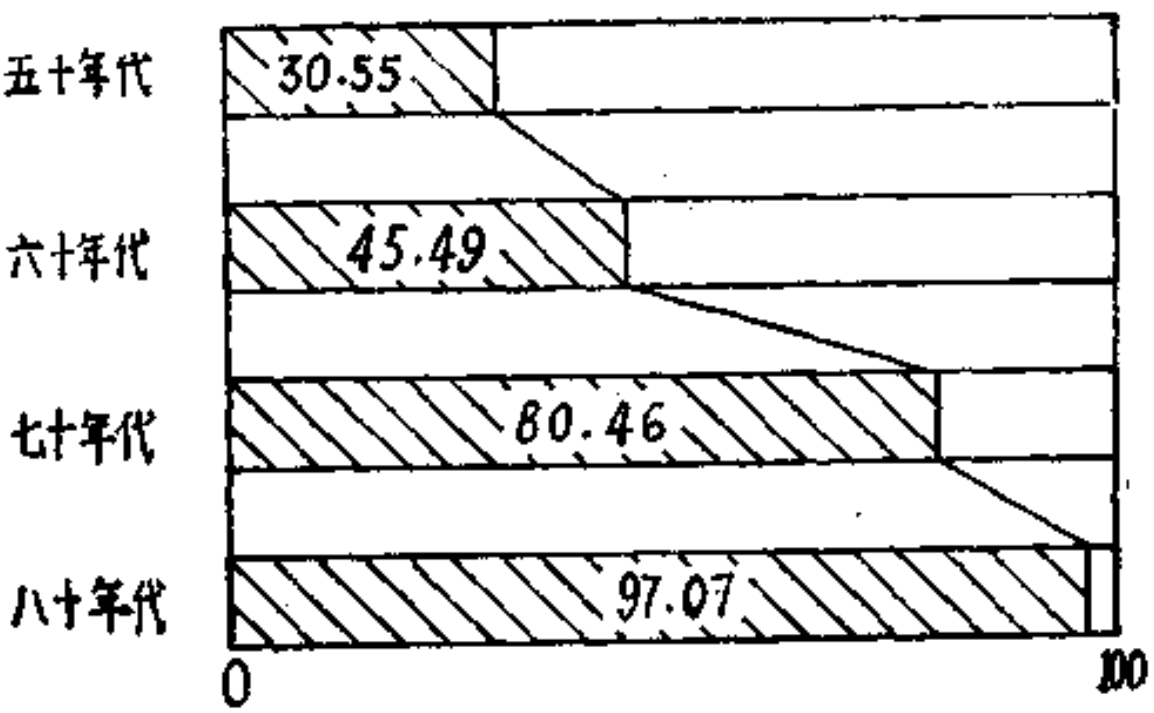

图4—4　西藏中央财政补贴相当于工农业总产值的比例（以工农业总产值为100%）

财政补贴人均357元，相当于工农业总产值的98%。补贴到这种程度，确为世间所仅见。工农业总产值的计算方法比较复杂，不能说倘若没有中央财政补贴，西藏人均工农业总产值就只有7块钱了。然而，西藏工农业总产值的实现，在绝大程度上靠中央财政补贴实现，是可以肯定的。笔者对1957～1983年的数据进行相关分析回归分析，中央财政补贴与工农业总产值之间的相关系数高达0.9728，斜率为1.2368。即每增加1元工农业总产值，中央财政补贴要相应增加1.24元。

中央给的钱，很大部分，是直接用来买内地的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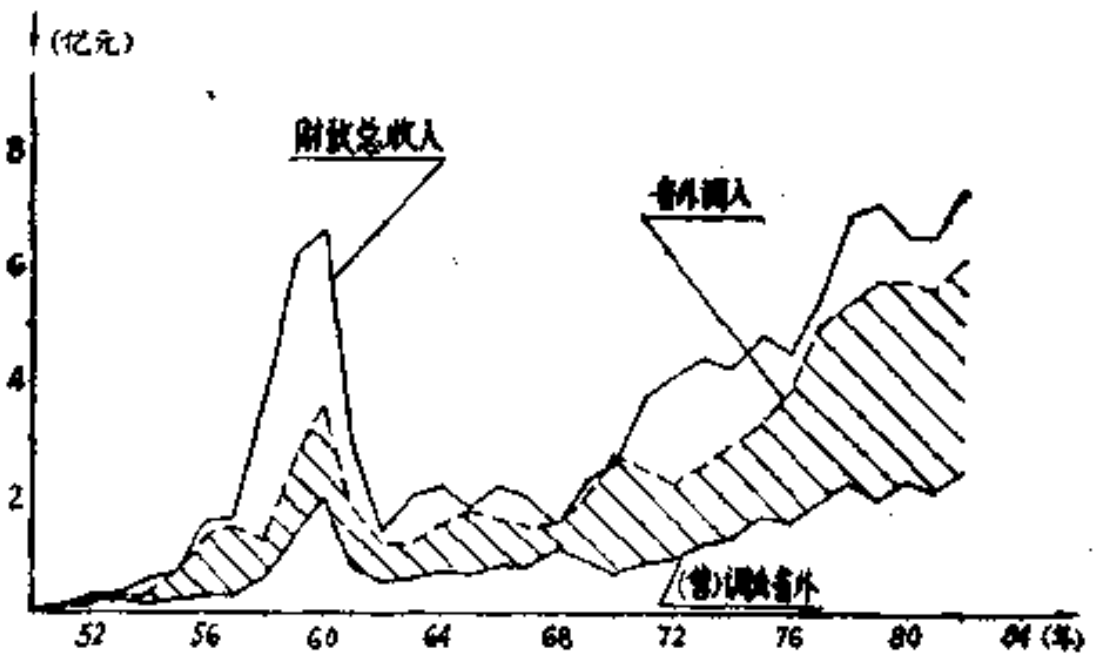

图4—5　青海商业部门商品调入调出总额与财政总收入

图中阴影部分为“进出口”逆差。在中央财政补贴占地方财政总收入80%以上的情况下，逆差部分无可选择地要由中央财政补贴来偿付。1980～1982年三年内，“进出口”逆差用去财政总收入的65.29%；按中央财政补贴占财政总收入的份额82.73%计，中央给的钱，一半以上是用作平衡“外贸缺口”的偿付手段了。

西藏本地财政很早即为负值，财政支出几乎全靠中央财政补贴，情况可以看得更清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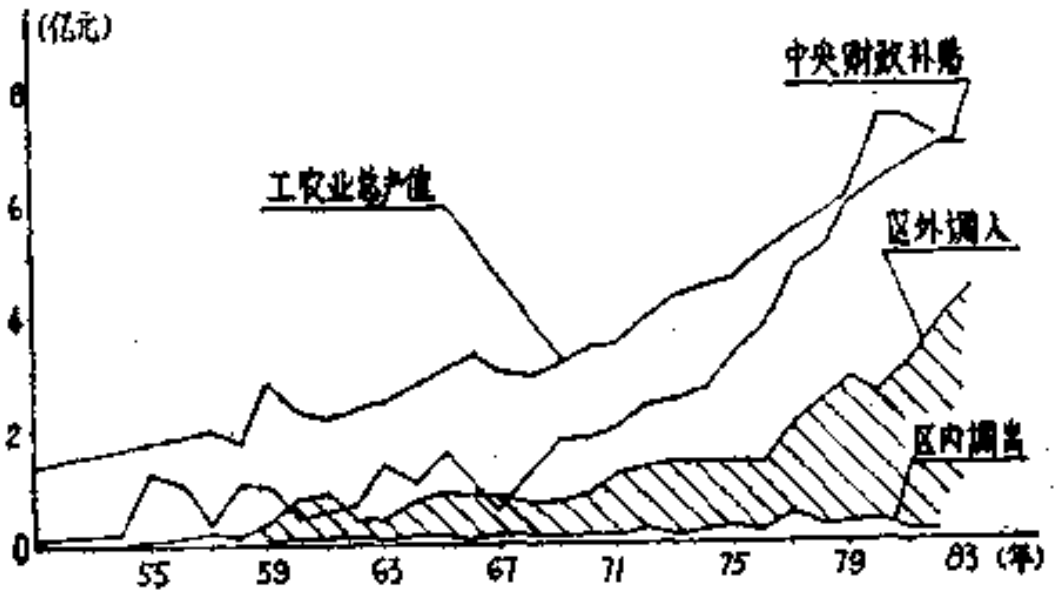

图4 6 西藏的“进出口”逆差与中央财政补贴和工农业总产值

上图至少告诉我们两个问题：

第一、以工农业总产值为标志的落后地区经济越发展，“进出口”逆差越大。反过来说是一样的。落后地区经济的所谓“发展”，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于脆就是靠日趋扩大的逆差完成的。1959～1983年，西藏工农业总产值与“进出口”逆差的相关系数高达0.9157。“进出口”逆差，已越来越成为落后地区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个趋势不是在弱化，而是在不断强化。1953～1983年，青海省工农业总产值的平均递增速度是6.68%；同期“进出口”逆差的增长速度则为年均递增14.58%。西藏前者的速度是5.45%，后者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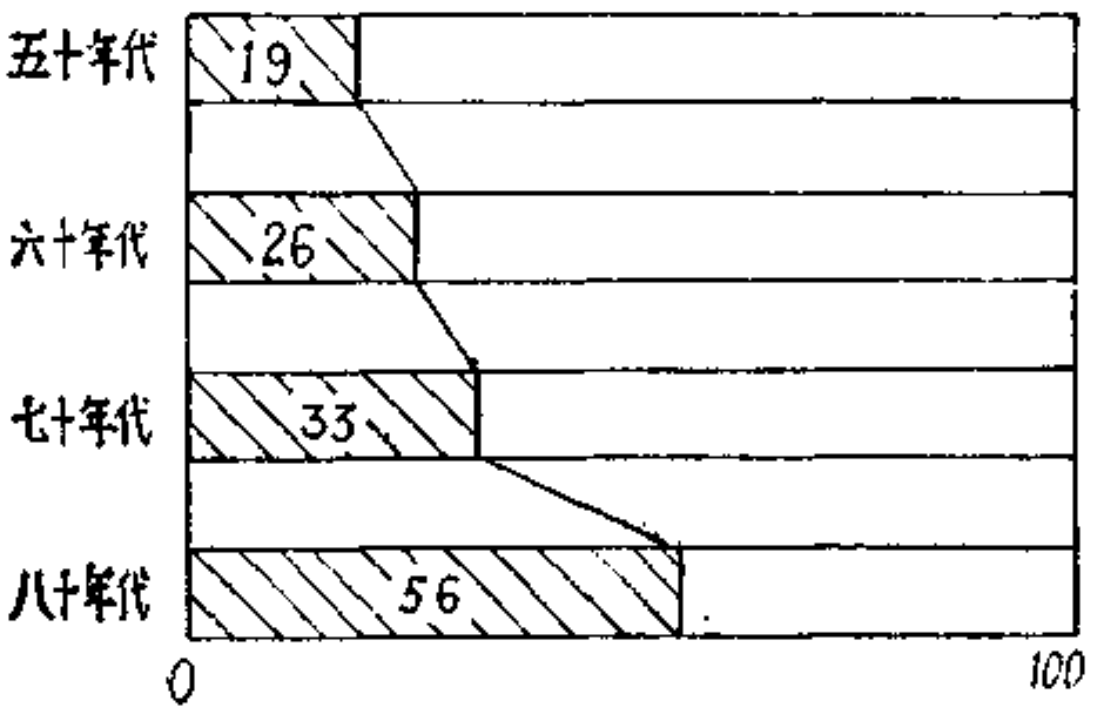

图4—7　西藏“进出口”逆差相当于工农业总产值的比例（以工农业总产值为100%）

以10.60%的速度猛上。即是说，工农业总产值增加1%，“进出口”逆差就要相应扩大1.94%。

第二，在落后地区财政收入几乎大部依赖中央财政补贴的情况下，经济发展带来的“外贸缺口”，只能由中央财政补贴来填补。反过来说也是一样。是因为中央财政补贴的存在和不断增加，才能实现这种不是收敛而是发散型的“进出口”逆差，因而才能造成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相关分析表明，中央财政补贴与“进出口”逆差为正相关0.9424。西藏1959～1982年，中央财政补贴仅为填补“外贸缺

口”造成的“国际收支”逆差，就用去了3.4亿元，相当于同期中央财政补贴，也即地方财政总收入的50%左右。1983年，青海“外贸缺口”45168万元，相当于本地财政收入的288.85%，用去当年财政总收入的64.65%。西藏同年“进出口”逆差4.2亿元，用去中央财政补贴，也即地方财政总收入的58%。

大部分“外资”，都用来买“外货”了。

“外资”买“外货”，本是引进“外资”的原始动力，并无不是之处。值得思考的是，引进“外资”买“外货”，本是要通过买进的新技术、新机器诱发本地的投资冲动和资金运动，以此促进本地经济的活跃与发展，是锦上添花的意思。并不曾想使“外资”买“外货”成为本地经济发展，甚至是本地经济得以生存的唯一维系。我国落后地区经济发展不正常之处在于，引进“外资”买“外货”机制运行三十余年，竟越发离不开这种机制。

1955～1983年28年间，西藏区外商品调入总额，竟占了区内销售总额的82%。1983年，区外商品调入相当于当年区内商品销售总额的94.12%。离开了中央财政补贴支持的区外调入，区内就几乎没有商品可以销售了。在这种情况下，减少中央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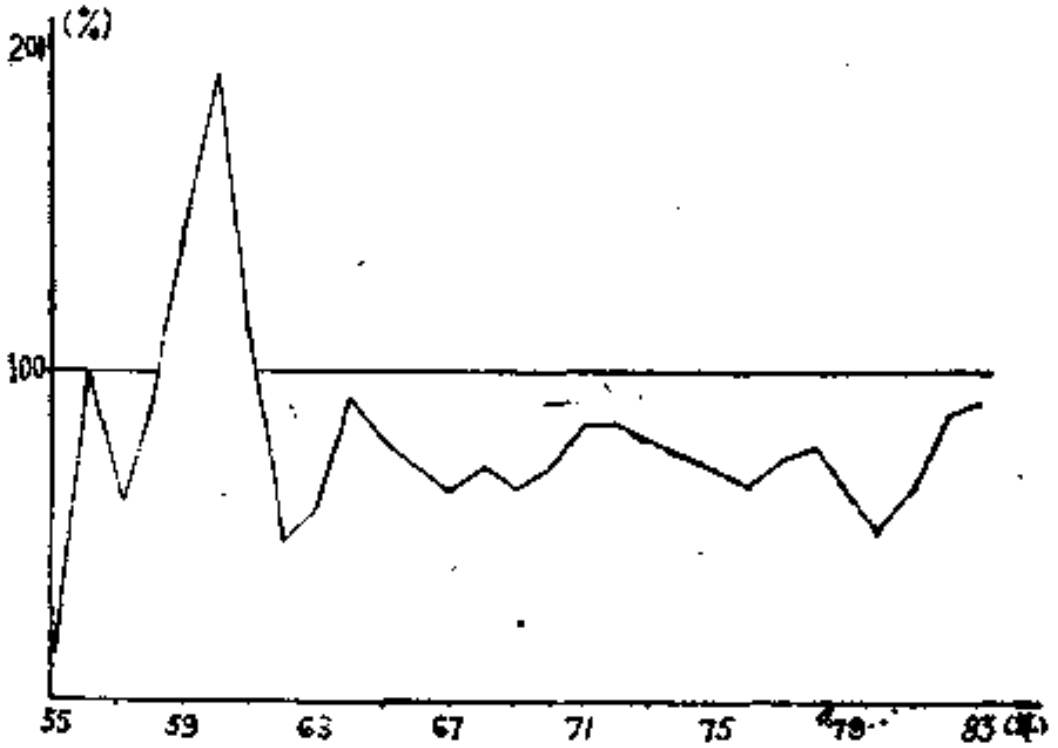

图4—8　西藏国营商业区外调入额相当于区内销售额的比例（以区内销售额为100%）

政补贴，等于减少区外商品调入和减少区内商品销售总额，降低经济发展速度和市场繁荣程度；取消中央财政补贴，无异于取消区外商品调入和区内商品销售，使整个经济系统土崩瓦解。

“外资”买“外货”，买来的是一个丧失自主运转，整个地依赖外部资金和外部商品输入维持的脆弱的经济系统。一个靠输血维持的生命。

利润退还

落后地区的“储蓄剩余”与“外贸缺口”，具

有鲜明的不对称性；而财政赤字与“进出口”逆差，却高度相关。一方面财政资金拮据，频频告罄；一方面储蓄存款呆滞，袖手旁观，漠然置之。原因何在？

“外资”买“外货”，买回来了汽车、柏油马路、大机器、暖水瓶等等许许多多落后地区居民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新鲜东西。这对当地的历史进步作用，是不可用人民币估量的。也许正因为如此，在与这些新鲜东西不配套的社会基础上，被一种更不配套的“大锅饭”体制去运行，恰恰是这些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新鲜东西，创造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巨额亏损。在这个随中央财政补贴增加而扩大的巨额亏损面前，“储蓄剩余”补充财政资金不足，无论是用于投资，还是直接用于平衡“国际收支”，都将有去无回地掉入企业亏损的巨大“黑洞”。

1952～1985年三十二年数据的分析表明，企业亏损与中央财政补贴的基建投资相关系数为0.6010。基建投资增加1元，企业亏损则增加0.45元。

别的地方是谁投资，谁受益。这里是谁投资，谁倒霉。难怪落后地区社会资金不仅不支持本地财政，反而急煎煎地大量外流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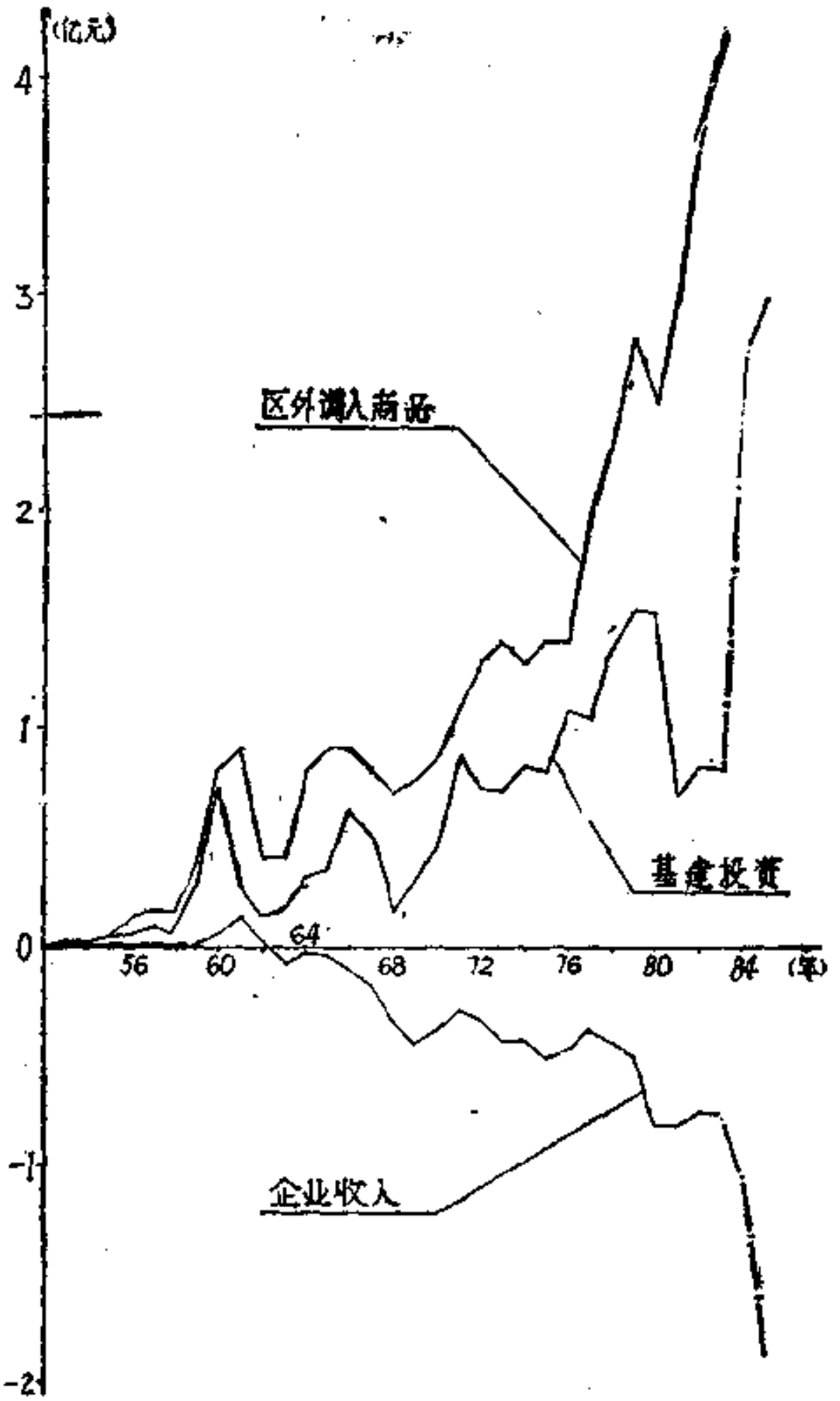

图4—9　西藏国营商业区外调入、基本建设投资与企业收入（点划线部分为1984、1985年财政预算数）

西方发展经济学家辛格，曾根据普雷比希对落后国家出口结构分析的“贸易条件”说，提出利润和购买力外流的理论。意思是说，发展中国家输出给发达国家的往往是农矿等初级产品，其价格长期看是在下跌；从发达国家输入的却是制造品，其价格则长期平稳或上涨。所以，发达国家由于取得了廉价原料而得到好处，国内工资上升缓慢，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可是，发展中国家却因此吃亏，长期停留在低收入水平的落后状态中。尤其是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往往是为了获得廉价原料或抢占市场，对发展中国家国内经济的发展没有多少作用，反而造成利润和购买力外流。

我国落后地区与发达地区的关系，没这么复杂。在中央财政的统一协调下，也不能简单地用国别经济的分析方法看问题。然而，通过以上分析，仍可以根据资金流动的路线，发现在中央财政抽肥补瘦调节之下，有一个隐蔽的落后地区向发达地区“利润返还”的补偿机制。

为了使问题简化，假定落后地区所得到的财政支援，都来源于发达地区对中央财政的贡献；同时再假定落后地区区外购进的商品产地，都在发达地区。这样，将前述分析连贯起来，就能清晰地看出

抵消中央财政抽肥补瘦作用的利润返还机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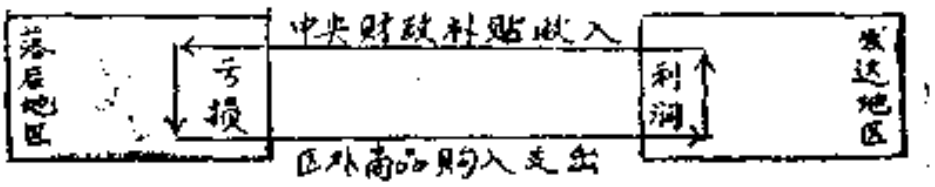

图4—10　利润返还

这是一曲资金流程的“四部曲”：

一、中央财政补贴输入到投资需求不足而不是资金供给不足的落后地区；

二、形成落后地区的基本建设或产业部门，但没能形成商品“出口”，并形成企业亏损；

三、中央补贴形成购买商品的支出，流回到发达地区；

四、发达地区生产商品并出售，形成利润，通过上缴的形式使其一部分形成新一轮中央财政向落后地区的输入……

抽肥补瘦的愿望，同时造就了利润返还的补偿机制。富者越富，穷者越穷的“马太效应”由此成立：中央财政从发达地区拿到的越多，能给落后地区的也越多；落后地区购买力越强，发达地区利润也越多；中央财政能从发达地区拿到的也越多……

外部资金输入在这个意义上，悲剧性地成为落后地区落后的原始动力。这个循环机制，翻译成发展经济学的国别经济语言，则是：落后国家引进的外资（无论是赠款还是借贷）越多，购买力越大，**发达国家的市场份额就越大**，得到的利润也就越多。

简单地依赖外援，行吗？

使援助真正成为援助，停止利润返还的阀门，并不在于争取到更多的“外资”，而在于想尽一切办法停止落后地区不是由本地投资引起而是由外部资金输入引起的企业亏损；使外部资金输入与本地投资需求融为一体；使财政性资金输入与本地储蓄剩余融为一体。要作到这一点，又谈何容易。

没有发展的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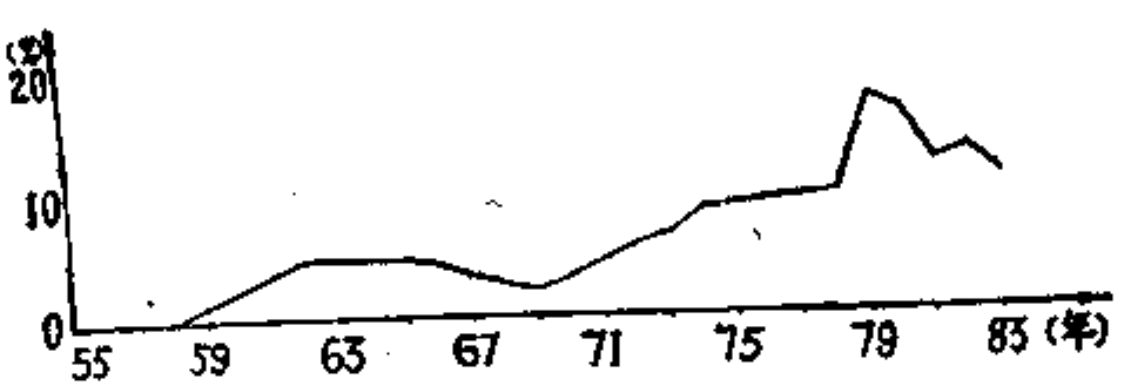

图4—11　西藏国管商业区内纯购进额相当于工农业总产值的比例（以工农业总产值为100％）

在民间交换活动微乎其微的西藏，商品交换的批发与零售，90%以上掌握在国营（包括准国营：集体）商业部门。国营商业部门的购销活动，基本上可以近似地反映全自治区商业行为发生的总量。按通行的农产品商品率的计算方法，我们权且把国营商业部门收购总额与工农业总产值的比例，看成是整个自治区经济生活中的综合商品率。这个指标，包含强制征购因素在内，1958～1983年26年总平均，仅为6.32%。最高年份，曾到达过16%左右。1983年开始取消农副产品强制性征购派购，商品率在自然经济积极性的发挥下，反而呈下行趋势，降到9.97%。总算下来，三十一年间，西藏工农业总产值增加了四倍，综合商品率仅增加了不到8%，时至今日，绝大部分生产活动，仍然是不进入交换的自然经济。而这仅有的商品经济成果，则是完全不相称的巨额投入才换来的。如果说中央投入的钱和内地调入的商品毕竟对落后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有促进作用，那么其经济效益则表现为，从1959年以来，中央平均为西藏国营商业收购的每一元商品，花费了8.35元财政补贴。

中央给的钱和物，历经三十余年，并没能形成落后地区商品经济发展的生产力。当然，从绝对意

义上说，柏油马路平铺直叙，高楼大厦拔地而起，解放卡车南来北往，厂房烟囱鳞次栉比……不能否认中央的巨额投入，换来了落后地区面貌的焕然一新。这些巨大成就，不能抹煞，也不可能抹煞。要强调的是，在这一切繁荣图景背后，是年复一年越来越多的巨额亏损，是中央财政年复一年越来越多的巨额投入，是落后地区三分之一的人民，依然生活在贫困之中。中央给钱给得还不够吗？三十一年间，西藏工农业总产值增加了4倍。这是谁也抹煞不了的了不起的成绩。与此同时，中央财政补贴增加了65倍，企业收入却由正转负，累计亏损7亿多元，这也是无法回避的事实。三十余年来，西藏工农业总产值以年均5.45%的速度递增，中央财政补贴以年均14.97%的速度递增；企业亏损以年均12.77%的速度递增。按相关系数作回归预测，以1980年为基期，工农业总产值翻一番，企业亏损将达17899万元，中央财政补贴达126213万元；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达241600万元，企业亏损将达37138万元，中央财政补贴高达275616万元，比工农业总产值还多14%！这还只是一个西藏（当然也是最典型的），如果新疆、青海、内蒙、云南等落后地区都照这样“翻”起来呢？

这样简单外推，并不过分。按目前的补贴方法，中央给钱，即使给到以上数目，西藏的工农业总产值，也很难达到翻两番的目标。因为给钱式的补贴，对落后地区经济发展的作用，很可能不是边际递增，而是边际递减的。我们在江西吉安对农村居民进取性的调查表明，国家扶持与农民进取性的偏相关系数为－0.198，达到了$\alpha=0.001$的显著水平，在影响进取性的诸因素中，仅次于经营项目，位居第二。国家补贴扶持越多，进取性越差；从分布上看，国家补贴越多的地方，农村居民的进取性越差。中央给的钱，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真的成了落后地区经济发展方向相反的“尅星”了。遗憾的是，没有可能对一整个落后地区的经济系统作相类似的调查。至少，对占落后地区绝大多数的农村居民，只要上述调查具有同等可信程度，其进取性伴随国家补贴增加而发生的减弱，最终势必反应在农业总产值上，并将在工农业总产值的增长速度中把农业总产值的增长速度拉下来。至于这些素质越发差下去的农村居民，进城当了工人之后会怎样，也可以用相应的逻辑推理。就算是所有亏损都在所不惜，简单的给钱就能翻番？很值得怀疑。

现代化需要钱。有钱，并不等于就有现代化。

只要本地自然经济状况不能根本改观，引进“外资”再多，也无济于事。希图用钱买来一个现代化，其结果势必事与愿违，得到的只能是海市蜃楼式的经济发展，而且是一个“外资”引进越多，企业亏损越大；市场让出越多，利润“外流”越大的恶性循环。一个越输血越贫血的生命。

4-2 基础结构先行？

人的素质差，是落后的本质规定。社会基础结构薄弱，对人的素质差，发生着规定性制约作用。因此，使落后地区摆脱贫困，提高人的素质，必须尽最大努力强化交通、通讯、科教文卫等基础结构建设。

不用征引，谁都知道，这是西方发展经济学者们对落后地区经济发展最基础的认识；也是一般人们在参观落后地区人民生活之后，最容易得出同时也是绝对正确的常规反应。

三十余年来，虽然受到“左”的干扰，落后地区财政支出的最大头，仍然始终是科教文卫等；落后地区的基础结构建设，仍然在极为艰苦的条件

下，取得了不小的成就。但是，与全国平均水平比较，差距并没有缩小，反而继续扩大了。一个摆在面上的突出矛盾是——资金不足。

以贵州为例：

发展交通，1949～1983年，全省公路基建投资1.67亿，修了2.6万公里公路，平均1公里不到6500元，其质量之低劣可想而知。1950～1983年，全部交通基建投资仅5亿元，相当于中央一个大型厂矿的投资。交通基建投资1982年共300万元，而修1公里二级公路就需要上百万元。这点点投资连一个地区也不够用。交通条件较好的安顺地区，仅公路方面，新建路就需1000万投资，原有路改善、改建尚需几百万元。全省有2万多公里公路要改善改建，假使历年养路费全部集中起来，不上缴，不花在别处，也需100年才能改建完毕。再加上公路养护，更加头痛。安顺地区1700公里地方公路中，有400多公里因标准太低，未纳入养护计划，任凭水冲车碾。1316公里的养护里程，省里补助80万，仅人头费（600人）就用去多一半。公路养护跟不上，就是耗费巨大人力财力物力建成公路，利用率也大受影响，同时缩短了更新改建周期。

发展信息沟通，仍是资金不足。1983年安顺地

区有1896公里县——区——公社电话线失修，地区邮电局每年手里只有线路改造款10万元，大修款7万元，这17万元固定资产折旧费只够新建（大修＝新建）50公里线路之用，平均到每个县（市）才5公里，需38年才能更新完毕。这期间又会增加多少失修线路？贵州省1982年的广播电视经费1519万元，仅占全国的1.7%，为倒数第二位。其中基建款209万，仅占全国1%，广播电视厅自己掌握的每年只有70万元，而修一个中功率高山电视转播台（可覆盖十几个县）就要花300万元。再加上贵州地形起伏，相对高差大，一般县城与县最高点要相差几百乃至上千米，要达到覆盖率95%的国家标准，投资需成倍增加。由于经费缺乏，建了台也巩固不了。维护1000瓦的转播台，一年要花7～8万元，全省270个转播台，由省厅负担的只有十几个。经费无处落实，只好降低功率，缩小覆盖面积，降低质量，勉强维持。有的小台干脆关掉了。有线广播则更为困难，全省有线广播线路曾达20多万公里，到1982年只剩下4.5%；喇叭1973～1974年曾达220万只，现仅余14.1%。原因自然是无钱维护，县广播局的经费仅够维持工资。

其余如教育、科技、文化等部门，无一不为缺

乏经费和投资而大伤脑筋。教育基建投资近年来接近于全国平均水平，但由于基础太差，欠帐太多，远远不能满足所需。教育经费则缺口甚大，1982年全省按人口平均为8.07元，为全国水平的70.1%。文化事业资金1982年人均仅5分钱，只够买根冰棒，或买份报纸。

其实，资金不足只是发展基础结构建设，摆在桌面上或是帐面上的一个小小的障碍。深一步看问题，甚至只是一个极次要的障碍。和发展任何其他产业一样，这里提问题的方式，首先是要问“谁去发展”？从这个角度出发，落后地区加快基础结构建设的真正最大的障碍，还是人的素质差。

教育，是所有“基础结构先行”论者最关注、最津津乐道的项目。教育是与提高人的素质密切相关的，值得花大本钱优先发展的部门。但是能否作为治病的根本药方而“先行”？或者说对落后地区的认识能否就到此终结？还须持慎重态度。

贵州教师队伍的学历，小学教师学历达到中专、高中水平的比例，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9%；初中教师达到大专以上学历和高中教师达到大学本科以上学历的比例，还分别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84%

和34%。教师队伍的学历水平，还是很乐观的。但是，有学历，并不等于就有相应的文化水平和业务能力。1978年10月，在全省对55.1%的初中教师和78.9%的小学教师进行了“过教材关”的统一考试①，考试内容为所任课程的教材。同时任两门课的只考其中一门，而且可以自选，以教学大纲为依据命题，80分为合格。考试结果令人叹为观止。

就是如此之低的合格率，也还是经过培训以后才达到的。安顺地区11个县市，为此次考试从教育

表4—2 贵州教师队伍“过教材关”考试合格率

1983年

考试科目	合格率(%)	
	全省	安顺地区
小学语文	15.0	16.8
小学数学	7.0	9.2
初中语文	22.9	31.7
初中数学	14.2	23.9
初中物理	29.0	31.7
初中化学	38.4	31.7

① 参加“过教材关”的教师是：1966年以后担任教学工作的；教龄不满25年的；男教师49岁以下，女教师44岁以下的。

经费中拨出20多万元进行教师培训。关岭县将教师集中到县城培训，耗资3万多元。结果小学教师合格率仍仅有2.7%。该地区清镇县文化教育相当发达，摸底测验时，小学教师合格率仅为7%，初中教师12.6%。经培训，合格率才分别达到38.7%和33.6%。

个别县份的情况，更令人瞠目结舌。小学教师合格率，紫云县是4.3%，关岭县2.7%，镇宁县仅有0.3%。1000个教师中才有3个能够弄明白自己正在教别人的东西！

看看考试成绩，更能知道什么叫做“人的素质差”。

大学本科毕业生教小学算术，竟100%不合格；教初中数学，竟有考6分的。大专毕业教小学

表4—3 安顺地区“过教材关”考试成绩

	大学本科毕业的教师			大专毕业的教师			中专毕业的教师		
	参加人数	不合格率(%)	最低分数	参加人数	不合格率(%)	最低分数	参加人数	不合格率(%)	最低分数
小学语文		66.7	42		86.0	17.5		90.2	4
小学数学	4	100.0	20		89.7	9	2040	90.2	0
初中语文	43	44.2	51	177	44.1	28.5	608	76.2	17
初中数学	57	40.4	6	210	48.1	16	664	87.2	1
初中物理	31	45.2	32	142	44.4	14	216	86.6	12
初中化学	22	27.8	51.3	89	24.7	46.5	211	81.5	21.75

语文和算术，不合格率接近90%，最低分才9分。中专毕业教小学也有90%的不合格，数学中竟有考0分的，而且不止一个，好几个县都有；语文中也竟然有考4分的。这不禁使人怀疑，象这样的教师自己究竟认识多少字？教师队伍的水平如此这般，那仅有10～20%毕业率(合格率)的学生之水平，更可想而知

除初中化学外，安顺地区的各项考试成绩均高于全省平均水平。名列前茅的安顺地区尚且如此，全省的情况便更难想像了。

加快基础结构建设，谈何容易。是缺钱吗？如果真是人材具备，只欠资金，问题的解决要比现在容易一千倍。事实上，谁也算不出来，如果钱可以弥补人的素质，究竟要投多少钱，才能使基础结构建设达到满意的水平。

教育如此，其他建设也是如此。

据西藏建设银行提供材料：1965～1968年，搞“三线”建设，投资7237万元，仅三年时间报废2300万元。七十年代“填空白”，昌都、拉萨等地搞玻璃、化肥等厂，浪费投资1500多万元。向阳煤矿投资478万元，建成后挖不出煤来，落个“煤矿烧牛粪”的美名。昌都金河电站301.6万投资全部

报废。墨脱公路1983年下马，2348万元投资付诸东流。就是建成的，也得付出内地难以想象的代价。塘河电站装机仅6400瓩，工期竟长达9年7个月，瓩造价4646元。装机仅2600瓩的献多电站，瓩均造价10761元，为全国平均水平的4～5倍，被群众誉为“钱多电站”。拉萨冷库单位造价4163元，与献多电站同创同行业工程造价最高记录。

这是有形的。即使是烧牛粪的煤矿，看得见，摸得着。还有无形的，看不见，摸不着。1982年区交通厅公路局房建组承办四项工程，一次虚报支出竟领回国家基建款101万元！自治区1981年拨日喀则地区教育局50万元学校桌椅修缮费，1983年财务检查从余款37.16元上，才发现还有这么档子事。50万元专款竟没有设帐，钱花完了，谁花的，怎么花的，不知道！中央财政补贴，究竟有多少就这样被虚投浪置，弄得不知去向？统计报表上是看不出来的。

退一万步说，就算是浪费，就算是成本高，好不容易弄成了，一运转，照样还是不灵。西藏三十余年来共建成小水电站816座，现已报废23.3%；带病运转的15.7%；两项合计占39.0%。日喀则地区建成小水电站175座，如今已有40%不能运转。

基础结构先行，绝对正确。不仅过去正确，今天正确，将来同样正确。但是，面对上述“先行”的事实，谁能说清楚，是中央给钱给的不够呢，还是钱用的方向不对？不能否认，在多年“左”的路线干扰下，一会儿强调这个，一会儿强调那个，不同程度地影响了基础结构建设，使其不能全力以赴、持之以恒地加速进行。是不是将投资方向从办工业、办城建或办其他什么产业上转移、集中到社会基础结构建设上来；或者更多地引进“外资”，集中优先发展基础结构建设，落后地区的落后问题就一了百了了呢？事实显然并非如此简单。一个互为因果的矛盾摆在我们面前：社会基础结构薄弱，对人的素质的提高，发生着规定性的制约作用；人的素质差，是社会基础结构建设不能顺利加快进行的根本障碍。怎么办？三十余年来，我们在给钱多少，钱往何处花等问题上殚精竭虑，绞尽脑汁。在投资方向的选择上，几乎什么都试过，确有极高昂的“学费”换来的极丰富的宝贵经验供总结。但是，无论有多少钱，无论向什么方向花，无论什么部门先行，无论在这些“硬件”设计上变换出什么花样，都绕不过人的素质差这个“坎”。在“输血”的前提下，办工业也好，支援农牧业也好，基础结

构先行也好，都是如此。无出路的现实，逼迫我们从要钱、花钱的两维平面里超脱、升华，逼迫我们在新的空间，在社会关系的“软件”设计上寻找出路。那就是：社会-经济关系的重新调整。①

4-3 目标结构

简单地“输血”不行，基础结构先行也不行。什么行呢？现实要求我们重新审定对落后地区经济系统发育的目标结构。

经济增长，意味着社会财富，尤其是社会物质财富的增加，是人们从统计意义上，最容易接受的经济发展目标，也是经济发展的根本目标。干活、劳动，是为了改善生活条件，提高生活水平，为了致富。这该是没有什么可讨论的。问题偏偏出在，与同一个生产积极性可以具有两种可能性一样，同一个“富”的目标，可以同时包含自然经济的富和商品经济的富的两种不同的社会理解。

曾经有一个确凿的全国首富县：青海省玛多

① 这一点还有一个相当重要的意义：在对人的进取性的影响上，社会经济关系变革的作用大于教育、信息沟通和交通运输等基础结构的作用。这已为我们的调查所证实，请参看64页的表3—3。

县。现有各类牲畜67万头，人均110头，公共积累1144万元。1981年人均分配收入高达475元，名列全国之首。但工业产值几乎等于零。教育仍很落后，全县只有两所完小，一所初中。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也基本上没有发生多大变化。①

青海省刚察县有一个确凿的富裕户，养马30多匹，牛100多头，羊300多只，全部牲畜价值近4万元。和内地农村居民比较，除去那些腰缠万贯的“二郎神”，也算得上是“Super 万元户”了。古怪的是，此公只养不卖，“赤脚大仙”，连鞋都穿不上，经常靠喝面糊糊充饥。②

我们在西藏调查，听说藏北牧民有的一户一年要吃掉5～6百斤酥油。如按市场价计，不算别的，仅此一项一年人均收入就约500～600元。前文提到的昌都地区两个比着修经堂的万元户，富倒是富了，富到菩萨那儿去了。

这是我们追求和提倡的富吗？

对于经济关系已经基本理顺的国家和地区，对于社会发育程度足以提供商品经济顺利发展的发达

① 王宝良、李天蛟：《青海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战略初探》，《民族经济学研究》，第二集195页。

② 曹远征：《青海省草原畜牧业发展问题的调查与思考》。

地区（非指我国发达省份），社会-经济的发展目标，可以像日本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那样，将社会财富的增加，当成首位目标。对社会政策的实现程度，可以用产值、利润、国民收入、发展速度等一系列清晰明了的简单经济指标去直接衡量。但是，对于社会发育程度远远不能满足商品经济发展要求的落后地区，这些产值、利润、国民收入、发展速度等最清晰明了的纯经济指标，往往就成了模棱两可的指标。在落后地区丰富的发展商品经济的资源上，用传统的自然经济手段去开发，去破坏，同样可以实现产值、国民收入等经济指标上的进展。从这些指标上（包括人均收入等），既看不出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转化，也看不出落后地区居民富裕程度的社会内容。落后地区居民生活的困苦，促使任何一个有道义感的人，充满提高居民收入的激情。有几百头牲口只养不卖，总比一无所有强得多。对此，是无可争议的。然而，从经济系统的运行机制看，放火烧山挣来的产值，看着几百头牲口喝面糊糊的收入，毕竟不应成为我们为之努力奋斗的主要目标。相反，落后地区的实际问题，还不是社会财富的多少，而是扭转落后地区居民对社会财富的理解，扭转落后地区居民对商品经济资源

的自然经济开发手段。

基础结构先行的受阻告诉我们，在社会系统的发育上，社会-经济结构与人的素质，是更为关键的动力性要素。社会-经济系统的进步，取决于社会-经济结构的变革和人的素质的提高。而社会-经济结构变革之实质，对自然经济为主的落后地区，就是商品经济关系的普遍推行。在落后地区已有诸多要素（包括人）已经具备发展商品经济可能的基础上，彻底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使一切具有参与商品经营可能的要素及其组合，能够以等价交换的商品经济关系来完成的根本措施；因而也是同时使人的素质得以提高的前提性行动。所以，通过改革，最大限度地调整出一个社会规模的商品交换关系，才是今天首要的和第一位的任务。

当然，社会安定，也是必须考虑的一个因素。社会安定，特别是在少数民族地区和边境地区，是任何社会生活、生产得以正常进行的保证，更何况牵扯到每一个人切身利益的经济体制改革。

综上所述，落后地区开发的战略目标按其不同权重排列，应有如下内容：

第一、社会-经济关系的变革

第二、人的素质的提高

第三、社会财富的增长

第四、社会安定

“傅马栈最难。”我们的口号是：宁要300元商品经济的穷，不要500元自然经济的富；更不要“越输血越贫血”，吃补贴，无底洞的“大锅饭”经济的富。

第五章

改革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展开了全国范围内的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短短几年时间，我国的经济生活已经发生了一系列根本性的深刻变化。在这场伟大的变革中，比全国其他地区更迫切需要进行社会-经济结构根本调整的落后地区，如何抓住这一历史性机会，为本地区经济的振兴创造有利条件，取决于能否不失时机地作出符合本地区实际的特殊选择。

5-1 农村包围城市？

众所周知，中国革命走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胜利道路。众所周知，在我国经济面临崩溃之际，

是从农村，边远落后的农村，首先揭开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序幕。农村社会经济关系的初次调整，胜过简单的生产要素投入，胜过“农业学大寨”运动，胜过三十余年中尝试过的一切理论推演和典型发现的灵丹妙药，焕发出人们始料不及的巨大生产力。农村的经验，教育了中国人民。农村的专业户、重点户、各种组合的乡镇企业，在温饱问题解决之后，正循着商品经济的轨道前进。从流通体制、价格体制、人员流动和户籍管理制度、干部制度等经济、社会生活的诸多方向，向传统僵化的城市经济管理体制渗透、冲击。中国的改革，似乎也要走一条农村改革推动城市改革的特殊道路。

落后地区的改革，能否通过农村商品经济的活跃，走一条与内地一样的农村推动城镇改革的道路？逻辑上是可能的。实践上则要比发达省份慢得多。

乡镇企业工业总产值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实施初步改革之后，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可能对城市改革起推动作用的冲击能力。1984年，除西藏根本没有乡镇企业工业总产值统计外，青海、宁夏、新疆、内蒙古、贵州、云南、广西四区三省的乡镇企业工业总产值仅分别为江苏省的0.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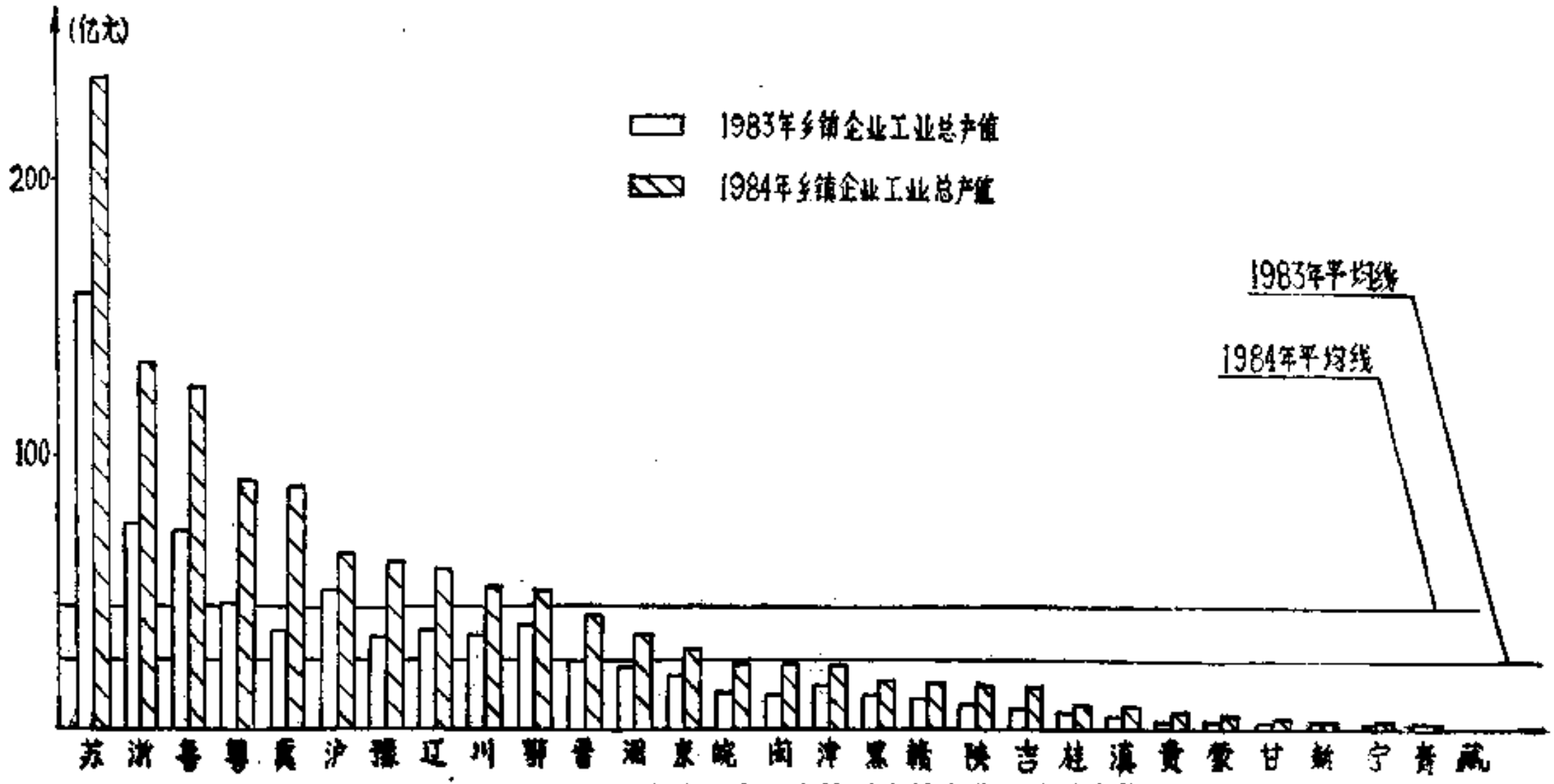

图5—1 1983、1984年各省、市、自治区乡镇企业工业总产值

1.21%，1.24%，2.21%，3.16%，3.91% 和3.99%。如果说江苏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正在起着推动城市改革的强大作用，那么落后地区所最感焦急的，反而是如何焕发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的活力。综观前文所有农村商品经济发展动力不足的分析，以西藏为例，在讨论农村改革推动城市改革的现实可能性时，至少应对落后地区农村经济状况的以下四个特点，予以充分估计。

第一，农村商品率低。西藏1983年，含征购因素加民间交换，乐观估计不到10%（畜产品商品率也不过9%）。在温饱没有解决的情况下，农村经济即使全部放活，最好的情况也只是这不到10%的生产能对市场机制作出反应。并且越是在落后地区，农民自给性消费与出售之间的比例弹性就越大。西藏全区酥油自食率高达90%以上，不知可以找到多少只产不卖的典型。农副产品的商品率不仅受到价格信号影响，而且与“销售成本”以及能否换到适用工业品有关。西藏商业网点平均1.02个/千人，商业人员0.48人/百人，均为全国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每个商业网点和商业人员的平均覆盖面积，却为610平方公里和130平方公里，分别为全国平均水平的194和136倍。较发达的日喀则地区53

%以上的公社没有商业点。商业职工中竟有22%以上的文盲、半文盲。路遥、文盲、官商，又常常没有对路商品。这种交换条件，农牧业生产搞得再好，商品率也绝难提高。

第二、农牧民进入市场经商困难。农村居民缺乏资金且不说，主要是无法掌握货源和运输渠道。西藏大宗交换的货源都在内地，大多农牧民不会说汉话，全区单位商品平均运距在800公里以上，短期内想指望农村商品交换的活跃去推动城市流通体制的改革，绝难想象。

第三、缺乏农村工业。西藏全区包括手工业在内，1983年工业总产值才1.3亿元。农村所能经营的，除了一些小打小闹的传统手工业品，几乎全是自给自足的农畜产品。要想发展农村工业，一步也离不开城市的允诺和支持。仅靠农村居民自己，几乎是无法可想。

第四、最重要的是农牧民的经营素质差。

以上四个特点，都使落后地区农村短期内不可能出现足以推动城市改革的商品经济发展规模。落后地区实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一般比内地、沿海发达省份更早些。在解决温饱问题上，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并不算小。但是，由于人的素质

差，由于农村居民发展生产的积极性比内地发达省份更多地向自然经济的方向倾斜，虽然落后地区农村也星罗棋布地出现了不少标准不一的专业户、重点户以及各式各样的能人和万元户，毕竟没有象江浙一带那样，尽管农村经济改革时间较晚，通过家庭联产承包制一个政策，就使各种能人社会规模地涌现出来，并迅速改变了整个经济的宏观图景。从道理上说，农村居民吃饱喝足之后，有了剩余产品总要出售，商品经济总能自然而然地发展起来。可惜，无数事实已经证明，在以上四个具体特点没有发生重大变化之前，这不过是逻辑推演或善良愿望而已。正如中国古代自然经济曾一度高度发达，却始终没有转入商品经济轨道一样，没有现代系统的介入，我们并不能排斥落后地区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之后，仍有陷于自然经济长期停滞（也可能是很富的停滞）的现实可能性。

现代系统介入的传递枢纽是城市。

有枢纽不等于能介入，有城市不见得能传递。落后地区的城乡关系，也是摆在西方发展经济学上的一只拦路虎，一道没有解决的难题。发展经济学的“二元结构”理论，就是专门用来对付现代城市

与原始乡村尖锐对立而大伤脑筋的。我国落后地区的城乡关系，比发展中国家一般意义上的“二元结构”更复杂。这里无法就城市的社区功能全面展开分析。与讨论落后地区改革能否走一条“农村包围城市”道路有关的两个现实是：第一，城市“大锅饭”体制的存在，不仅使城市无法起到现代系统输入的传递枢纽作用，而且对已输入的现代系统可能向全社会的扩散，发生着一种“隔绝效应”；第二，城市“大锅饭”体制，同时并发产生对农村仅有人才釜底抽薪的“掠夺效应”，把农村进一步推向自然经济的停滞。

隔绝效应

农村包围城市，需以农村经济发展与城市经济发展的相互渗透和关联为互动前提。对全国来说，在一个经济基础薄弱的农业大国，用强制性手段实现工业化的早期积累，可能是一种不期然而然的选择。可是，在中央并不指望得到多少工业化积累的落后地区，不加思索地照搬内地“大锅饭”体制，就不免有些戴盆望天了。因为多此一举，城乡间可能有的经济联系，反而被“无辜”地割裂了。

表5—1 落后地区城乡居民收入、消费水平

单位：元/人 1982年

地区	居民收入水平		居民消费水平	
	城市职工家庭	农民家庭	非农业居民	农业居民
青海	507	219	570	192
新疆	968	138	461	230
西藏			968	209
全国	796	270	501	212

落后地区城乡居民收入相对差，是全国平均水平的128%；城乡居民消费水平的相对差，是全国平均水平的135%。西藏居民城乡消费水平的相对差，是全国平均水平的196%。依非农业居民货币工资收入只用于商品性消费的假设，粗略匡算，仅占人口总数15%的非农业居民，消费了当年社会商品的零售总额的65%。扣除社会商品零售额中的“农村生产队和社员的农业生产资料”，15%的非农业居民，消费了所有商品性消费的70%。

不宁唯是，区内商品销售绝大部分靠区外调入，西藏城乡间收入分配和商品销售上的悬殊比例，在相当大成分上，不是城市居民挣来的，而是国家财政输入给来的。说这话，决不是说城镇居民

不干活，而是说干出的活 没 有 所谓“效益”。在“越输血越贫血”一节中，企业江河日下、一泻千里的巨额亏损，统计数据就来源于非农业人口们所干活的诸多国营或集体单位。农村居民 的 直 接亏损，往往表现为一部分社会救济款，在西藏1983年是1853万元；非农业人口的亏损，却一定要板上钉钉地找国家实报实销，在西藏1983年是7678万元。只说这一项，单个非农业人口就花了320元，是农业人口人均11元的29倍。账面上，除了知道大部分投资项目被摆在非农业人口所在地外，价格、税收等复杂因素，使人无法看出农村居民究竟占了多少国家便宜。依实际考察的感觉，把图4—10改 成 另一个样子，是有把握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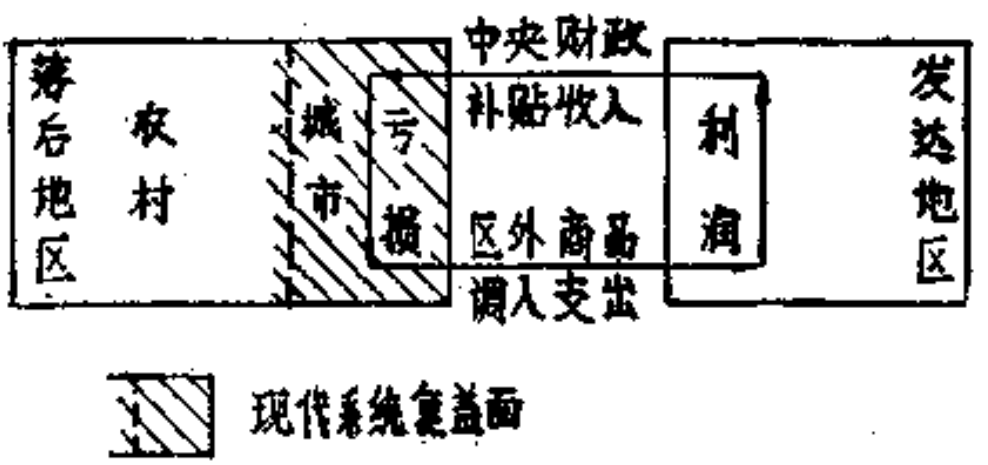

图5—2　以资金流动为代表的现代系统输入

形成这种格局的原因，是现代系统的输入所携带的巨额亏损；形成亏损的原因，是城市“大锅饭”的经济体制。

再看图4—9。西藏的企业收入1952～1961年，曾一直为正，并以每年平均增长96%的超高速发展。1960年曾高达1556万元。1961年以后，企业收入由正转负，企业亏损以年均12.77%的速度猛增，再无好转。1960年当收立效的转折，正是西藏企业由市场调节为主，改革为一统到底的“大锅饭”体制。目前，西藏全区工业总产值，仅相当于发达省份的一个公社。在异常薄弱的经济基础上，耸立的却是与内地发达省份一样叠床架屋的庞大“上层建筑”。这个“上层建筑”里，发达省份所有的职能、机构应有尽有。1.3亿工业产值、8千万元基建投资，管理它们的同样有计经委、工业厅、商业厅、建设银行等等，仅自治区一级就有局、委、办级部门62个。相对薄弱又薄弱的经济基础，“大锅饭”带来的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机构密集型”的“上层建筑”。

三十余年来，西藏工农业总产值增长了4倍，“机构密集型”之“上层建筑”的花销，行政管理经费支出，增长了10倍。总算下来，不计企业、社

队的干部补贴、吃喝送礼等，平均每购进1元商品，财政直接付出行政管理费1.33元；或者说平均每得到1元工业总产值，财政直接付出行政管理费0.54元；或者说平均为每1元基建投资额，“机构密集型”的“上层建筑”要花费0.63元的行政管理费。管来管去，管得如何呢？将行政管理经费作为输入，将企业收入作为管理和运行系统的最终输出，就能对这套“机构密集型”的管理运行系统之经济效益，得出一个准确的判断。五十年代，平均1元行政管理费管的最终结果是0.45元的企业盈利；六十年代，平均1元行政管理费管的最终结果，成了0.55元企业亏损；以后，每况愈下，七十年代1元行政管理费支出，相应得到的企业亏损是1.01元；八十年代管理的“负效应”达1.26元。

中央给的钱和物，通过“机构密集型”的“上层建筑”去管、去花，一运转而变成一笔亏损帐。——这就是落后地区城市“大锅饭”系统运行的典型模式。这里只举两个小例子，就足以说明：

西藏自治区石油公司油票每年兑换，过期作废。各用油单位买到油票后，一分了事，用多用少，根本没数。没用完的过期油票，也没人去石油公司兑换或退钱。1983年财务检查时才发现，石油

公司仅此一项竟多出937万元。该公司这笔钱也没法上交，从1963年公司成立至今，一直逆来顺受，全装“腰包”。此事涉及几乎所有非农业人口的所在单位。油者，命脉，血液也。开始是汽车拉，以后是输油管，数千公里之遥，成本之高，可以想见。各单位却毫不吝惜，花国家钱之慷慨，由此可见一斑。

一方面大方，一方面必小气。1981年亚东进暖水瓶834个。开箱验货，竟烂了120个。级级查访上去，才知这暖水瓶在拉萨就已经破碎。既是烂了，又是运力紧张，结果又不辞劳苦，迢迢千里（485公里）运了来。图的只是不把1142元损失记在自己帐上。亚东县商业局见怪不怪。据说不少积压货经常是退回去，又莫名其妙地运回来。问交通部门究竟有多少这样的无效劳动？不清楚，他们只管多拉快跑。问全区统一核算的商业部门这究竟是图什么？不清楚，他们面临的最大压力是运力紧张。

这样的“现代系统”，往哪介入？如何介入？从物质形态来说，发达地区“进口”的先进设备、技术、商品包括信息，本来均有可能依经济规律，向广大落后地区居民的生产、生活领域渗透，甚至支持、促进、诱发农村商品经济的繁荣和农村工业

的崛起。不曾想，“大锅饭”城市体制形成的巨额亏损，将这种可能性拦腰斩断。城市自己已是“越输血越贫血”，成了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只好靠户口等制度划地为牢，当然也就顾不上带着“现代系统”的巨额亏损，向别的地方介入了。

掠夺效应

在我国落后地区，靠国家“输血”维持的城市“大锅饭”，似乎并不象第三世界典型的“二元结构”那样，直接靠掠夺农村居民的钱财为生。但是，比掠夺钱财更要命的是，根据“帕金森定律”，“大锅饭”城市体制中的“机构密集型”“上层建筑”，具有非凡的自繁殖能力。行政管理经费三十年来以年均8.56%的速度猛增，可以佐证。“机构密集型”的膨胀，吸收了落后地区绝大部分智能人口。在国家财政“输血”支撑下，时至今日，无论在农村还是在城市的智能人口，仍时刻处于城市“大锅饭”体制黑洞塌陷式的无止境的强力吸引之中。

请看表5—2。江孜县文化教育水平位居西藏前列，在总人口中，不同文化程度的人员分布尚且

表5—2 西藏江孜县各文化程度人员分布

单位：人　　1983年

文化程度	机关	城镇	农村	机关与农村城镇的比
初中以上	1013	45	206	4:1
高中以上	393	3	9	33:1
大学肄业以上	92	1	1	46:1
12岁以上文盲、半文盲	656	968	31474	1:49

如此，文化教育发展水平更差的地区，就可想而知了。问题严重的是，上表表现的人才分布严重失衡的情况，还远远没有满足“机构密集型”的需要。目前西藏各级机构缺编严重。县一级缺编多在50％以上，稍有文化、稍有与众不同之处者，均被拉入“大锅饭”机关中，尚且不足。之所以能得到上表，只是由于社会上实在找不到相通文墨者了。

“现代系统”介入的可能，被城市“大锅饭”体制的隔绝效应所打断；“机构密集型”的“上层建筑”又在无穷尽地吞噬着农村商品经济发展最稀缺的资源——人才。在一个社会-经济系统中，城乡不可能相互孤立地存在。我国落后地区“二元结构”的特殊性在于，城市“大锅饭”体制的存在，不仅不可能鼓励、支持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而且

还在吞噬着落后地区农村仅存的人才，釜底抽薪地泯灭着落后地区农村发展商品经济的最后一点可能性。即使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即使政策放得再宽，广大农村也依然有陷于自然经济停滞的现实可能性。不改变这种现实，在这种现实下还去指望农村商品经济自然而然地活跃，以在短期内形成足以推动城市改革的动力，无异于缘木求鱼。

5-2 城市改革率先突破

落后地区的经济改革，不能等待“农村包围城市”。相反，如不加速城市国营系统（包括准国营：集体）较全面彻底的改革，每况愈下的经济颓势，不仅不能扭转，甚至可能恶化。

商品经济的主力

落后地区的城市系统，虽然主要靠“输血”维持，与当地农村经济联系并不紧密。但这种不能独立运转的经济系统，依然比内地有自己的生产能力、有自己的产品可以交换的城市，要脆弱得多。

西藏农村统购统销稍一放活，国营系统的"大锅饭"马上面临两种前途。

一、崩溃。如举世闻名的林芝毛纺厂，1983年实现税利273万元，"响当当"的。其实是外强中干。现在该厂生产的20种产品，只有7种不赔钱，其中4种已经卖不动了。如果羊毛的统购统销一取消，按市场价格收购原料，该厂马上即要亏损近300万元。如果木材价格放开，林业责任制落实，这个靠每天白烧26立方米森林过日子，曾经在介绍西藏新面貌的电影、画报上大出风头的毛纺厂，就只有关门了。

二、干脆彻底地完全躺在外援身上，向中央要钱要物。如西藏粮食征购派购一取消，马上要中央调粮，同时要钱弥补粮食企业扩大了的亏损。

这两种前途显然都不是人们所希望的。而现实中，城市系统又正在越发加紧发挥着同样不是人们所希望的特殊功能，在与农村系统的关系方面，城市正在继续通过"机构密集型"的"上层建筑"，将所有具备发展商品经济素质的人才吸收过来，把农村推向自然经济的怀抱，使农村改革调动的生产积极性向自然经济方向倾斜，使原始垦殖方式造成的生态破坏越发严重，使自然灾害更加频繁，使主要

投放到农村的社会救济款，以年均30%的高速递增。在与国家支援的关系方面，城市正在继续通过“大锅饭”体制，把所有发展商品的物质条件运转成一笔巨额亏损帐，并以此为由，以吸收国家更多的人力、物力、资金的支援，从而使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家支援落后地区的财力、物力负担，不是减轻了，而是加重了。而且随着农村政策些微的的放宽，“输血”更是须臾不能离、间刻不容缓，一天也不能停止了。否则将导致落后地区的全面崩溃和剧烈的社会震荡。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千不该，万不该的是，越来越多而不是越来越少地由国家财力、物力背起来的，不是老弱病残，不是鳏寡孤独，不是呆傻愚痴，也不是丧失发展生产能力的穷苦人民。背起来的恰恰正是落后地区人群中的精华，商品经济发展的潜力。就说西藏，与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的四个劣势相对应，城市系统商品经济发展起码具有四个明显的相对优势。

第一、人的素质好。江孜县城镇居民全民受教育水平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但却为该县农村的6.4倍。初中以上文化程度者在城镇2658人，是农村拥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者的12.9倍。城镇居民受教育

水平高，吸收新信息的能力也相对较强，并且在机关工作的影响下，城镇居民对宗教较农牧民实惠得多，很少磕长头、转经和大额布施；见过世面，民族意识也较强。

第二、对商品信息、价格信号反应灵敏。城镇居民人均消费商品额为农村居民的36倍，他们几乎没有自给性生产，衣食住行都要通过货币购买满足，日常生活里有大量频繁的购买、交换行为发生，不象农牧民一年之中仅有有数的几次出售和购买，因而在从事商品经营时，对商品信息和价格信号的反应，可望较农村居民灵敏得多。

第三、拥有现代装备。仅有的能从事现代商品生产的设备、技术、资金等要素，大多集中在城市国营系统，拥有少量乡镇企业的农村则绝少此类要素。

第四、进入市场容易。城镇居民一般能通藏汉语言，与内地联系的可能性是农牧民所不能比拟的。尤其是大部分本身就在国营工、商、运等部门的工作人员，经商是轻车熟路，吃不好“大锅饭”不等于没有能力为自己赚钱。

集中在城市系统的这部分人和物，是落后地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是发展商品经济潜在的主要力

量。但却被禁锢在最没有活力的“生产关系”之中。国家的巨额投入，应当换来落后地区商品经济发展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基础；“大锅饭”体制，却使这客观基础成为消耗国家财力、物力的主力军。**积国家三十余年之援助，落后地区的问题，决不是因为没有发展商品经济的能力，而是没有发展商品经济的机制，没有**人与人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等价交换的关系。**短期内，要想通过经济体制改革，社会规模地调整出一个商品交换关系，仅靠农村政策“松绑”，是不够的。“成亦萧何，败亦萧何”。城市已成为落后地区经济发展一切矛盾的集中点。任何性质的输入，想绕过城市这个大转换器的转化，都是不可能的。针对发展商品经济的主要潜在力量集中在城市的现实，发动全面、彻底的城市国营系统的改革，彻底调整这个大转换器的内部机理，是改变“越输血越贫血”状况，调动整个落后地区发展商品经济所有可能性的总开关，同时也是启动落后地区经济系统自身“造血”功能（即发展商品经济的功能）的有力杠杆。

5-3 改革的有利条件

落后地区城市系统的改革，因为其落后，往往比内地和全国城市系统的改革，具有不少“坏事变好事”的有利条件。

第一、价格-财政关系松弛

内地或国家级全面经济体制改革，一个突出的难题，是价格体系不合理。单从产品市场说，生产不同产品的企业之间，就不具有平等竞争的条件。价格不合理的背后是财政。所谓“价高利大”产品销售收入所形成的利税，始终是国家财政收入，当然也是落后地区获得国家财政补贴的主要来源。因而千万种产品的价格与国家财政收入以及相应与工资、福利等诸多收入分配领域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成了经济体制改革和增加企业活力前进路上的重大障碍。这个难题，在落后地区反映的并不突出。仍以西藏为例，目前农村产品的价格已基本完全放开。农产品价格与城市系统改革的关联，已不成为突出问题。全区工业产值仅为工农业总产值的18%。除林芝毛纺厂等少数企业外，没有价高利大

的烟、酒、茶和轻纺工业。商业部门收购的工业产品，仅为工业总产值的9.5%。企业大多亏损，本来就不仅没有利润上交，反而需要财政补贴。地方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只是工商税和其他杂税。这种情况下，工业品价格与地方财政收入以及工资、福利的关联，都要比全国，以及内地发达省份弱得多。固然，不作逐项的细密分析，很难清楚地描述价格改革可能发生关联的定量关系。可是，可以肯定，由于工业薄弱，产业和产品结构单纯，实施放活企业的前提性改革——价格改革，落后地区要比内地发达省份以及全国容易得多，可能发生的关联影响，也要小得多。

第二、工业制成品的“无限供给”

套用刘易斯落后地区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概念，别无他意，只是想说明，落后地区工业品市场比较狭窄，大多又是内地照顾性供货。本地市场价格受内地供应价格所决定，这是利用国家支援实施价格改革的有利条件。西藏日用消费品和建设物资，绝大部分靠内地调入。中央目前对西藏需求采取特殊照顾，基本上是要什么给什么。就我们看到的情况和商业部门反映，西藏市场几乎没有什么紧俏商品，内地奇缺的高档自行车、彩色电视机等，

这里均能基本满足。所以价格改革展开后，价格涨落的幅度与周期，基本上取决于商业部门的库存结构与进货反应速度。如果商业系统改革同时展开，理论上，不会出现某类商品价格持续高涨的局面。同时，在近年内地商品价格大致稳定的基础上采购，如果运输部门同时改革，进货量与进货速度同时增加，价格总水平有可能会呈下降趋势。相反，现在的价格体制严重束缚了商业、运输部门的经营积极性，进货结构不合理和进货速度迟缓，反而造成价格涨落的恐慌局面。

第三、计划管理松弛

物价管理松弛。全区193万人口，只有物价管理人员66人。除自治区设物价处外，再无物价管理机构。全区74个县级单位，只有7个县各有物价管理人员一名。日喀则地区仅财政局有5名物价管理人员编制，19个县级单位没有1名物价管理人员。我们见到的物价管理人员，连一些基本数字都说不清。据自治区、日喀则地区物价检查情况看，各企事业单位相当程度上是在自由定价。日喀则地区物资局卖水泥，定价883元/吨，为国家牌价的182%。吉隆县供销社去年卖胶鞋，一看门口排队，当即涨价0.50元/双。定日县九个国营（包括准国营：集体）

企业，6个没有会计。县车队几年来连帐也没有。一些加工制造企业漫天要价，更是司空见惯。1983年年初全国棉布、化纤调价，那曲地区商业局一直到1984年年中还未调，原因是商品目录丢了。日喀则地区1399名商业职工中，文盲半文盲竟占22%。许多基层供销社没有会计、出纳，进货售货没有往来帐，卖多少算多少，没见过的商品只好按“平均价”（即将同种类商品最贵的和最便宜的价格加在一起除以2）出售。闹出诸如没见过啤酒，干脆按大曲酒价卖的笑话。相当部分的物价，事实上本来就处于无人管的自由浮动状态。

西藏基层企业单位极少。许多地方政府缺编一半以上，责任制实行以后，除财政分配和发放救济以外，几乎没有什么经济管理职能。各企事业单位机构不健全（如定日县商业局仅局长、副局长二人，又分兼供销社和粮站的会计，工资也在企业开支），日常活动各行其事，互不统属，经济联系松懈，远没有象内地那样形成严密的交叉网络。逻辑推理意义上的牵一发动全身的相互影响，在实际运行中往往有相当长时间的滞后。

第四、国家财力、物力的支援。按1984年预算计，中央用于企业的亏损补贴2.3亿元，基建投资3

亿元，仅职工高原临时津贴一项就高达4404万元。这些钱稍一挪用，应付影响最大不过28万城镇人口的改革，是绰绰有余的。

改革优势

“一张白纸，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

落后地区的经济体制改革，不仅具有突破容易的有利条件，而且在改革的经济体制模式上，具有比内地发达省份更宽阔的选择空间。内地发达省份的传统体制，经三十余年周密运转，内部机理盘根错节，对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渗透，也较比落后地区粗放型的“大锅饭”体制深广得多。如果说内地“大锅饭”体制的运转已经与社会生活融为一体，落后地区“大锅饭”体制与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就在相当程度上还处于“两张皮”的境界。这种境界，使得落后地区的改革，可以更少地受到来自社会生活诸多方面的传统体制影响的干扰。在经济模式的选择和尝试中，具有较发达省份更大的灵活性，有可能“走得更远”。

5-4 改革的突破方向：流通

改革的目标，首先不是致富，不是产值的增长和国民收入的提高，而是改变人与人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经济关系，变计划调拨、不分你我为等价交换的商品经济关系。因此，改革的重点，首先还不是直接生产部门，而是能够直接促成交换的流通领域。从根本上说，生产企业的活力，应当是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可是，从当前的现实出发，生产企业的生产积极性如想具有商品经营而不是自然经济的性质，首先取决于是否存在处处可以实现的等价交换的外部环境。流通，对改革信息（商品交换关系）的传递，要比生产企业通过物质生产的产品所能发挥的作用迅速得多，也广泛得多。特别是在落后地区大部分在交换中实现的商品都不是本地产品的情况下，更是如此。所以，要想最快地达到最大限度地调整出一个社会规模的商品交换关系的目的，在先后次序上，能够贯通城乡的商业、运输、金融等流通部门的改

革，应予优先考虑。

粮　食

以农牧业为主的落后地区，温饱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稳定的生活必需品供应，尤其是粮食供给，仍然是城市系统彻底改革得以安全进行的保证。与内地发达省份农村的一个重大差别是，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实行以后，农产品供给状况虽有极大的改善，但并没有象内地一样出现广泛的全面过剩。因此，正确制定粮食的经营方针，不仅是经济改革全面展开的前提，同时也是维持社会安定的必要保证。

西藏193万人口。除八十年代年均3257万斤农区返销不计，牧区48万人口，城镇28万人口。商品粮供应人口占总人口的39.4%。商品粮稳定需求在2亿斤左右。相当于最近4年平均总产的23%。毫无疑问，粮食部门的经营职能，对西藏经济—社会的稳定举足轻重。

粮食部门1959～1983年销售商品粮总计35亿斤，亏损3亿多元。经营越多，亏损越多。六十年代平均每销售一斤商品粮亏损0.045元；七十年代亏

损上升为0.069元；八十年代高达0.173元。粮食部门的亏损额不仅随经营总量增加而增加，而且单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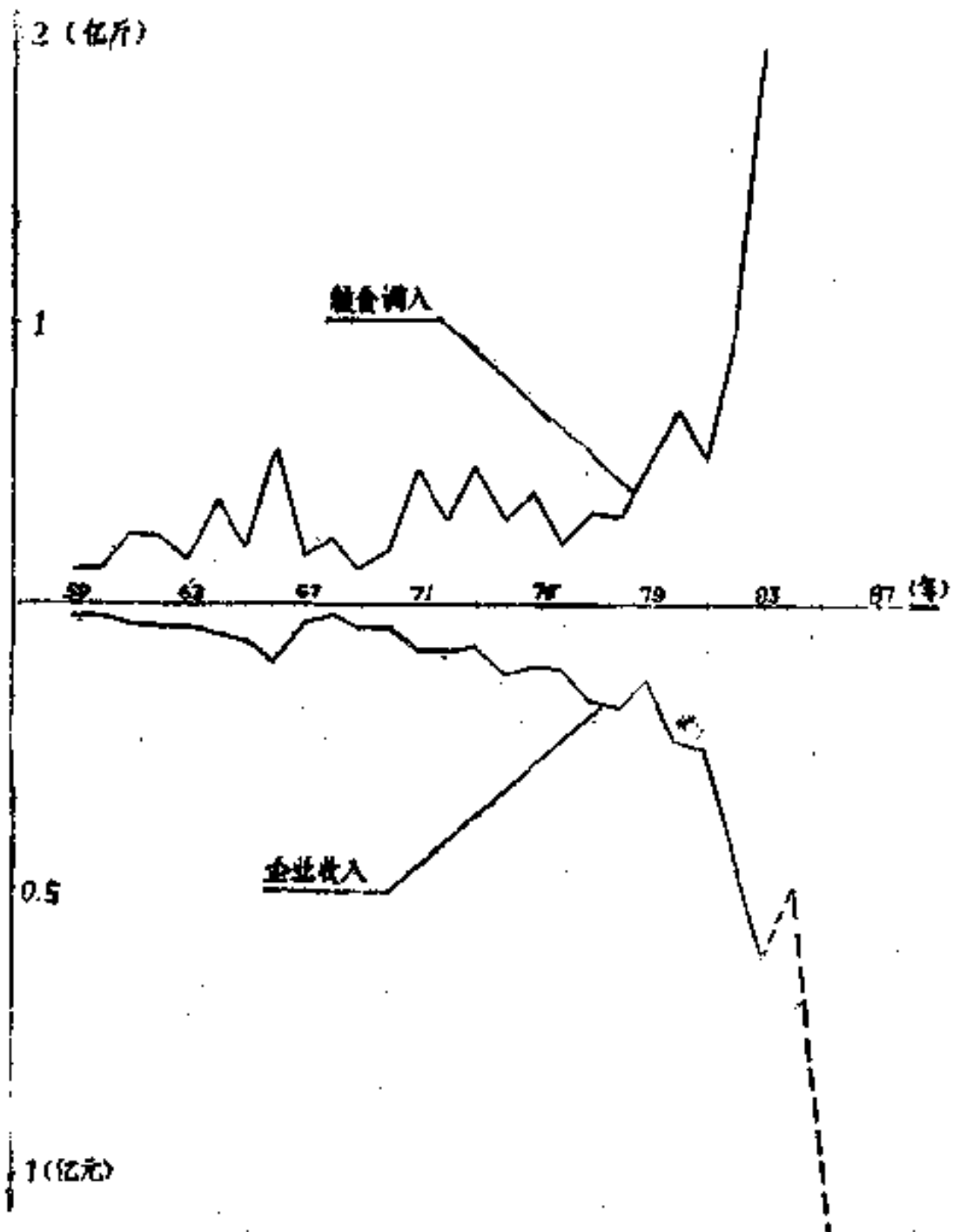

图5—3　西藏粮食调入与国营粮食企业收入
（虚线为1984、1985年财政预算数）

注：1984年计划调入3亿斤，1985年计划调入4亿斤。

亏损也越来越大。

粮食出路何在？简单反对“粮食自给”的口号没用。西藏面临的问题是不自给，谁给？

第一，中央给。给粮就得给钱，粮食经营单位亏损越来越大，与内调粮越来越多，有直接关系。1959～1983年，调入粮年递增12%，企业亏损年递增16%。1983年内地调粮，每斤亏损0.28元。调进2亿斤，亏损6105万元。仅损耗一项高达7.8%。调进3亿斤，等于扔掉2340万斤粮，1146.6万元；调进4亿斤，等于扔掉3120万斤粮，1528.8万元！1984年全区商品粮需求2.9亿斤，计划调入3亿，亏损补贴8400万元，明年计划调入4亿斤，预计亏损1.1亿元。随基建规模扩大，商品粮需求逐年猛增，中央调粮也逐年猛增。实际上这条路是走不多远的。巨额亏损且不论，运力就是问题。1983年区运力进藏物资19.32万吨，调入粮2亿斤，已占运力的一半以上。如调入4亿斤，现有运力全部调粮也不够。

第二，就地采购。1980～1983年，虽然遭受了严重的自然灾害，平均年产仍有9亿多斤。农业人口人均771斤。如人均分配水平能压到600斤，即可售出2亿斤商品粮，基本满足全区现有城镇与牧区人口的商品粮供应。从市场粮价看，我们搜集到的

20个市场价平均为0.48元/斤，比内调粮平均成本价0.49～0.53元/斤还便宜。如能按0.48元/斤实现就地采购，销价不动，按1983年销售量计，当年即可减亏1400万元左右。

当地粮价地区差、季节差波动幅度在160%之间。搞得好，还可以减少收购成本。问题是这需要粮食部门有极高的经营积极性。这是目前实报实销体制根本办不到的。

第三，扩大进口。1983年粮食部门从尼泊尔进口粮420万斤，口岸交货价面粉0.325元/斤，大米0.375元/斤。目前尼方愿与我订长期合同，年进2～3千万斤，平均价0.325元/斤。吉隆口岸边民贸易粮价仅0.30元/斤。如以日喀则为目的地计，进口粮价格仅为内调粮成本价的70%左右，而且节约了大量运输能力（格尔木至日喀则1520公里，樟木口岸到日喀则仅486公里）。

另外传统的盐粮交换也是很有前途的。西藏湖盐资源丰富，与尼有年均千万斤的交换传统。尼方提出年进5万吨湖盐的要求，如能实现，2换1，即5千万斤粮。现我湖盐到口岸成本价0.144元/斤。2换1，折粮才0.29元/斤。但这也是现行体制作不到的。

粮食出路何在？我们认为，应制定以就地采购为主，内地调入和扩大进口为辅的长远方针。理由有三：第一，内地调粮即使有运力、不亏损，也不可取。粮食运输机会成本过高，运进来吃的，就不能运进对商品经济有更大价值的商品，尤其是运进后可改变落后生产方式，开发本地资源，不断滚动增值的商品；第二，即令西藏以牧为主，现代化畜牧业没有光啃草皮的。而大量运进廉价销售粮食，只能起到抑制本地粮食生产势头的消极作用；第三，就地采购可以提高本地农村的商品率，刺激交换，促进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转换。

但是，要实现这个方针，粮食部门非实施彻底改革不可。目前各地粮食部门虽也口头上说“随行就市”，但自治区一级除准备进一步提高收购价外（提高后仍低于市场价20%左右），没有进一步的措施。事实上还是依靠中央调粮，当地能收多少（严格地说是老百姓愿售多少）算多少。这种状况不改变，粮食供应势必只能越来越躺在中央身上，各级粮食部门实际上将成为从上到下分配粮食的行政调拨机构。

改革设想：

一：中央调入3亿斤不再增加，补贴封顶在

8400万元。按固定商品粮供应量将调入粮指标的相应亏损补贴逐级包干，县以下粮食企业一律带指标招标承包，可以进口，可以跨区采购，也可以按成本价要调入粮。减亏盈利一律归己。社会新增商品粮需求随行就市，高进高出。救济粮不再带救济款，由民政部门直接发放。此方案可以在亏损不再增加的前提下，使粮食企业多方采购较调入粮成本价便宜的粮食。缺陷是，第一，在地方严重缺编的情况下，封顶难以实现；第二，保留了现有部分的购销倒挂和亏损补贴，每年调3亿斤粮，占去了区现有运力的78%，运输结构极不合理；第三，有亏损补贴作后盾，强化了现有粮食部门的垄断地位，抑制民间粮商的兴起。但不妨作为改革的第一步。

二：区级粮食局性质不变，主要从事内地粮的调入。调入粮按供求价批发给各地粮食企业。区以下粮食部门一律招标承包，粮购销价随行就市，高进高出，自负盈亏，取消一切粮食补贴，企业间没有统属关系。救济粮由民政部门发放。自治区级调入量的大小，储备的多少，可直接平抑市场粮价，以防谷贱伤农或谷贵伤工，宏观上不会失控。此方案可一举解决以上矛盾，但牵扯到城镇人口与牧民福利，同样须与相关部门的改革统筹考虑。可视第一

步改革实施情况而推进。

取消粮食倒挂，并非有不能克服的困难。目前平均销价0.21元/斤，取消倒挂，粮价上涨1倍以上。如果畜产品收购价放开，对牧民影响不大。1983年牧区销粮8716万斤，与市场价差合计2353万元。但羊毛收购价放开，仅此一项牧民即能增收1800万元左右。另加肉、皮、活畜等，按现有销售和收购量计，基本持平有余。粮销价随行就市，主要与28万城镇人口关系较大。按1983年供应量计，要增支3240万元，人均115元/年，月均9元。这部分增支仅为1983年粮食部门亏损的一半多一点。帐算得再粗，用亏损发补贴，还是够用的。

商　业

国营系统（包括“准国营”：集体）的零售、批发业务，占西藏自治区区内零售额的90%左右，于全区商品交换中处于绝对优势的地位。鉴于前文对农村商业活动发展的前景分析，可以肯定地说，国营商业系统的这种地位，短期内绝难动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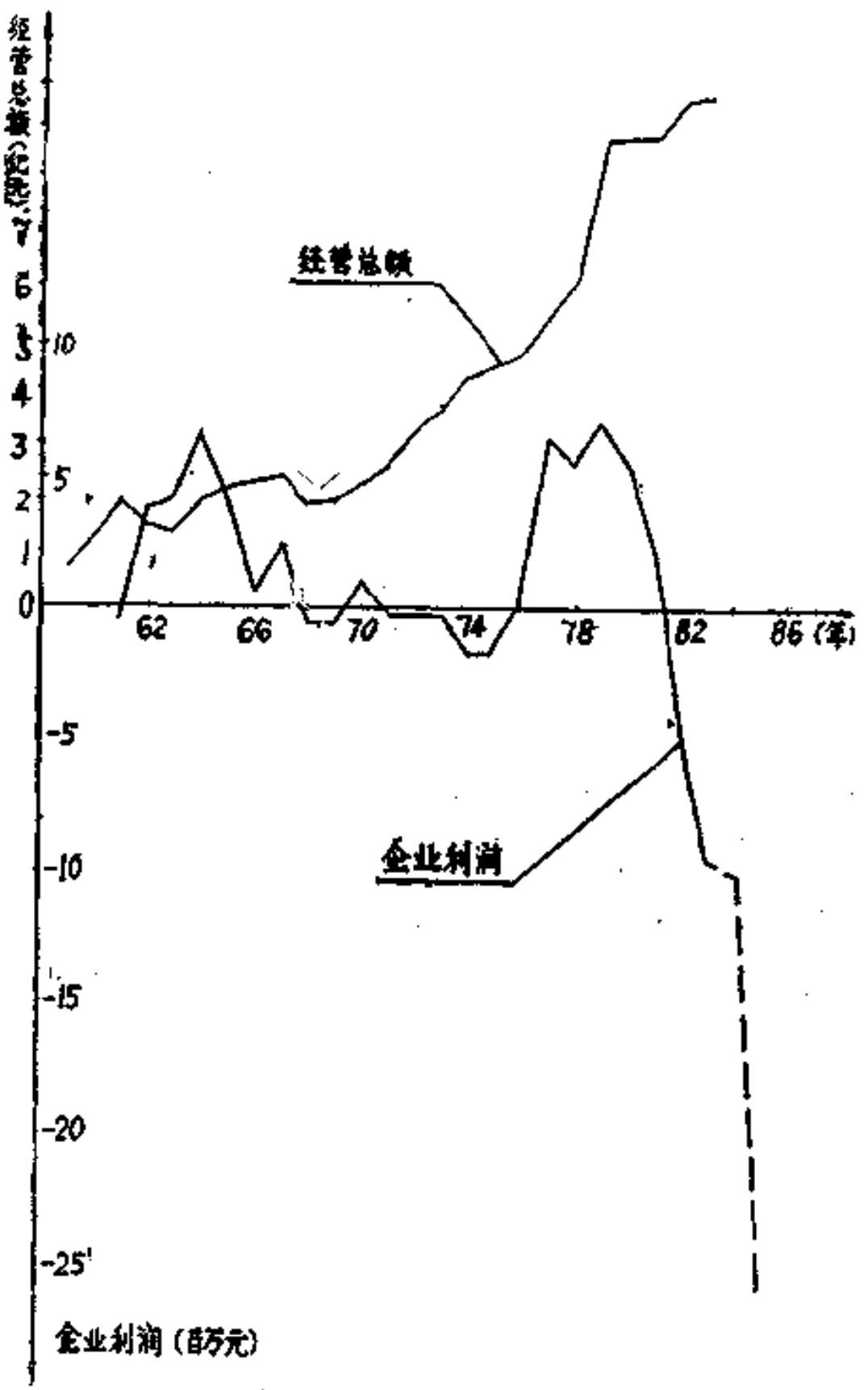

图5—4　国营商业经营总额与商业企业利润
（虚线部分为1984、1985年财政预算数）

国营商业系统1983年亏损955万元。1984年预计亏损2500万元。看来经营越多越赔钱，也已成不可逆转之势。全商业系统百元销售利润—0.49元。流动资金周转率年仅0.64次。经营百货五金的贸易公司年仅0.52次，为全国平均水平的15.76%。1983年库存竟高达6.4亿元，为自有资金的24倍。库存中贸易公司、医药公司和外贸公司三家就占4.4亿元。按实有库容面积推算，即有42.5%的商品露天存放。全部库存中30%是冷背呆滞商品。大量库存的原因是运力紧张；运力紧张的原因是大量库存。一些积压货在区内盲目地调来调去，更是毫无道理。一方面运力奇缺，格尔木商品周转能力为1.5万吨，经常屯积4万吨，堆积如山进不来。另一方面，全区总共193万人口，最难运的民族瓷器1982年竟一次进货400万件，现在库存近500万件。一共193万人口，库存内地皮布鞋400万双。一共193万人口，一次进汽球120万只，现在积压90万只，只能作报废处理。至于经营管理混乱造成的损失更不胜枚举。1983年拉萨市胶卷脱销。1984年清查竟发现1万卷过期胶卷。这样的经营状况不改变，繁荣西藏的商品经济，只能是一句空话。

改革设想：

一：除一些放开后价格可能会持续高涨而又影响群众基本生产生活的特殊商品外，其他商品价格一律放开，自由浮动。自治区商业厅及所属专业公司，因内地采购渠道（主要是商业部、各专业定货会议及京、津、沪三大市）基层一时不易掌握，暂且性质不变，但主要经营批发。县以下商业企业招标承包租赁，劳动人事工资自主，自负盈亏。特殊商品，由国家组织特供商店经营。作为过渡性方案，特供商店的经营范围一开始可定得宽一些，如茶、石油、化肥和建材等。

商业系统价格放开，除茶叶、肉倒挂1500万元左右，目前紧俏商品不多，尤其是30%以上的库存积压品会降价出售，总的价格涨落幅度有可能是乐观的。

此设想只能是一过渡性方案。自治区以下企业自负盈亏，对区级商业亏损不再承担义务，起码可以减少大量积压货在区内调来调去，同时促进民间交换活动迅速开展。此设想虽对区一级商业发生新的约束，毕竟解决不了上述瓷碗一类大规模胡乱进货的损失。尤其解决不了所谓“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商品”的大量浪费。目前西藏水泥损耗率高达30%以上；水泥奇缺，但民间建房处处有水泥。玻璃等

建材损失、外流更为严重。石油至关重要，石油浪费也最为严重。柴、汽、机油的市场价比石油公司供应价还便宜。空前紧张的石油，甚至出现“买方市场”。一辆私人拖拉机路边一停，一群国营系统的司机围上去兜售公家钱买来的油票。此外，用特供商店供应紧俏物资，其他企业放开，势必形成套购的问题，使价格倒挂的好处根本到不了消费者手中。固然也可以采取对紧俏、倒挂商品增发票证的补偿办法，毕竟范围有限，手续庞杂，非长久之计。

二：随市场供应情况变化，逐项减少特供商店的经营范围；逐步使各个专业公司与特供商店脱钩，实现进货批发单位企业化，承包经营，逐步作到除极少数战略物资外，取消特供商店，全商业系统经营企业化，行政管理归政府，政府不再参与经营活动。

运　输

西藏目前全区运力几乎100%在国营系统手中。运输部门的经营状况，同样不能继续下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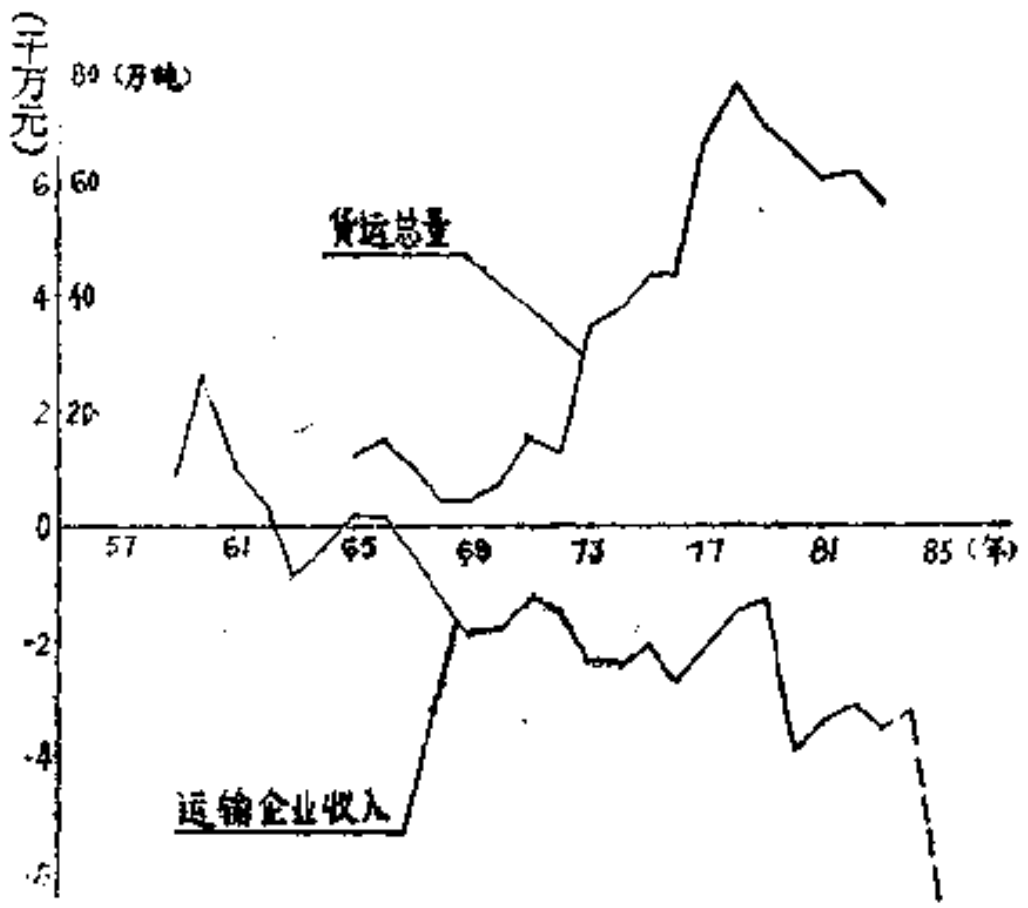

图5—5　西藏货运总量与运输企业收入

（虚线为1984、1985年财政预算数）

西藏是全国唯一一个没有铁路而全靠公路运输的省区，同时也是全国唯一一个公路运输企业亏损的省区。1965～1985年，货运总量近700万吨，亏损3亿多元，平均每运一吨货亏损46.84元。1983年亏损2482万元，1984年预计亏损5800万元。运得越多赔钱越多，运得越远赔钱越多。从统计数字来看，西藏运输业与粮食、商业一样，首先已不是什么扩大人员、扩大网点、扩大经营的问题了。

运输业亏损巨大，与运价不合理、高原缺氧、路况不好等客观因素有关，但主要还是经营不善。从交通厅直属两公司的报表看，西藏国营系统运输业有“一高三低”，即：①成本高，1983年千吨/公里成本为全国汽油车平均成本的175%，全国名列第一；单位耗油量柴、汽油车均为全国平均水平的1.5倍。②工作车率低，1983年为40%，是全国平均水平的56%，全国名列倒数第一。③完好车率低，1983年为60.3%，是全国平均水平的69%，全国名列倒数第一。④车吨年产量低，1983年主挂车综合生产率26155吨/公里，是全国平均水平的67%，全国名列倒数第一。

运输，是搞活商品交换的动脉。目前西藏运输业运得越多、越远赔钱越多，运输部门除行政调拨指令性计划外，毫无营运的积极性。这种状况不根本改变，粮食、商业部门的改革，只能是一句空话。西藏汽车营运，是否非赔钱不可？据我们了解，并非如此。农村开始出现的汽车专业户就是最好的说明。这里仅举一例：国营系统营运汽车空驶率高达60%以上，拉萨市城关镇西饶旺节年初买生产队汽车至今半年之久，平均每月出车25天左右，竟没有一趟空车。他主要给国营单位拉货，运费与国家规

定的一样，并且没有各种福利、补贴，价格上由于没有空驶，白赚0.125元/吨公里空驶费，半年收入12500元。

改革设想：

一：保留骨干，余下车辆和运输企业一律承包租赁经营，运价浮动，自负盈亏。1983年自治区运力解决进藏物资19万吨，其中交通厅直属两公司运进12.5万吨，占65%。地市交通局运进5.1万吨，占26%。而该两公司拥有车辆仅1650辆，占全区2吨位以上货车总量的15%。加地市两级交通局，不过3353辆，占货车总数的31%。如先保住这31%的车辆，区外进货的91%就有了保证。余下70%的货车一律承包租赁，也不会引起全局过大震荡。此设想可作为过渡方案。好处是基层运输业可以大大活跃。缺陷是形成两套系统后，势必在油料、配件、货源上发生激烈竞争，在这竞争中，保留的国营系统显然要处于明显劣势。

二：视第一步改革实施情况，除保留少数战略物资运力外，将交通厅区属车队和地市交通局车队逐级放开。放开地市级车辆后，自治区级虽仅有15%的车辆，仍保有65%的进藏物资运力，进退仍有余地。最终目标是运输部门全系统企业化。各行政

部门原则上不再保留有营运能力的货车。运力调配主要交市场调节，政府部门用车一样随行就市，公平交易。特殊情况可以征用。

运价放开，前景似乎并不象一些人们担心的那么可怕。虽然到处可以听到运力紧张的呼声，目前民间运价事实上并不比国家牌价高多少。有的汽车专业户运输价格与国家一样。被誉为大捞其钱的拉羊毛，从拉萨至樟木口岸，私人0.45元/吨公里。国家0.36元/吨公里，不计国家驾驶员工资、福利、外快，也不过高出25%。1960年交通部门盈利2.7千万元。那时的运输成本应比现在高，运价不过0.26—0.42元/吨公里。即使将1983年全部亏损（包括经营性亏损）打入运价，吨·公里不过上涨0.06元。

信用社

金融是商品经济的催化剂、润滑剂。西藏民间资金缺乏，但信用社并未起到促进资金周转的作用。1983年全区农村系统信贷资金2.5亿，户均714元，可谓不少。但实际贷出累计额仅2655万元。日喀则地区略高，信贷资金4119万元中，也仅贷出850万元。

资金运用率0.6次/年，几乎成了死钱。

信用社资金周转慢的一个突出问题是贷款免息。银行系统只有滚动基数储蓄奖，信用社无息贷款利差按3.3厘由农行补贴，但要贷款回收后，这笔比存款利息（转存农行3.6厘）还低的补贴才能拿到手。一家要白补白贴，一家又无利可图。银行没有鼓励信用社贷款、收款的积极性；信用社则将钱存入农行，利息又高，又发奖金，毫无贷款兴趣。结果信用社不仅只存不贷，就是上级拨下来的贷款资金也转存了农行。定日县信用社银行存款中就有一半以上是上级拨款。老百姓说信用社是“存款高兴，贷款审讯”，非万不得已不贷。其结果反过来打击了群众的存款积极性。1983年农村社员储蓄人均16.82元，全国倒数第二，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36%。另外，由于多次核销陈贷，有些群众连银行贷款与财政拨救济款的界限都分不清，越发贷了不还。结果加剧信用社收回贷款的困难，进一步抑制信用社贷款的积极性。长此以往，形成恶性循环：在信用社贷款无利可图的基础上，老百姓不愿还款，信用社就越不愿贷款；信用社只存不贷，群众有钱就不再愿存。最终信用社促进资金周转的功能将日趋退化。

信用社网点少，人员素质差、经营管理混乱的情况，比起商业系统而言，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全区信用社站和人员的覆盖面积分别为2588.5平方公里和1078.1平方公里。日喀则地区97个信用社，社均2.7人，经常是一人身兼会计和出纳二种工作。几乎100%的信用人员是小学以下文化水平。1983年全区信用社亏损面高达30.16%。日喀则地区信用社会计差错率、出纳差错率，两个指标竟分别为银行规定的5.7倍和15.3倍。

资金是商品经济最活跃的要素之一。资金死，商品经济不可能活跃。搞活西藏经济，打破自然经济的停滞，加速资金周转，具有特殊的关键作用。金融部门的改革至关重要。

改革设想：

一：信用社全部招标承包，租赁经营，存贷利率有限制地浮动，自负盈亏。农行规定信用社准备金，同时开放委托、信托业务，鼓励和提倡资金流动。首先使农村系统的资金流向由市场调节。然后通过允许信用社与各专业银行直接进行业务联系来逐步扩大金融体制改革范围。此设想可能解决贷款使用到最需要之处和信用社吃“大锅饭”、经营管理混乱等问题。但信用社存贷利息浮动，可能造成

与其他银行系统抢存款和偏远贫困地区付不起高息而不能贷款的情况。

信用社在目前国营银行系统中，距离“大锅饭”的核心较远，并具有一定程度的自负盈亏形式，最有可能成为银行企业化改革的突破口。但是从长远看，信用社目前承担的职能又较其他专业银行更复杂。它既是农业银行的“腿”，等于农行的下伸机构；同时又负责农村的工商信贷，具有城市商业银行的职能；同时还具有社区性储蓄银行或小社区内互助性金融机构的性质，以满足附近居民或参加储蓄的客户之不时之需。故而，上述设想只能作为金融体制改革的一个尝试性方案，推行之后一定要有意识地引导信用社职能的分解，包括一社内部职能的分解，并同时推进专业银行的改革。

二：随信用社改革后职能的分解，逐步使农行、建行、工商行的利率相对浮动和经营企业化，尤其是工商行、建行的改革可以先行。信用社可按届时经营状况重新归口。在这之前，农业银行和地方财政可通过专项贷款和贴息的办法，妥善解决农业贷款和一些居民、客户的燃眉之急。

以上几个部门的改革，可作为改革的重点，给予优先考虑。改革方案的实施与推进，需统筹考

虑，协调同步进行。简单地孤立地分部门按条条改，很容易顾此失彼，使全局陷于进一步的被动。改革的前提是价格（包括资金价格——利率）浮动。粮价动，工资就得动；工资动，所有产品（包括商业、运输等服务产品）成本也将随之变化。运价动，所运的一切商品价格均要动。商业系统的价格改革，更是如此。资金价格动，所有用款单位都要受影响。即便是信用社改革，供销社和基层企业也要受到相当大的冲击。所以，任何部门的单独行动，都有可能影响甚至损害相关部门的利益。因此，必须充分调查研究，周密测算价格可能的涨落幅度与社会承受能力。

5-5 有时空结构的改革战略①

前述几个要害部门相互连动的改革设想，是一次脱胎换骨的大手术。无疑，将对社会-经济系统以及整个社会生活，发生极其深刻的振动和强烈的

① 这一思想方法，参见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以农村为突破口，实施分区立体开发的改革战略》。

社会反响。全面改革不仅涉及到每一个人的物质利益，而且涉及到人们的社会地位、价值观念、自我评价等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出现一定程度的混乱，是难以避免的。

一场大动作的历史变革，涉及的对象，是千百万富于主动性和丰富想象力的大活人，决非等同于任何一项技术工程，因而也不可能没有一定经济、社会乃至政治上的风险。可以说，改革的动作越大，涉及的社会生活越深刻，可能得到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预期越高，各种风险也就越大。改革方案设计得再好，调查研究进行得再周密，也不可能使每一步都丝丝入扣，滴水不漏。改革是个创新的历史过程，不是一项经验工程。决不能指望根据已有经验，去全面准确地创造历史，把握改革进程中每一步决策在方向上和程度上的所有可能。人类社会作为控制理论中的“特大复杂系统”，最突出的特征是它的不可逆性，即不可能重复。而人类思维的悲剧恰恰在于，人们只能用知道了的也就是发生过的知识去把握不曾发生而且是不会重复发生的未来。对这场历史性的变革，事先周密审慎的调查研究是一回事，为改革进程中能应付大量不确定性，而使改革决策留有充分回旋余地，又是一回事。因

此，为使改革安全进行，为避免贸然大动作改革可能带来的风险，针对落后地区内部地区差异大，交通不便，不同区域间相对封闭隔绝，信息传递时间较缓等重要特点，把特大复杂系统逐级、逐块分解，在避难就易，避重就轻，分区开发，重点突破的指导原则下，建立一个有时间、空间结构的改革战略，是极有必要的。

仍以西藏为例，就其现有六个地区看：

拉萨市经济水平较高，改革后见效快，能迅速创造其他地区改革的物质条件。但该地区为自治区区委所在地，城镇人口集中，机关部门盘根错节，改革难度大，改革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定程度的混乱，有可能形成较大的社会反响，不易轻动。

那曲、阿里地区经济落后，经济关系简单，改革很容易成功。但两地区以牧为主，经济活动单一，经济发展潜力短期内难以见效。其改革成功的经验因经济关系过于简单而缺少推广价值；改革成功后经济效益也不能对全区经济颓势的扭转发生很大影响。

昌都、山南地区农牧结合，传统贸易和工业、手工业发达，自然资源丰富，是经济体制改革试行的良好场所。但前者与四川接壤，改革措施波及内

地，马上要面临改革区与非改革区的复杂关系处理（如不同价格体系导致的商品和要素流动）；后者则与边境争议地区接壤，政治上较为敏感，必须从慎从稳考虑。

日喀则地区现有固定资产占全区第二位，有工、有农、有牧，全自治区27个传统通商口岸该地区就有17个。传统内外贸易发达，旅游资源极为丰富。“大锅饭”体制的经济关系相对松弛，经济发展，对外开放极有潜力。政治风险也较小。因此，改革可以在此率先突破。

重点改革地区确定之后，还可以考虑在重点改革区内寻找“小特区”率先突破。如日喀则地区的樟木口岸。价格改革在“小特区”内首先展开，企业承包租赁，自负盈亏经营，取得经验后再稳步推广。

在改革措施上应考虑制定一系列有连续性的方案，每推进一步都必须迅速搜集反映和进一步测算（包含社会测算），并调整下一步后续措施，形成反馈系统。在空间上，可考虑不同深度的改革措施在不同地区呈梯度分布。如：全区或某地区动第一步时，改革区已实行第二步，改革区之小特区已实行了第三步。而全区或某地区的第一步又是后两区

的经验证明成功的东西。这样，分步、分区逐次推进，可望改革以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大的成功。

区级改革领导班子以及重点改革区，应相应配备强有力的干部。同时应组织较强的政策研究和改革方案设计班子，保持改革区与全区动作配合的信息传递准确迅速、及时，并随时总结经验，调整政策。同时，着重在改革过程中发现和培养会改革的干部，以利于全区全面改革时使用。

经济体制改革，是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探索。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有支持改革的物质条件，需要有新的经济理论对改革实施有力的指导，需要有一支新的干部队伍去推行改革。然而，我国的改革事业恰恰是在落后贫穷的基础上发生的；我们所要创造的模式，又是任何逻辑推演所不能先验完成的。我们正是要通过改革去创造改革的物质条件，通过改革去创造自己独特的经济模式和经济理论，通过改革干部制度去培养一支新的干部队伍。“悖论”式的逻辑循环发生了：没有强大的物质基础，改革就不能顺利进行，而不改革，又永远不可能产生改革的物质条件；没有改革理论的指导，改革就不能顺利进行，而新经济理论的建立，又有赖于改革实践的展开；没有新型的干部队伍，再好的干部制度也

只能是一纸空文，而没有新的干部制度，新型干部队伍永远也不会成长起来。如何走出这一逻辑循环，以最小的代价，获得改革的成功？前述分区、分步逐步推进，在避免全面振荡的前提下，选择某些区域重点突破，同时创造支持改革的物质条件，创造改革的经验和培养新的干部队伍，不失为一种可供选择的思路。从这个思路出发，在国家财力、物力的强大支援下，选择某些资源条件较好，经济潜力较大，改革展开时，对全局经济、社会、政治震荡不大的落后地区，率先展开全面彻底的改革，以创造能够支持其他地区改革的经验、干部和物质条件，对全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事业，也不无战略意义。

第六章

百业待兴

孰执牛耳

从经济发展看，落后地区的落后，表现为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商业、饮食服务业等各个产业部门的全面落后；从经济发展看，落后地区的振兴，最终也应表现为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商业、饮食服务业等各个产业部门的全面振兴。这是毫无疑问的。需要研究的是，不管对经济部门采取何种方法区分，不同产业部门之间总有着内在的有机关联。工业的发展离不开农业、交通运输等行业的发展；基础设施部门的发展离不开直接生产部门的发展，反之亦然。在经济落后到经济振兴的过程中，我们首先应以什么产业部门为主，通过重点产业部门与其他产业部门的内在有机关联，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最终形成国民经济全面振兴的局面。这就是人们习惯说的产业方向的选择。早期英国在

纺织业发展的带动下，最终形成了称霸世界的资本主义生产力。日本战后以重化工为主“殖产兴业”短短几十年时间，取得了经济振兴的辉煌成就。汽车的发展带动加工工业和石油工业，加工工业和石油工业的发展，推动汽车工业的发展。产业部门之间互相促进、互相吸引、交替发展的奇妙机制，使西方发展经济学者们对此极为关注。在进出口部门孰先孰后的问题上，刘易斯曾依著名的“劳动力无限供给”优势，提出靠初级产品的出口，攫取工业化所必需的积累。普雷比希和辛格根据“贸易条件”说，提出避免集中出口初级产品，防止利润和购买力外流的“进口替代”战略。巴拉萨、杨叔进等认为应当把扩大出口特别是制成品出口，当作经济发展的发动机。在基础设施部门与直接生产部门孰先孰后的问题上，罗森斯坦-罗丹（早期）认为由于基础设施部门多半需要有较长的孕育期，而且投资额甚大，资本-产出率很高，故而基础设施部门应当优先发展，靠它的发展去诱发直接生产部门的建立。赫希曼《经济发展策略》一书中则针对性地提出“不平衡增长”理论，认为过多重视基础部门的发展，会使直接生产部门跟不上，造成资源浪费和降低发展速度。为使产品的市场有保证，他提出

先发展消费者最直接需要的部门，再发展间接需要的部门的“后向关联”理论。激烈的对立，使学者们开始出现新的溶合。纳克斯、钱纳利、廷伯金和罗森斯坦-罗丹（后期）等都认为，所有的经济部门都要协调发展，关键只在于部门相互之间要保持合理比例。库兹涅茨由于集“合理比例”之大成的统计分析，得到了诺贝尔奖。可是，研究和争论并没有到此结束，因为在这种或那种理论或模式的影响下，一些落后国家真的“起飞”了，一些落后国家真的继续落后了。

这里不想也没有能力对这些不同的理论作出统一的评价。想要表达的只有一点，根据对我国落后地区的观察，我们在选择产业或发展战略时所提出的问题，依然还是那句老话：谁去发展？

发展经济学注重的是不同产业部门之间的经济关联，无论是“前瞻关联”（即由基础产业部门向前推进）还是所谓“后向关联”，说的都是经济与经济的联系，都是以一个社会系统既有发展这种经济关联的动力又有能够利用这种经济关联的能力为前提的。实际上，这个前提如果能够真正确立，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可能早就值不得如此费劲了。落后地区的问题，恰恰在于如何使落后地区社会-经

济系统具有发展这种经济关联的动力和能够利用这种经济关联的能力。从发达国家的眼光出发，产业选择的出发点，是使经济人的经济活动更经济；从落后国家和落后地区的眼光出发，问题则是如何使自然人——不能象发达国家的商品生产者（经济人）那样经营的，更多具有发展自然经济趋向的生产者——学会象发达国家的经济人一样考虑和安排自己的生活和生产，以及按照商品经济原则去选择资源和开发资源。这时制定产业政策或发展战略，首先或第一位的，就还不是如何把握不同产业部门之间的经济关联；首先或第一位的，是如何判断不同产业部门的发展，对促进人的素质和社会发育程度迅速提高的作用。这与我们分析经济体制改革的道理一样，产业指导原则或发展战略，只有与落后地区落后的本质规定紧密结合在一起，才能真正有希望解决落后地区的难题。

6-1 目标与约束

将经济发展视为自然历史进程，不同产业之间

的关联就表现为客观的必然逻辑。有什么样的需求，就会提供什么样的供给；反之亦然。但是，人类的历史，从来不是排斥人类主观能动性的发挥、排斥人类不断选择的宿命过程。产业方向的选择和确定，正是在对经济规律的认识基础上，推动和加速经济发展的有力杠杆。不同产业的相互影响和交替发展，是一个随经济发展形势和需要变化而不断变化的动态过程。在这样的动态过程中，人们不断选择某一产业为主导产业或曰“带头产业”，简单地说，无外乎要追求两个经济目标：

第一、积累资金。即在某一时点上，突出某一产业优先发展，投入最少，产出最多，因而最能有效地实现资金积累，最迅速地增强整个经济系统进一步发展的实力。

第二、关联效应。即在某一时点上，突出某一产业优先发展，最能“向前”或“向后”有效地带动和促进其他产业的发展，以在整体上最迅速地形成最大范围和最有效的资源开发利用。

以上两个目标的实现，对一贫如洗的欠发达地区还具有至关重要的特殊意义。产业方向的正确选择，不仅影响着经济发展速度的高低，收入增长的快慢，同时还对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转变、恶性

循环向良性循环的演进，发生决定性的影响。从前文述及的落后地区所拥有的自然资源看，落后地区的产业发展，都没有一般经济系统所面临的严重的资源约束。相反，不少发展经济学家，都从资本收益递减和开发生产成本递增的方法，得出低度开发区各项产业发展边际收益远较高度开发区以及过度开发区高得多的有利结论。道理很简单，越是发达地区，资源利用集约程度越高，在时间维上，同样产出所需新增投资越多，资本产出率越高。相比而言，在低度开发地区，反而具有创造超额利润的可能性。这套说法显然与发达地区越发达，落后地区越落后的现实相矛盾。因为落后地区的产业发展，虽然没有严峻的资源约束，但却有另外更为严峻的特殊约束。

第一、人的素质差。这在前文已展开过论述。现在只需强调一点，落后地区任何产业的发展，都将不得不面对生活在自然经济中的落后地区居民缺少商品交换意识的现实。

第二、交通运输困难。这在前文也已有描述，这里需要进一步强调的是，落后地区任何产业的发展，都将不得不面对运输成本高的现实。由于落后地区运输条件差，地广人稀，单位货物的平均运

距，远较发达省份高得多。以落后地区承担主要运输任务的公路为例：

表6—1 几省、区平均运距

（货物周转量/货运量：吨公里/吨） 1983年

地区	西藏	新疆	青海	云南	贵州	宁夏	广西	内蒙	江苏	全国
平均运距（公里）	867	212	172	130	72	75	48	43	35	42

这意味着，五区三省与江苏相比较，通过公路平均每实现一重量单位的交换，内蒙、广西、宁夏、贵州、云南、青海、新疆、西藏至少要分别付出相当于江苏1.23倍、1.37倍、2.14倍、2.05倍、3.71倍、4.91倍、6.06倍和24.77倍的运输成本。之所以说“至少”，是因为运距只是构成运输成本的一个要素。落后地区山高坡陡，弯多路差，实际运输成本比平均运距表现出的差距要大得多。如贵州与山东比较，平均运距分别为72公里和68公里，比值为1.06。而实际运输成本则分别为190元/千吨·公里和110元/千吨·公里，贵州的运输成本为山东的1.73倍。如按这个比值再看没有铁路而全靠公路运输的西藏，加上高原缺氧，燃料、配件的运输成本，交通困难对商品交换的约束程度，就更可观

了。高昂的运输成本，等于对所有商品交换加了一道与距离成正比的不分地点的“关税”，或者叫“交换税”。它不仅是造成落后地区对外往来不发达的原因，同时也是造成落后地区内部交换萎靡不振的重要原因。

生产者的经营素质是能否发生商品交换和商品生产的动力源泉；运输，则是物质交换活动必不可少的媒介。这两个约束是任何产业也无法绕道而行的 谁也不会异想天开地把实现资金积累和关联效应的目标，寄希望于某种既不需要交换因而也不需要运输的产业上。固然，发展文教事业、修路买车，可以改变和缓解这两个约束。然而，文教事业以及修路买车，虽然能为所有产业的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但其本身，至少在目前尚无法直接起到资金积累和发挥关联效应的作用，尚不能包括在产业选择的范围之内。因此，落后地区产业方向的正确选择，必须以最大限度地改变人的素质和克服运输困难为前提条件。尤其是改变第一个约束，更为落后地区产业选择时必须放在第一位考虑的问题。

6-2 引进创造引进

丹尼尔·贝尔曾在《后工业社会》一书中，将人类进步的历史，描述为“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前工业社会依靠原始的劳动力并从自然界提取初期资源”；“工业社会是围绕生产和机器这个轴心并为了制造商品而组织起来的。”无论从哪个角度说，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社会的进步，现代化工业的发展，是进步的根本动力。落后地区的落后，最主要的生产力特征，是工业的薄弱与落后。大力发展工业，是在一般意义上绝对正确的选择。在这个思想指导下，三十余年来，我们基本上把落后地区经济振兴的希望寄托在以现代大工业为主的发展战略上。

相当部分的落后地区，拥有发展工业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条件（见第二章第二节）。无论是“向前连锁”还是“向后关联”，资源，都不构成大工业战略实施的明显障碍。可是，三十余年努力的结果，景况并不乐观。在落后地区经济发展的某一特定阶段，大力发展现代工业与事实上现代工业能否

发展起来，恐怕是两码事。

表6—2　全民所有制独立核算工业企业主要财务指标比较

单位：元　　1982年

地区	每百元固定资产净值实现的利税金	每百元资金实现的利税金	每百元固定资产原值实现的产值	每百元资金实现的销售收入	每百元工业总产值实现的利润	每百元工业总产值占用的流动资金
全国	33.4	13.7	95	75.4	14.4	29.7
新疆	16.53	12.25	58.53	68.62	7.65	34.74
贵州	12.97	10.15	68.63	51.75	8.96	46.22
青海	5.27	4.03	36.99	34.36	4.16	62.35
内蒙古	12.49	4.26	60.09		14.66	

新疆、贵州、青海、内蒙全民所有制独立核算工业企业每百元固定资产净值实现的利润和税金，分别为全国平均水平的49%，39%，16%和37%；每百元资金实现的利润和税金分别为全国平均水平的89%，74%，29%和31%；每百元固定资产原值实现的产值分别为全国平均水平的62%，72%，39%和63%；每百元工业总产值实现的利润分别为全国平均水平的53%，62%，29%和102%；新疆、贵州、青海每百元资金实现的销售收入分别

为全国平均水平的91%，69%和46%；每百元工业总产值占用的流动资金分别为全国平均水平的117%，156%和210%。靠如此水平的经济效益，想要达到迅速积累资金的目的，显然是不可能的。

在整个工业企业低效状态下，工业内部产业部门之间的关联，无论是“向前连锁”，还是“向后关联”，都不能形成健康的自繁殖机制。

贵州是落后省、区机械加工能力比较发达的地区。但经三十余年努力奋斗，其效益仍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向后关联”：

表6—3 贵州机械行业经济效益与全国平均水平的比较

1982年

	全国	贵州	贵州/全国（%）
平均资金产值率（元/百元）	88.9	33.1	37.2
人均利税率（元/人）	2158	584	27.1
流动资金周转期(天)	290	439.9	151.4
钢材利用率（%）	68	51.7	76.0
劳动生产率（元/人）	13400	4255	31.8

加工工业自身难保，当然也很难发生“向后关联”的积极作用。

“向前关联”：利用本地极为丰富的矿产资源，发展技术、管理以及对劳动力素质要求不太高的采掘、建材等初级产业，并推进产业部门的“向前关联”是否可行呢？同样困难。例如，贵州煤炭资源全国名列第三，按说各项技术指标也应较好。结果却恰恰相反。各项指标大多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表6—4 贵州煤炭行业技术指标与全国平均水平的比较

1983年

主要技术指标	单位	贵州	全国	贵州/全国（%）
一、质量				
商品煤灰份	%	21.88	20.91	105
商品煤含矸率	%	0.86	0.45	191
洗精煤灰份	%	12.47	10.32	121
洗精煤回收率	%	42.73	52.49	81
二、劳动生产率				
原煤全员劳动生产率	吨/工	0.587	0.873	67
回采工效率	吨/工	2.992	4.094	73
掘进工效率	米/工	0.091	0.113	81
三、材料消耗				
原煤生产坑木消耗	立方米/万吨	150.27	90.9	165
原煤生产火药消耗	公斤/万吨	3375	3117	108
四、回采工作面平均月产量	吨/个·月	8110	10908	74

再例如，贵州省石灰石资源丰富，现已探明可供生产水泥的石灰石矿点就有43个，储量达8.75亿吨之多，而且有大量煤炭，完全可以保证能源供应。结果仍然不能长足发展。原因还是经济效益差。1980年地方水泥平均综合煤耗200.3公斤/吨，是全国平均水平的121%；全员实物劳动生产率44.54吨/人·年，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55%；产品合格率74%，比全国平均水平低10.13%；亏损面高达55.56%，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30.87%。水泥不行，甚至烧砖也不行。粘土砖县以上砖厂平均煤耗，全国为1.04吨/万块，贵州高达1.57吨/万块，是前者的151%。即使如此，本省的砖还供不应求，仅贵阳地区每年要多花500多万元，从四川、湖南等省购入近1亿块粘土砖。

落后地区现代工业部门的发展，明显受到人的素质差的严峻约束。在贵州，我们考察了采掘、机械、电子、轻纺、农副产品加工等几乎所有工业部门，除少数个别产品的个别指标外，绝大部分行业和产品的经济效益，都远低于国内先进水平和全国平均水平。其中人的素质差，是其经济效益低下的根本原因。以科技人员的拥有量计，1982年全国平均每万人口中有科技人员62人，贵州49人，居全国第21

位；全国各类高级人才约占科技人员总数的1%，贵州占0.49%，居全国第19位；全国各类中级科技人员占科技人员的19%，贵州占12.7%；全国各类初级科技人员占科技人员总数的80%，贵州占86.8%。全国科技人员中，具有大学毕业以上学历的占45%以上，其中研究生占0.36%，贵州的两个指标分别为41%和0.15%。贵州全民所有制工业部门工程技术人员占职工总数的比例，煤炭、建材部门都不到2%；轻工业部门仅1.82%，其中纺织、缝纫、皮革、造纸、文教用品行业仅为1.6%，食品工业只占1.1%。

除人的素质差的严重约束外，落后地区现代工业部门的发展，同时也明显地受到交通运输困难的严峻约束。比如贵州省机械工业企业，由于交通不便，单位产值的汽油消耗量，高出全国平均水平29倍之多。有些初级产品，由于远离加工中心，交通运输成本往往占产品价格的30%以上。本来就质次价高的产品，再加个高昂的运输成本，其经济效益和产品的竞争能力，是可想而知的。

事实上，即使是落后地区现有的工业部门较差的经济效益，也是通过财政补贴运输成本，即压低运价，由财政补贴运输部门的亏损和在此基础上粮

食购销倒挂等，使粮、商、运部门分担工业部门的实际生产成本而实现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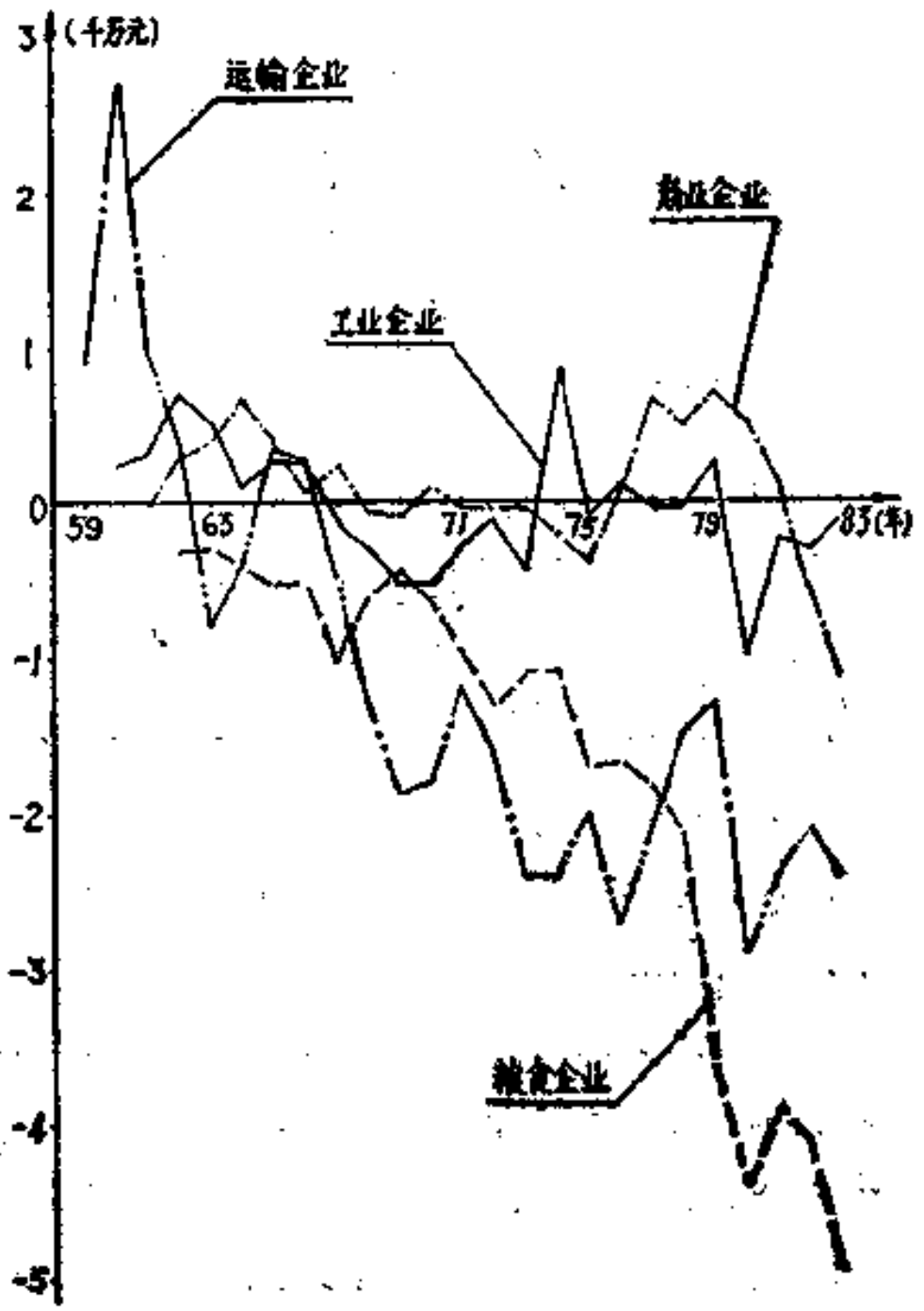

图6—1　西藏工业与运输、商业、粮食部门的企业收入

西藏商业、粮食、运输部门1983年亏损7537万元。换来的是工业企业196万元的亏损和区区1232万元的工业产品。这点产品，仅为工业总产值的9.5%；工农业总产值的1.8%；相当于商、粮、运服务系统亏损额的16%。工业产品收购是收上来了，卖得出去否，还不一定呢。这就是大工业战略的代价。

落后地区的振兴，需要有先进的生产力的发展。先进生产力的发展，在现代社会中，又由不得落后地区自发地形成。超自然历史进程的强行“嵌入”，本也是落后地区经济振兴的题中应有之义。问题出在哪里？著名学者舒马赫认为，是因为先进工业技术水平（包括相应的管理水平及所必需的社会文明），超出落后地区社会-经济基础太远，造成落后地区“消化不良”使然。他为此提出“社会问题与经济问题要求发展中间技术”的命题。应该说，“中间技术”这一概念，值得商榷。譬如贵州，1983年共有工业企业7256个，其中大中型企业148个，98%是“小的是美好的”小企业，其中20%是集体所有制的小企业。这些小企业所采用的技术，既有先进技术，又有传统技术，而且更多的可

能正是舒马赫所倡导的“中间技术”。可见，用引进的工程技术指标，直接说明大工业战略受挫的原因，是不够的。尽管如此，舒马赫研究的精到之处，正在于他独具慧眼地触及到一个朴素因而也更难把握的事实：“嵌入”的先进生产力与落后地区当地社会-经济基础的“吻合度”问题。

选择何种产业优先“嵌入”，问题并不在于现代部门所采用的技术先进与否，关键还在于，某一产业的发展，与当地社会发育程度的提高、人的素质的改变，有何种程度的联系。这种联系的纽带，首先和主要的，并不直接是产业与产业之间的经济联系；首先和主要的，**是与当地居民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变化的联系**。一般意义上，越是先进的技术，对当地落后的生产方式冲击越大。但是，无论是先进技术，还是“中间技术”，如果实施的后果——产品，并不为当地居民的观念所接受，那么，再先进或者再所谓“适度的”技术，也不可能引起落后地区居民的积极响应。我们在西藏考察时，经常看见只坏了几个零件的崭新的拖拉机，扔在露天任凭风吹雨淋。表面看是因为没有零配件，社会服务系统不健全；更深一层的原因是，对当地居民来说，有拖拉机是锦上添花，没有拖拉机生产照样进行。

从形式上看，不少诸如暖水瓶、军帽、自行车、手表等工业品，已经不同程度地渗透到落后地区部分城市居民的生活之中，但对大多数居民而言，这些需要通过货币交换才能得到的商品，还远远没有象茶叶那样成为生活“必需品”。不少落后地区的居民，不仅可以不要什么手表、自行车，而且可以不吃蔬菜，不吃鸡鸭鱼，甚至不吃小麦（如西藏）。传统的生活方式，不仅导致传统生产方式的延续，而且导致传统的价值观念，导致传统的满足。在传统的自然经济的满足中，排斥了对需要通过交换才能得到的商品的需求，因而也就泯灭了为交换而生产的积极性。在具有强烈自然经济倾向的落后地区，任何产业的发展，无论是“内蕴式”发展也好，还是靠引进的“嵌入式”发展也好，都必须以落后地区居民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改变为前提条件。如果不能使当地居民从不需要交换的生活方式中转变为需要交换并为交换而生产、为更多的交换而更经济地安排生产、选择资源开发技术手段，那么无论是什么产业优先发展，都很难实现资金积累和发挥关联效应。对处于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化的落后地区居民，经济逻辑是如此简单：**只有改变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方能通过为交换而生产的

经营活动训练，培养出经济核算的习惯，从而由提高效益的冲动，转换出对非传统开发技术的需求。在完成这个逻辑转换之前，谈论技术的先进与否、适度与否 是意义不大的；同样，在完成这个逻辑转换之前，当地社会-经济系统，也不可能对与这个转换无关或关系不大的产业技术作出积极的反应。

从绝对意义上看，绝不能说“嵌入式”地引进现代工业部门，对改变当地居民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没有影响。相反，大批“移民”的进入带来了新的文明；大批当地城市居民的成长，使相当部分居民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发生了根本性改变。这正是今天振兴落后地区经济的希望所在。但是从产业选择说，并不能说大工业战略是振兴落后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唯一选择，更不能说是最优选择。相反，现代工业部门的“嵌入”，并没有最大限度地直接触及当地居民的生活习惯和价值观念。当地社会-经济系统自然而然地对现代工业部门的发展麻木不仁。发展初级产品出口以提供积累吧，我不需要钱；发展加工制成品以提高生活水平吧，不仅技术、管理水平上不去，就是制成了，也没人买。产业部门间的经济关联，由于得不到当地社会-经

济系统的积极反应，只好在一个超越当地现实的封闭系统中，自我反馈，自我关联，悲剧性地将大工业战略整体演化成一个“引进创造引进”的恶性循环。

引进先进技术，决不意味着把机器买来就完事大吉。机器要运转，需要能源、零部件、原材料，需要技术工人和管理人才。要在毫无思想和物质准备的低度开发的落后地区，满足这些条件，则又需要继续引进发生能源的机器，加工原材料的机器，修理零部件的机器，以及为这些机器运转而需要的技术工人和管理人员……，发达地区的技术工人和管理人员，不能象落后地区居民一样吃炒面和生肉，他们要住好房子，要有医院，要看电影，子女要上学。于是，为了第一台机器的运转，必须使新的机器继续引进，新的人员继续引进，楼堂馆所也要逐一兴建起来……

图6—2是落后地区对先进生产方式“消化不良”，现代工业部门强行“嵌入”所形成的“引进”创造“引进”的典型机制。落后地区绝大多数居民，处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况，既没有更高层次的需求欲望，也没有挣钱交换的冲动。在这种情况下，被发展经济学誉为“嵌入经济”的现代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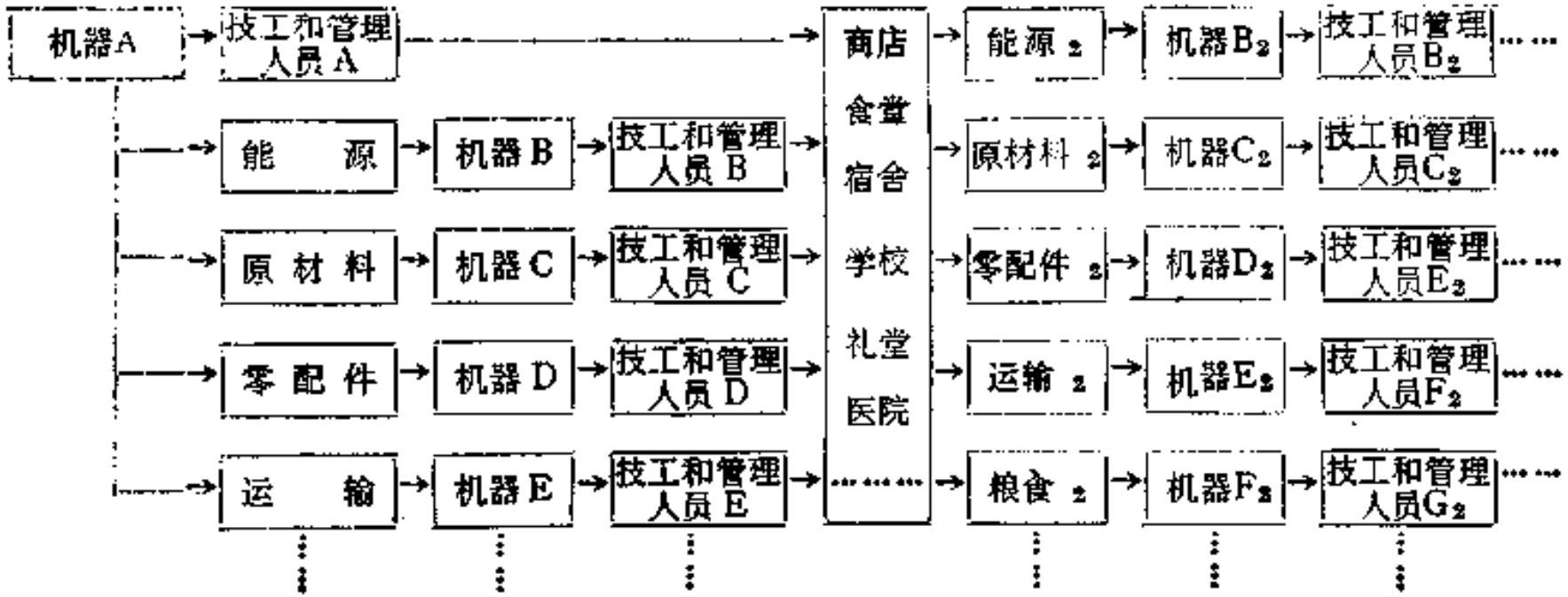

图6—2　落后地区的“引进”创造“引进”

门，象外星人来到地球上一样，不仅言语不通，而且整个价值观念都不一样。为了机器A的运转，必须继续引进为机器A服务的能源、原材料、零配件、运输等服务系统；为了使服务于机器A的机器B、C、D、E……能够正常运转，又必须继续引进服务系统的服务系统B_2、C_2、D_2、E_2……。这倒是附会了产业部门之间的关联原理，倒是验证罗森斯坦-罗丹需求不可分的“大推进理论”。在这一环套一环的关联引进过程中，引进的初始目的往往被逐渐模糊了。当人们忙于安装B_3或B_4、B_6系列的机器时，谁又能记得起，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机器A的运转呢？当引进的众多职工嗷嗷待哺之际，谁又顾得上机器是否正常运转呢？“越输血越贫血”以及“外资”买“外货”的引进机制就在这种引进套引进的机制中实现了。落后地区居民对先进生产方式漠不关心的麻木反应，最终导致与机器们同处一室的配件、原材料、水泥、粮食、人物、以及桌椅板凳、锅碗瓢盆的全套引进。

落后地区的消极反应，使孤军深入的现代工业部门的发展步履艰难。

“由于社会功能不全，使企业处于孤立无援的

境地。企业为了维持正常生产，不得不代行社会职能，正常的经济职能受到社会职能的侵蚀，这也是企业经济效益下降的原因之一。据1981年统计，新疆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中各类服务人员多达4.5万人，占职工总数的11.2%，比全国平均比重高1.7%。其中有近2万人是企业办各类学校、医院、商店等社会性服务机构的人员，占职工总数5%。新疆不少企业是由内地支边职工和部队复员战士组成的。建厂初期，职工队伍年轻，无后顾之忧，生活设施欠帐很多。现在职工老了，子女大了，住房、教育、就业等一系列问题都出现了。大中型企业要办学校、医院、农场、电影院、商店等等，不仅要管职工，还要管家属就业，子女教育，不仅要管生产，还要管生活，管柴米油盐副食供应。仅以企业办教育为例，现在企业不仅要办托儿所，办职工技术教育学校，还要办普通小学、中学。乌鲁木齐附近的七一棉纺厂是新疆最大的棉纺厂，现有职工11,600人，共办了三所小学两所中学，在校学生就有6,000多名，还办了一所可收1,500名儿童的托儿所。仅学校和一所200个床位的医院两项，一年要花费150多万元。还有一个两三千人的企业，子弟学校的学生竟有两三千人，学校经费、教职员工工

资、住房均由企业负责。八一糖厂就在石河子市内，也要自办从小学到高中的普通学校，工厂想交都交不出去。有的工厂因所在地区市政设施缺乏，不得不为附近单位提供水电暖气，甚至还要为它们提供交通工具和子女就业机会。

“企业社会职能膨胀的结果必然导致经济职能萎缩，经济素质下降；另一方面，社会功能不健全，使得企业不能从水平渠道获得所需要的外部服务，不得不求助于垂直渠道的支持。企业越是苦于它的社会职能，就越是需要上级的援助，这就进一步抑制社会机体中横向联系的发育，形成个人依赖于企业，企业依赖于所属部门这种自上而下逐级控制和自下而上逐级依附的一个个互不相关的垂直系统，使本来就易封闭的地区经济内又出现一个个新的封闭系统，使已经建立起来的不同行业不能形成综合性生产能力，更增添了向外开放的难度。不仅如此，社会功能健全程度也是投资条件具备与否的标志之一。社会功能不全，必然会提高投资成本，降低投资效益，进一步阻止资金流入使深度开发难于进行。经济发展的任务不仅要开发直接生产项目，而且还要大力健全地方社会功能。传统战略正是因为忽视了这一点而吃了亏，眼光只集中在单项生产

性开发上，忽视了地区综合开发，急功近利，结果欲速则不达。不仅经济效益上不去而且由于社会功能不全拖了深度开发的后腿。”①

按常理，现代部门的输入，应当成为先进生产方式的生长点，应当具有使先进生产方式向广大落后地区逐步渗透的扩散效应。但是，正如不少发展中国家输入现代工业部门之后，迅速形成城乡尖锐对立的“二元结构”一样，从发达国家或发达地区搬进来的现代工业部门，由于其无论在组织系统上还是在产品结构上，均得不到落后地区社会需求和经济需求的积极响应，最后只能沦为自然经济基础上一个个自我封闭，靠外界“输血”来维持生命的沙漠绿洲。除交通运输困难外，最根本的约束，还是人的素质差。人的素质差，不仅仅表现在现代工业部门技术人员少、管理水平低因而经济效益差这一个层次。更为严重的是，生活在自然经济中的广大落后地区的居民，可以既不需要现代工业部门制造的产品，也不需要现代工业部门所携带的现代文明，照样得到生活上和精神上的满足。正是这个根本性约束，使大工业战略积累资金的可能，变成江

① 张晓光、卢迈：《新疆经济开发战略的探讨》，

河日下的巨额亏损；使现代经济产业部门的关联效应，演化成引进创造引进的恶性循环；使人们曾寄予厚望的“扩散效应”，迫于财政拮据、外援有限而爆发出一种与初衷相悖的“排外”本能，制造、强化如户籍管理、商品粮制度等种种一般居民无法逾越的壁垒，以防止广大落后地区居民染指中央财政补贴，维持“现代化”在落后区中孤岛式生存的虚弱生命。

6-3 超薄型平面垦殖

在我国落后地区，一般传统的农牧业占产业部门结构的比重，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表6—5 农牧业总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

1983年

地区	西藏	青海	宁夏	新疆	内蒙古	云南	贵州	广西	全国
农牧业总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	81	39	35	43	41	44	46	47	32

在以上几省、区几乎均为粮食调入省、区的情况下，农牧业的发展，不仅从产值比重上看不可忽视，而且还是社会安定的物质保证。长期以来，由于片面强调工业化，致使我国经济结构严重倾斜；落后地区“大工业战略”的推行，更付出巨大的代价。对“大工业战略”的批判，使“农牧业是基础”，再度成为落后地区经济发展战略的一般性口号。西藏、青海、新疆、内蒙等西部落后地区，随批判“以粮为纲”“左”的产业指导原则，把更多的希望寄托在畜牧业的发展上。于相当一部分居民温饱问题没有真正解决之际，这个以农牧为主的发展战略，更显出毋庸论证的现实必要性。

然而，只要稍加分析，即可以看出，在一个看得见的时期，要想使落后地区经济振兴建立在以农牧为主的发展战略基础上，却是很难的。

第一、运输约束

现有农畜产品价值含量低，难以超越运输障碍。内蒙锡盟因肉食冷藏加工能力不足，每年约有25万只牧畜外调只能靠活畜运，调往北京、天津（从张家口上火车）、海拉尔、乌兰浩特、集宁和赤峰等地再进行加工。平均上千里，掉膘损失极其严重，其他一些费用也很可观。以距海拉尔最近的

东乌旗为例，海拉尔接活羊的费用，由东乌旗旱路赶运费为1.70元/只，火车运费为6.00元/只，途中掉膘损耗为8～9斤/只，按8.5斤计算就是8.50元，合计为16.20元/只。牛的赶运费十倍于羊，掉膘损失也更多。① 新疆素以瓜果之乡在世界著称，其特产哈密瓜、葡萄等在国际市场深受欢迎。采用铁路运输到香港，在途时间最短也需要十一天，只得采摘半成熟的果实，而且运费成本相当高。哈密瓜在新疆当地的收购价为每公斤平均0.26元，运到深圳每公斤0.99元，增加了2.8倍。一头牛在当地的收购价平均为284元，运到深圳加上全部费用就成为503元，出口成本增加近一倍。这种遥远的长距离运输，使新疆的优势变成了劣势。②

第二、市场狭窄

我国是一个80%以上人口麇集在土地上的农业大国。目前农产品已相对过剩，边远落后地区的农畜产品，由于较高运输成本的压力，除牦牛等具有垄断因素的土特产品外，常规农畜产品，打入内地市场

① 李兵：《搞活畜产品流通，促进畜牧业发展——内蒙古畜产品流通问题调查报告》。

② 贾金思：《发展对苏贸易促进新疆经济发展——关于新疆对外开放战略重点考察》。

比较困难。目前，第二大牧场——新疆，为国家（内地市场）提供的肉食，已下降到全国第24位。全区1983年底棉花库存218万担，大约相当于两年的销量；食糖库存4.96万吨，相当于11个月的销量；毛线库存713吨，相当于19个月的销量；棉布库存6000万米，1984年预计积压1亿米，相当于将近一年的销量。① 内蒙古1983年仅用于精纺的细毛，就积压2千万斤。1984年估计农牧民至少要交售3800万斤。国家安排调出区外3100万斤。但截止7月份只调出1700万斤。80%的积压羊毛露天存放，任凭雨淋虫蚀。② 而在本地自给自足经济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这些谁都能生产的积压货，显然也难以大规模销出。

中国具有几千年历史的农业传统。在这个最传统的产业上，落后地区的经济要想振兴，超越运输约束和市场狭窄的障碍，除充分发挥某些资源垄断因素外，无异要求落后地区居民在传统产业的经营上，具有较内地一般水平更高的素质。这是落后地区在短期内无法作到的事情。运输约束和市场狭

① 张晓光、卢迈：《新疆经济开发战略的探讨》。

② 李兵：《搞活畜产品流通，促进畜牧业发展——内蒙畜产品流通问题调查报告》。

窄的障碍，直接影响的不是农牧业的生产，而是农牧产品的交换。后者，恰恰是落后地区居民最最缺乏的素质。即使投入先进的生产技术。增加了农牧产品的产量，也并不能直接带来落后地区居民交换行为的增加和商品经营素质的提高。西藏三十余年，产值增加4倍，商品率并没有什么提高。事实已经足够说明，交换行为的发生，取决于社会关系的演变，不由产品的总量所决定。产量的增减，可以导致一般意义上富裕程度的高低，并不直接意味经济关系的变革。将历史的进步，尤其是社会-经济关系的变化，万物归一地归结为产品数量的增加，以为只要有了剩余产品就能有交换，就会自然而然地发生生产关系变革，这种思想方法，已显得过于简单和陈旧了。面对落后地区自然经济长期停滞的事实，面对落后地区诸多“富裕的停滞”的事实，面对我国几千年以农牧为主而没有商品经济充分发展的历史，如果将商品经济发展当成一个能够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选择过程，选择传统农牧业为落后地区经济振兴的起点，很可能在运输约束和市场狭窄的障碍下，使原有的商品交换关系进一步萎缩，因而很难说是明智的。

几千年来，落后地区的产业方向，不用选择，

就一直是以农牧为主的。近年来，内地农村商品经济的繁荣，曾给人们造成一种错觉，似乎只要减轻大工业对农村积累的财政压力，提高农产品价格，重新强调农业是基础，就能带来农村经济的全面繁荣和振兴。上述认识忽略了内地农村经济好转的根本原因，即通过社会-经济关系的调整，责任制释放出的，是早已酝酿积聚许久的商品经营的巨大潜力。在人的素质尚未得到根本改观的落后地区，对于越发展亏损越大的大工业，假如停止其发展，起码财政补贴可以不再增加；假如取消其生存，亏损或许可以消除，财政收支或许可以平衡。提高农产品价格，通过休养生息，或许也能恢复某种和谐与平衡。但是，由于当地商品经营的冲动极弱，简单地改变大工业的片面发展，简单地“松绑”，简单地重提农牧为主，也完全有可能使我们从大工业巨额亏损的倾斜中，避坑落井地陷入内尔森的所谓“低度平衡陷井”，陷入一个缺少勃勃生机的古老的恶性循环。

农牧业，是落后地区贫困落后的渊薮。落后地区农牧业的生产方式，具有较我国平均水平更原始的社会内容。在人类生产与自然资源的关系上，现代生产方式，表现为对自然资源多层次的立体开发和

多次利用。前者表现为对自然资源的利用空间；后者表现为对自然资源利用的集约程度。人类生产方式的进化，一方面表现为利用空间的扩大，即越来越多地把过去不能利用的东西，由于开发技术手段的进步而变成宝贵的资源；一方面表现为利用集约程度的提高，即对同一种资源多方面的多次利用（当然，现实中二者是很难分开的）。譬如早期人类植物采集生产方式，不仅对自然资源的利用空间十分有限，利用集约程度也是简单一次性的。火的使用，使动物成为狩猎资源；同时骨制工具和装饰则是对猎物的多次利用。农业文明中，种植品种的逐步增加，表现为利用空间的扩大；深耕、施肥等技术的应用，则表现为对土地资源利用集约程度的提高。大工业文明开发了地层深处的矿产，锻炼出人们不曾见过的金属；生物工程提供了人工制造物种，以及工厂化生产动植物的可能。自然资源利用空间和集约程度显然是高度相关的。用这两个指标在时间维上度量不同生产方式的差距，则有越原始的生产方式，集约程度越低，利用空间越狭窄、越单薄的明显特征。

由此出发，相对“上天入地”的现代多层次立体开发的生产方式，在人口压力下以扩大耕地面积

（包括复种等）为主要特征的我国传统的种植业生产方式，被称之为“平面垦殖”生产方式。对自然资源利用空间和集约程度在性质上与我国传统生产方式一样在程度上比我国内地传统生产方式更原始的落后地区的农牧业生产方式，则是一种在更薄层次上横向推进的“超薄型平面垦殖”生产方式。青海、西藏、内蒙、新疆等西部地区的农牧民，不仅对资源的开发手段极原始，在传统农牧业领域里，其需求也是极单调且几乎没有层次的。以温饱的基础“吃”为例。同时是“平面垦殖”，广东居民早在大工业文明引进之前，就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游的，几乎无不成为饕餮之对象。资源利用空间的丰富，同时也造就了“桑基鱼塘”等使现代农业也频施青睐的多次层集约经营。西藏的农牧民，在大工业文明引进多年之后，至今不吃蔬菜，不养鸡鸭，不吃鱼。仅羊卓雍湖，就有2～3亿斤野生鱼储量，从来闲置不用。当地居民的日常生活，只靠青稞炒面（糌粑）和品种极单调的畜产品维持。一只羊杀后风干，刀刮啖之，即为佳肴。既不用煮，也不用烧，甚至连盐也不放。锅碗瓢盆、油盐酱醋的需求一概没有。西藏自然条件适宜种小麦，亩产往往是青稞的2倍以上。老百姓没有小麦的烹

饪设备，除炒面外，亦无其他烹饪技术，因而无法受用。即使行政命令大种小麦，曾使粮食生产大幅度上升，最后还是不得不退回来，重种青稞。在这种情况下，虽然落后地区往往“地广人稀”，人口密度远远低于内地水平，但资源利用层次过于单薄，集约化程度过低，由于“超薄型平面垦殖”生产方式，单位面积所能供养的人口大大低于内地水平。因而在解决温饱问题压力下形成的生态破坏的恶性循环，往往比内地农村更为突出。

西藏畜牧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60%左右，是基础的基础。目前人口压力已使牲畜头数急剧膨胀，草原超载过牧情况严重。据13个县调查统计，平均超载高达17%。多年过牧、抢牧和人为的破坏，致使草场严重退化，目前沙化面积已达利用草原面积的三分之一左右。在已利用的草原中，亩产草量250斤的优等草场仅剩下7%；亩产草量80斤左右的中等草场占40%左右；亩产草量仅20斤左右者高达53%。平均34亩草场才能养活一绵羊单位的牲畜。

青海亦是如此。解放初，平均每只羊占有草场32亩，目前已下降到12亩，放牧集中的青海湖地区只有10亩左右，部分县、社不足10亩。过牧使草原

严重退化。全省沙漠面积已由8955万亩增至11850万亩，扩大了32%。解放初期青海主体草场型草场草平均高度为20厘米左右，总盖度为75～90%，目前只有10厘米以至更低，总盖度也大幅度下降，产草量据估计约下降了50%。畜草矛盾尖锐，使青海整个畜群处于半饥饿状态，不但死亡率高，而且已成活的牲畜产量与质量都在大幅度下降。解放初期，羊胴体重平均在20公斤以上，目前平均只有16公斤。仅此一项，全省平均每年牲畜损失10亿斤肉。草场退化，牲畜死亡日趋严重。近十多年来，每年春乏死亡的牲畜平均达100万头以上，占牲畜总数的5%，仔畜损失高达200万头。①

广袤千里的新疆大草原上，1965～1983年牧业人口翻了一番。每只羊的平均出肉量由1966年的19.5公斤，下降到1983年的13公斤。全区荒漠草场竟占65%，缺水草场占27%，打草场仅余2%。草原严重超载，每年平均有700万头标准畜冬春草场没着落，有近200多万头牲畜死于饥寒，相当于每年交售国家的牲畜总量。成畜死亡率一般年景在10%左右，最高达到16.4%。新疆每年死亡牲畜占全

① 曹远征：《青海省草原畜牧业经济发展问题的调查与思考》。

国牲畜的二分之一。解放以来，全区共死耗牲畜6737.34万头，超过同期提供商品畜的34.7%。畜牧业如此发达的结果，竟使全国第二大牧区1982年人均占有肉量21.5斤，仅为当年全国平均水平的80%。①

内蒙古的情况大致相同。全区水土流失面积已达2亿8千万亩，占全区总土地面积的15.7%。有水土流失的旗、县53个，其中原黄河中游的重点水土流失旗、县8个，水土流失面积3150万亩，每年向黄河输入泥沙达1.8亿吨。在全区8000万亩耕地中，水土流失、风蚀严重的面积达1600万亩；急需改良的碱盐地达1000多万亩。全区沙漠戈壁面积为6亿亩，占全区土地总面积的34%。其中近半个世纪以来，沙漠化的土地面积扩展了1.5亿亩，每年以500万亩的速度向前发展。在全区88个旗、县中有67个旗、县受风沙危害。由于草原沙化、退化、使单位面积产量降低。据测算，十年来全区草原产草量由东到西，下降了40～60%。②在这种情况

① 吉小明：《新疆畜牧经济考察》。

② 阿兴嘎：《三中全会以来内蒙古自治区经济发展的形势及今后经济建设的几点建议》，《民族经济学研究》，第二集，宁夏人民出版社，89页

下，1983年全区牲畜超载已达三分之一以上。1958～1979年，全区共死亡牲畜5870万头，比同期国家收购总额还多640万头。

西部畜牧业的颓势和贵州、云南等地继续毁林开荒的事实说明，“低度平衡陷井”，并非是一个简单的静态停滞状态，而是一个破坏生态、强化贫穷落后的动态恶性循环。在这个循环中，不仅已有商品交换关系有可能进一步萎缩，使整个经济进一步向自然经济的封闭凝固状态遁去，而且人与自然的关系也日趋紧张，造成进一步的生态恶化和对自然资源的破坏。它将从主、客观两方面，进一步约束人们摆脱恶性循环，跳出“超薄型平面垦殖”生产方式，实施高层次立体开发的种种努力。农牧业为主的发展战略，弄得不好，等于是对落后地区开发已有的物质潜力和人的素质潜力的负投资。

6-4 信息与产业

回顾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无论是大工业战略，还是以农牧业为主，都不能实现制定产业方向

的两个基本目标：第一，较快地实现资金积累；第二，较好地促进其他产业相应地发展。

表6—6　工业、农业发展战略的比较

产业方向	积累资金	关联效应
大工业战略	巨额亏损	引进创造引进的恶性循环
以农牧业为主	低度平衡	生态破坏的恶性循环

从促进其他产业相关发展的第二个目标来看，大工业战略不仅将现代工业部门的内部关联悲剧式地演变成引进创造引进的恶性循环，同时也并不能通过现代工业部门的发展，遏止农村居民继续破坏生态的恶性循环。从积累资金的第一个目标的财务指标看，农牧为主的低度平衡，除去逢灾罹祸时的救济，没有大工业战略酿成的经常性巨额亏损，但因为与货币、交换没缘分，想实现滚动式的资金积累，也还是没有指望。

面对两个目标和两个特殊约束，落后地区主导产业部门的选择，实际上是要求某种“非传统性投入”，既有积累资金和推动其他产业发展的功能，又能最大限度地改变人的素质和克服交通运输的困

难。大工业战略和以农牧为主的发展战略，单就自然资源的有利条件论，都不失为符合实际的可行方案。但由于不能同时满足以上四个要求，结果均屯兵于坚城之下，久攻不克，欲进无路，欲罢不能。

是否只有等待巨额投入，发展科教文卫，修路买车，提高人的素质和改善运输条件之后，才谈得上落后地区的产业发展呢？“基础结构先行？”一节，已经否定了这个思路。出路何在？只有别出机杼，另辟蹊径。

生活方式的改变

改变人的素质，从改变居民生活方式，而不是生产方式入手，这是我们对落后地区产业方向选择问题的一个基本认识。

英国学者H·迈因特教授，曾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一书中，阐述了一个重要的思想：自然经济状态下的农民，只有充分利用了“市场机会”，使自给自足的生产全部或大部分转化为交换而从事的生产之后，才有可能真正充分利用“技术机会”，来提高劳动生产率。几十年来，我们为向落

后地区输入先进的生产技术尽了最大的努力，这也是“输血”的主要内容；同时令人惊奇的，正是落后地区居民对“天上掉下来的”先进技术之毫不吝惜、掉以轻心。结论：落后地区缺少的，首先还不是先进的生产技术，首先缺少的是等价交换的商品关系。只有商品交换关系在社会生活中广泛渗透，才有生产过程中的成本核算，才有斤斤计较导致的技术需求。这已是前文交代过的事情。

同样是前文交代过的事情：产量的提高，剩余产品的增加，是交换的物质前提，但还遥遥不是交换本身。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以后，强制性统购派购取消之后，落后地区普遍出现的“惜售”现象，俯拾皆是的富裕的自给自足典型事例，都说明交换不是产品剩余的函数。

一个社会性的交换冲动，归根结底来源于居民提高生活水平的预期。我们提出人的素质差的直接表现，就在于落后地区居民由于眼界的局限，其消费或生活水平的预期非常之低，因而缺乏为提高自己生活水平从事和更新经济活动的动力。在落后地区，有两条同时并存的生产可能性曲线：

Z线代表对生产要素按自然经济组合规则 实现的曲线；W线代表对生产要素按商品经济组合规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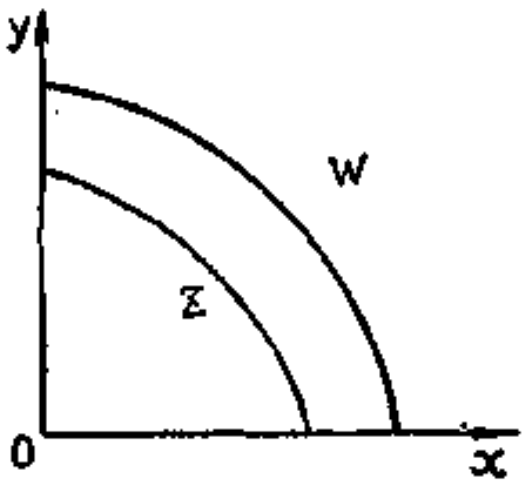

图6—3　落后地区同时并存的生产可能性曲线

实现的曲线。Z曲线是现实的存在，W线是发达地区的现实存在和落后地区理论上的存在。落后地区将Z线右移，并非没有摩擦，它必须从万事不求人的安谧生活中，转入通过商品交换，采用新的技术，万事必求人且风云莫测的忙碌之中。这时，文化技术水平、运输约束等均只是实现Z线右移的客观障碍，并不构成Z线右移的主观动力。动力来源于居民对目前生活方式的不满和追求新生活方式的欲望。这种欲望强度越高，传统生产方式不能满足生活水平预期的矛盾就越大，甘冒风险以踏入商品经济的可能性就越大。试想，在西藏居民不吃鸡鸭（当然就不养鸡鸭），不食鱼鳖（当然就不养鱼鳖），甚至连油盐酱醋都不要的情况下，又让他怎么交换，交换什么呢？

在人类整个历史上，供给创造需求，需求创造供给，是个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但在人类历史中的局部历史进程中，落后地区两条共存的生产可能性曲线，都是真实的。这时，真实的Z 线向同样真实的W线右移的动力，就只能求助于人类从事经济活动的本源目的来解释。在这一时点上，需要输入的首先还不是提高产品总量的技术，更主要的是输入焕发这一动力的生活方式的信息。——这是落后地区选择产业方向时应当给予优先考虑的。大工业战略也好，以农牧为主也好，更多的主要是从生产方向上考虑问题，因而，不仅在经营管理等一般意义上受阻于人的素质差，而且在根本上缺乏使先进技术与落后地区居民改变生活方式联系起来的动力。在落后地区居民一心向往自给自足地拥有上百头永不出售的牲畜，或者一年消耗几百斤酥油的富足时，显然是不会对那些为交换而设计的生产技术格外垂青的。**因此，改变生活方式，是改变生产方式的先决条件。**

超越运输约束

运输的功能是交换；没有运输就没有交换。落

后地区运输困难的约束，意味着对商品交换总量和频率的严重束缚；意味着任何产业的发展，都将承担一笔较发达省份高昂许多的“交换税”，使起点本来就差距极大的落后地区的产业发展，一上来就处于不平等竞争的地位。但是，这并不等于就对任何产业的发展判了死刑。因为它并不是问题的全部，实际一点的问题是：运什么？

高昂的运输成本在拉砖头。贵州省每年要“进口”粘土砖1.6亿块左右，仅铁路运输就要用去8000个车皮。高昂的运输成本在运废土。贵州省磷矿石出口，尽管P_2O_5品位高达30%，但仍意味着70%的无效劳动。不说直接出口制成品，只要精选后品位达到50%，现磷矿年外运能力即可由180万吨提高到300万吨，在不增加运力的情况下，外运能力可提高67%，同时降低单位磷矿的运输成本。如果经济体制改革能最大限度地杜绝西藏那种盲目进货和大量滞销货毫无目的地调来调去，那么，产业方向的正确选择，就应该能够最大限度地克服交通运输困难的约束。

从控制理论来说，通过交通运输实现的任何交换活动，都意味着三种内容不同的“流”的实

现①。第一是“物质流”即货运周转量的统计指标“吨·公里”。若干吨的货物通过若干公里，由甲地“流”到乙地。这个“流”的价值表现，就是运输成本。显然，不管什么货物，运得越远，运输成本越高。第二是“价值流”，即通过“吨·公里”的运输，随“物质流”而从甲地转移到乙地的价值。请注意，这种区分方法，有意将运输成本与商品价值区别对待。第三是“信息流”，象“信息”一样，这是个很难定义的说法。为了说明以下想说明的问题，暂且将其定义为通过物质、价值由甲地到乙地的“流”，所实现的信息传递。所谓“实现的信息传递”，和人们的常识一样，指的是由不知道、不清楚或不确定，到知道、清楚或确定。

所有问题的关键在于，交通运输对商品交换的约束，只是在平均意义上；而不同的商品相对相同的运输条件，都具有物质含量、价值含量和信息含量的不同结构。由于一次通过运输的交换活动，是同一事物的同一过程，所以以上三个不同的“含量”关系，也只有用它们三者之间的相对关系来说明。即：同一重量的货物，可以含有不同的价值量和信

① 参见白南生：《试从信息流角度考察分配的形式》。

息量；而同样单位的价值量或信息量，也可以通过不同重量的货物来实现。从财务指标说，只有货物所包含的价值量大于运输成本，才算是绝对值意义上的“没白运”。从获得信息量的目的出发，则意味着在相同运输成本和实现相同价值的条件下，实现的信息传递越多、越丰富就越合算。举例说明：同样的运距，运来一车粮食，所实现的价值往往还不够偿付运输成本；至于信息含量，恐怕很难有人能品尝出同一品种的内地粮（包括外国进口粮）与当地粮在滋味上有何不同。运一车钻石来，运输成本在实现的总价值中几乎趋近于零；由于外地钻石与当地钻石，除了个头大小不一样外，其所实现的信息传递，并不比运输粮食多很多。运一车彩色电视机来，实现的价值虽较钻石少得多，但由于运进一个信息源，其所能实现的信息传递，是粮食、钻石所不能望其项背的。

不仅如此。从社会消费需求的物质量来说，往往越是价值含量低、信息含量低的商品，消费寿命（即一次性消费与多次性消费。次数越少，寿命越短。）越短，社会需求的物质量越大，同时对交通运输条件在量上的要求也越大。比方说为了运粮食，不少落后地区都动用了几千公里公路、成千上

万辆汽车（即“吨·公里”），仍嫌运力不足以满足社会需求。如果是为了运进同样价值量的钻石呢？恐怕这些路，这些车都成了多余无用之物，找个人放在裤兜里就带来了。

由此可见，交通运输落后，对商品交换的约束，只是在物质流层次上。“交换税”的课征对象，只是物质流量。在价值流、信息流层次上，正确的产业方向选择，完全有可能相对超越运输条件约束。西藏50%以上的进藏运力，在运输购销倒挂且毫无信息的粮食，另外大部分运力，则忙于“进口”砖瓦灰石一类的基建物资。运输的产品结构层次太低，既是运力紧张的原因，同时也是不能提高运价、交通运输无法发展的原因。其逻辑关系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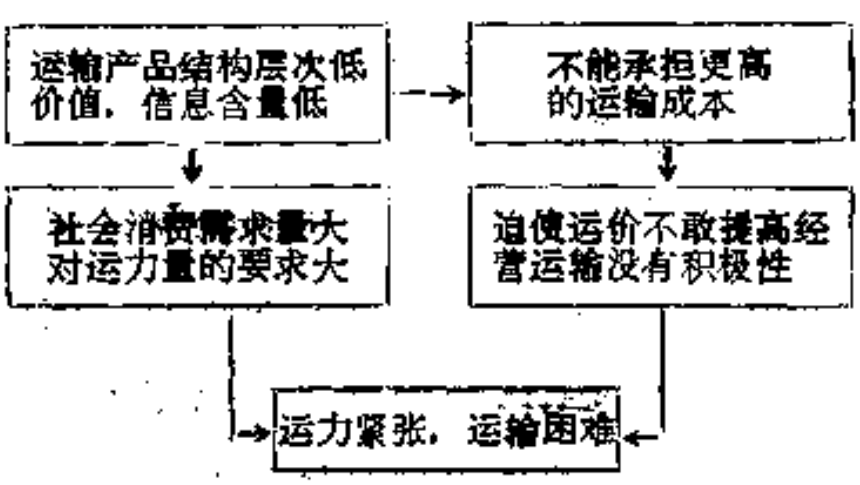

图6—4　运输结构层次过低的结果

解决落后地区的交通运力紧张，除了修路买

车，以及调动营运企业的积极性，多拉快跑，一个被长久忽略的出路，就是提高运输产品结构的层次，发展价值含量高和信息含量高的产业。值得注意的是，边远落后地区与内地的交换，一般产品价值含量的高低，往往与其信息含量的多少联系在一起。内地已经具有的同类产品，落后地区尾随生产之后，即使产品花色规格品种质量都达到内地已有水平，只要加上一个高昂的运输成本，竞争能力顿刻荡然无存。相反，具有民族、地方特色的手工艺品，有时虽然花色的品种规格质量都不如内地同类产品，但因为具有内地产品所不具有的特殊信息，照样能实现较高的价值。“出口”是如此，“进口”也是如此。无数传奇式的奸商坑骗边民的故事都说明，在当地居民所能接受的范围内，越是当地没有的，越能卖好价钱。因此，落后地区产业方向的选择，应着重那些产品特性明显与内地不同的信息含量大的产业部门。

优先发展信息含量大的产业，可以克服落后地区产业发展的两个严峻约束。它可以用较高的信息含量实现的价值，超越运输成本的约束；它可以用较高的信息含量，冲击传统的生活方式，逐步改变

人的素质，引发生产方式的变革和相关产业的发展。旅游，就是突出的一例。

落后地区的旅游资源，极为丰富。充满传奇色彩的天山和内蒙古大草原，青海的青海湖、塔尔寺，云南的西双版纳、温泉，贵州的大瀑布、溶洞，广西的桂林山水等，都是举世闻名的旅游胜地。最穷的西藏，也是最富旅游资源的地方。西藏位于世界之巅，素有神秘之地的美誉，自然景色瑰丽缤纷，雪山森林气象万千，名胜古迹比比皆是，文化艺术独特悠久，风土人情与众不同。这一切，吸引着国内外旅游者不畏艰辛，纷至沓来，趋之若鹜。

旅游消费，是典型的信息消费。旅游价格，既取决于服务和服务设施的投入成本，更为旅游地点所能提供的信息量所决定。在毫无特色的地方，盖再好的饭店也不会赚钱。相反，在居住、交通、饮食以及服务水平远逊于内地发达省份的情况下，丰富的“旅游信息”，居然能使西藏的旅游价格（元/人·次）在飞机票价高一倍的同时比全国平均水平高一倍，仍然供不应求。1980～1983年，西藏接待外国登山、旅游者6300人，不计体育部门、交通部门收入，仅旅游系统收入外汇合人民币833万元，盈利532万元。在全区其他产业大部分只赔不赚的

情况下，旅游业直接盈利率竟高达64%，平均每个职工每年创汇3万元人民币。在其他产业部门经济效益大多为全国倒数第一的同时，唯独旅游业一枝独秀，名列全国正数第一。

落后地区旅游业的发展潜力极大。1983年，全国接待的外国旅游者仅占世界国际旅游人次的3%，西藏只占全国的1.8%。与此同时，面积只相当于西藏的11.4%的尼泊尔，自然景观、名胜古迹、风土人情均远逊于西藏，其接待的旅游者为西藏的114倍，得到的旅游收人为西藏的27倍。造成这种格局的原因，决非西藏的旅游较尼泊尔缺乏吸引力，相反，受接待能力限制，大部分愿出高价消费西藏“旅游信息”者被拒之门外。西藏旅游相当长期处于“卖方市场”地位，是不成问题的。根据西藏旅游部门1984～2000年的设想，达到尼泊尔接待人次的水平，按最低的算法计算，也可累计收人21亿元。即使按1983年旅游业全国平均51%的盈利率计，也可得纯收益11亿元。此期间所需增加的6000个床位，不说将原有赔钱的招待所动员出来，全按投资新建计，也仅需累计投资3～4亿元。旅游业自身，完全可以作到钱滚钱。除初期外，无需额外投资。如果实施毅然决然的产业结构调整，如果

将亏损招待所以及民间社会用房动员起来，如果将运粮、运砖瓦以及运废土的“吨·公里”用来运人，如果在“储蓄剩余”条件下，通过集资使社会资金集聚、运转。旅游业的经济效益就有可能进一步提高，这个钱滚钱的资金积累过程就有可能进一步加快。

人，是信息之源，也是信息含量最大的“吨·公里”。运来的人，不仅为原来没有价值的“旅游信息”付钱，而且还无偿地为落后地区居民带来大量新的信息。旅游者的起居饮食、衣着服饰、待人接物、仪表风度等，都有可能成为当地居民好奇、欣羡和模仿的对象。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美占领军在日本曾极大地改变了日本国民的生活习惯和消费习惯，被誉为“口香糖效应”。这种“示范效应”，具有重大意义。通过模仿和学习，落后地区居民消费需求的层次将逐渐丰富，从而使为交换而生产，以及由此而来的生产方式的变革，成为可能。发达地区旅游者携带的现代文明信息所能发挥的作用，类似于通过大工业战略移入的发达地区居民，能够对落后地区居民生活方式、消费习惯和价值观念的转变，发生巨大的推动作用。区别是前者在无偿提供信息传播的同时为落后地区的经济发

展提供巨额资金积累，后者是以落后地区财政的巨额亏损为代价的。

大批旅游者进入落后地区，不仅能携带大量现代文明信息，发生“示范效应”，而且还对落后地区饮食服务业、民族手工业等第三产业直接产生新的需求。西藏的外国旅游者，不仅乐于一般的乘车流览，而且热衷于骑马、乘牛皮船、乘马车、狩猎、穿藏装，享受藏式烹调，欣赏藏式文化歌舞等。同时，各种各样具有民族特色的商品，如藏装、藏靴、藏帽、围裙、卡垫（传统毛织物）、木碗、火链、藏式洋娃娃以及佛像、佛塔、唐卡（一种佛教条幅）等纪念品，都深受旅游者欢迎。西藏旅游部门的同志在和我们的座谈中，曾多次提到国外旅游者大量兑换人民币以购买当地并不十分值钱的旅游纪念品。不仅如此，大批旅游者的到来，还会直接带动落后地区极为稀薄和缺少的一般需求。如西藏居民不消费也不生产的蔬菜、水果、鸡、鸭、鱼和相应的食品加工，以及住房等相应服务设施和服务水平。因此，通过旅游业，带动第三产业的发展，并以此逐级扩散，诱发产业间的关联效应，是有可能的。

旅游业作为信息含量高的产业典型，既能超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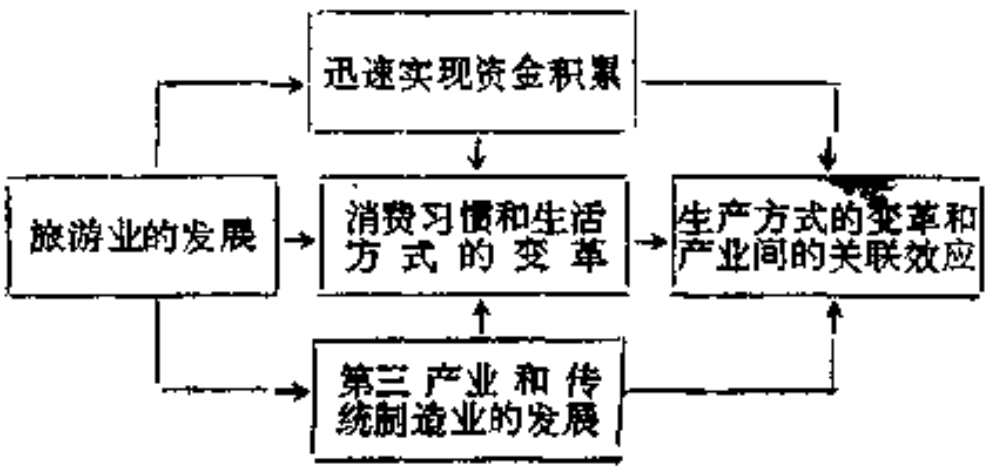

图6—5　旅游业的功能

运输困难约束，最迅速地积累资金；同时又能最大限度地改变人的素质，发生逐级扩散的产业关联效应，不失为落后地区产业方向的有利选择之一。

表6—7　　三种产业的比较

	大工业	农牧业	旅游业
1.积累资金	小	中	大
2.关联效应	中	小	大
3.人的素质约束	大	中	小
4.交通困难约束	中	大	小
物质含量	中	大	小
价值含量	中	小	大
信息含量	中	小	大

结论一：

落后地区的经济振兴，表现为一系列经济指标

的赶超。赶超的实现，不取决于这些指标本身，而取决于实现这些指标的手段。人的素质上的赶超，具有根本意义。生活方式的改变，是改变生产方式的先决条件。

结论二：

信息交换，具有超越时空的特性。无论从超越运输约束的角度出发，还是从改变落后地区居民生活方式的角度着眼，最大限度的信息交换，都是落后地区经济振兴的基本条件。

结论三：

落后地区运输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调整方向，应是产业结构的高度化。产业结构高度化的基本标志，是信息含量的大小。优先发展信息含量大的产业，通过超越时空的信息，改变人的素质和超越运输约束，实现资金积累和发挥产业间的关联效应，应是落后地区产业方向选择的基本原则。

第七章

没有结束的结束

本小册子写作的困难，在于它不是一个逻辑上完整的封闭系统。思考略多一些的内容说过之后，仍有一些想说又说不圆囫的东西如骨鲠在喉。忍不住作一提示性说明，供读者参考。

7-1 强化政府职能

改革“大锅饭”的经济管理体制，决不意味着瓦解政府对经济的领导；削弱行政指令性式的经营，决不意味着削弱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干预能力。相反，根据前述“双向积极性”的分析，在人的素质较差的落后地区，越是要加快经济发展，赶超先进，就越是不能简单地“松绑”了事，把改革理解

成撒手不管，放任自流。用这种理解对待这场变革，特别是对待落后地区的改革和发展，是十分危险的。

在原有“大一统”的经济管理体制中，没有不同的利益，没有不同利益的代表或集团，不同素质的人群，行为方向都是一致的——唯计划经济的马首是瞻。因为谁也没有更现实的利益刺激，本事再多，学问再大，也是叫干啥就干啥。这时，政府的意志，就是整个经济系统的意志；组织政企不分的功能，就是整个经济系统的功能。一旦“松绑”之后，以多劳多得为经济刺激手段之后，不同经营主体的素质差别，就必然通过他们对“劳”和“得”的不同理解，通过不同的致富的不同手段表现出来。最突出的是落后地区与发达地区“松绑”之后，焕发出的发展自然经济与发展商品经济的两种方向不同的冲动。在发达地区，由于经营主体已经具有商品经营的眼光和素质，对经营者切身经济利益的承认，本身就意味着对商品经济发展的肯定。这时，不用花过多的力气，长期被“大锅饭”体制压抑的经营主体，即能在“放活”的空间里，迅速开展生产要素按商品经营规则的重新组合，并在价格、商业、运输、金融以及干部人事制度、劳动人事制

度、户籍管理制度等经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通过自发的自组织行为，与尚未革新的政府职能发生全面的、越来越深刻的冲突。这时“上层建筑”的体制改革，政府职能结构的改革与调整，主要表现为原有组织系统，根据商品经济发展形势提出的要求，不断调整自身的行为，以适应商品经济发展。从这点意义上说，连续不断地“松绑”，以及“撞击反射式”的思想方法，有它生长的客观基础。但是，落后地区的“松绑”，在只具有自然经济经营素质的“被绑”对象眼里，则意味着使生产者的积极性与通过自然经济生产方式得到的经济利益联系起来；“多劳多得”，等于对破坏生态的劳之所得的肯定。对只会按照自然经济经营规则重新组合生产要素的落后地区居民而言，“放活”的商品经营空间并不存在。因而，这些地区“松绑”之后，经营主体缺乏我们所希望的活力，与原有政府经济管理职能系统的关系，不仅不会象发达地区一样发生激烈的全面冲突，反而向“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原始状况遁去。“放活”的经济系统，与“上层建筑”的关系，非但没有密切，反而有某种越发疏远的倾向。即使是城市国营系统改革之后，如果没有政府组织系统的积极反应，这种倾

向仍有可能不同程度地发生。简单地说，对发达地区的改革，政府组织系统要作的，就是不断适应商品经济自组织发展提出的要求。不管是主动适应，被动适应，其历史发展的动力，来源于社会积聚的商品经济冲动。落后地区，突破时的难度虽然要比发达地区容易得多，但是，由于缺少自发的商品经济动力，要真正达到经济振兴的目标，都要比发达地区复杂得多。说落后地区发展商品经济的潜力在城市国营系统，只是将落后地区当成独立的社会-经济系统时，在相对意义上成立的。以文化水平为例，西藏江孜县“机构密集型”的“上层建筑”几乎集中了全县的智能人口，城市居民全民受教育水平为农村居民的若干倍，因此，要想社会规模地调整出一个商品交换关系，非把注意力由农村转到城市，转到城市国营系统的体制改革上来不可。但是，如果从全国角度看，江孜县城镇人口的文化水平，不仅不能与发达省份比，就是离全国平均水平，也仍然差距甚远。在这种情况下，即便是落后地区城市国营系统体制改革完成之后，也无法保证落后地区城市居民手中所掌握的具有按商品经济经营原则“重新组合”可能性的生产要素，能够得到在一般商品经营条件下所应得到的最佳组合，甚至不能保证不会得

到“最劣组合”，以至干脆“不组合”（弃之不用）或“负组合”（破坏性组合）。想起西藏林芝毛纺厂混乱的经营管理，谁能保证改革实现之后，它不会关门停厂，使纺织业再度回复到手工操作的发展水平上去呢？

从绝对值上说，改革，特别是城市国营系统的改革，必将大大区别于农村责任制的简单“放活”，极大地调动落后地区所有发展商品经济的潜能，因而肯定能从根本上启动落后地区经济发展的活力，对改变落后地区的落后面貌，是非走不可，同时也是极为关键的一步。落后地区的改革率先突破，可以使经济发展速度有一个较大的增长，同时也可以使落后地区的改革经验，成为其他省区改革的借鉴。但是，不能忘记，发达地区乃至全国城市国营系统的改革事业，都在日新月异地迅猛推进。可以肯定，前文对“大锅饭”体制以及商品经济发展潜在主要力量的分析，对内地发达省份也是适用的。如果其他发达省份乃至全国的城市国营系统改革也相继成功，发达地区被压抑在城市国营系统中更为巨大的商品经济潜力被极大调动，落后地区的落后，以及其与发达省份的相对差距又会呈现出什么图景呢？几年来的经历提醒我们：农村责任制的改

革，就是首先从落后地区开始的。

越是落后地区，越不能把经济振兴的希望，寄托于商品经济自发地、自然而然地形成，越需要一个明智的效率极高的政府，有意识、有组织地引导整个地区经济，向商品经济轨道转化。政府功能的研究，政府机构的改革，政府管理、诱发商品经济的职能强化，是解决落后地区商品经济动力不足的关键，同时也是本书不及涉及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大问题。

7-2 人才开发与引进

对于人的素质水平低下的落后地区来说，人才的开发与引进，至为重要。然而，广大落后地区面临的，却是严重的人才外流。又是一个“马太效应”：越缺人才，越留不住人才；越缺人才，越进不来人才。

落后地区的人才外流体现在两方面：机械性外流与智力外流。机械性外流即人才自身向外地区的流动，这已经是众所周知，无需再列举数字。不太为人所知的是无形的智力外流。由于落后地区的落

后，其在科学、技术、文化、教育等诸方面的研究与工作内容难以成为全国的主导性内容或度量水平高低的标准。由于发达地区的发达，其在上述方面的研究与工作内容自然而然成为众目所向的主导性内容，并成为世所公认的度量标准。谁不愿意攀登本领域的高峰？谁愿意放着标志高水平的课题不去搞，去搞那些被认作是二、三流的题目？这样的人是有的，但居少数。这样，即使是由于种种原因（如行政手段）未离开落后地区的人才，其所关心的问题和领域，所研究的课题和方向，所作出的成果和贡献，也往往不是针对落后地区所需，而是为发达地区服务，为发达地区所利用的。就连公布成果的场所或刊物，也往往在发达地区，更具有权威性嘛。这就是智力外流。虽然人才的血肉之躯还在落后地区，其智力却流向了发达地区，为发达地区的更加发达贡献才智。

留不住人才与招不来人才，是同一个问题。在落后地区工作和生活，无疑比发达地区艰苦和不便。经济生活条件差，社会生活则困难更多，如两地分居问题、子女教育问题、老有所归问题……等等。最令人扫兴的是工作条件以及个人发展的可能性。抛开信息阻塞和文化生活匮乏不说，仅就专

业技术条件而言，在落后地区工作数年，也往往使专业人员的水平落后一截。

显然，在落后地区生活，尤其是由发达地区到落后地区生活的人，付出了更高的代价。投入高，预期收益就高。因此，若欲使人们愿意在条件差的落后地区生活，就要使落后地区有更多的机会，尤其是提高个人收入和满足个人社会需求的机会。人的需求是多方面的，经济需求是一方面，此外，还有提高社会地位、追求理想和事业、发挥能力或满足兴趣等非经济需求。这两类需求都是很重要的。从某种意义上讲，后者在人的心目中甚至更加重要一些，这已为我们的调查所证实。如果满足人们经济和非经济需求的机会能增加，那么人们就会情愿作出更多的个人投入和代价。然而，由于落后地区与发达地区一样存在一个有待改革的大锅饭体制，而生产与生活的社会化、商品化程度又低于发达地区，分工分业与社会分化不发达，再加上工作条件较差，其提高个人收入和满足个人社会需求的机会不仅不比发达地区多，甚至还有可能少一些。也就是说，在落后地区工作与生活，要付出较多的代价，却不会相应提高满足各类需求的所得，甚至还会丧失一些机会。这样的事，会有很多人去干吗？

因此，要引进新的人才，稳住现有人才，减少智力外流，关键在于落后地区能否为人才创造和增加上述机会。这就需要改革，尤其是在就业制度、劳动人事制度、工资制度、财务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等方面的改革。前面曾指出，落后地区由于社会-经济结构较为松散，具有一定的改革优势。正可以利用这一点，迈出较发达地区更大的改革步伐，促进人力市场的形成，发展民间的流动，加强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市场性因素，从而增加人们提高收入和社会地位的机会。

7-3 平地建新城

城市化，是落后地区发展的另一个重要问题。这个问题难就难在，与中国面临的大多数问题一样，它是集发展与改革于一身的。单就发展而言，城市化问题还较为单纯；而揉进改革的因素之后，便复杂了许多。起码，这使我们面临着一个选择：从哪里入手呢？是将重点放在已有城市的发展与改革上，还是来一个石破天惊的平地建新城？

我们更倾向于后者。改革的最终预期，是形成

有利于长期发展和现代化的社会-经济结构，这就意味着人与人及社会组织之间关系和利益的全面调整。且不谈已有城市的发展在环境、生态和公用设施建设方面遭遇到的自然约束，单就人际关系、利益分配及组织和机构的现状而言，已足以令人头痛。在大锅饭体制的庇荫下，城市居民的既得利益多于农民。在享受国家巨额补贴，“外资”买“外货”的落后地区，这个差距更为明显。与农村相比，城市的利益集团数量多，复杂性高，变异度小。落后地区由于历史、政治等方面的原因，这一点有过之而无不及。尤其是大锅饭体制下的利益分配制度，与“自然人”的需求和适应性一拍即合，致使落后地区的利益分配格局刚性更大。在商品生产的强大冲击面前，这些差距或许算不了什么。可惜，落后地区缺的恰恰就是这种动力。

因此，落后地区一方面社会整合度低，为改革提供了可乘之隙；另一方面其商品生产冲动不足以改变现有城市的利益关系现状，城市改革步履维艰。避其精锐，击其侧翼，素为兵家所乐道。我们设想：何不划地为牢，平地建新城，搞它一个“改革特区”？深圳特区的蛇口工业区，是平地建新城的典型。它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在这个“新城市”

中，社会-经济系统正在出现崭新的结构（虽然还未臻佳境），从组织、制度到人。蛇口实质上是一个出口加工区（至目前为止），吸收的是国外资金、技术、人才。落后地区的“新城市”，应搞成“改革试点区”，吸收发达地区的资金、技术、人才，当然也不排斥国外。在“新城市”的开发上，更多地采用市场方式，由政府组织城市开发公司，组织基础设施建设，制订长远发展规划，招标外包，卖地皮，卖户口。对于来“新城市”从事开发和经营的法人，给以特殊政策（尤其是劳动人事、财务管理方面的），使“新城市”具有吸引力，拥有众多的机会向发达地区的人才、资金招手。打破所有制界限及干部、工人之类的身分界限，任何人（包括农民）都可以成为“新城市”的居民，做他可以做的工作，只要他符合要求。本着效率原则，协调企业、政府、居民三者间的关系；摸索新的企业制度；确定政府的功能，形成政府的间接控制手段；面对企业破产与职工失业，建立新的社会福利与社会保障制度；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并行，寻找既有效率又有民主的社会管理方式，等等。我们认为，平地建新城，无论是在促进本地区城市改革以至全面改革方面，还是在吸引人才、资金，促进本地区

发展方面，都能取得较改造原有城市更为显著的效果，操作难度也低得多。

落后地区社会整合度低，地广人稀城市少，闲置资源比比皆是，这都是平地建新城的有利之处。然而我们提出这一设想，却不想把它仅仅限制在落后地区。对于也存在着城市改革及城市布局调整问题的发达地区来说，它也是适用的。

“新城市”，意味着全新的社会-经济系统。我们之所以怀着极大的兴趣提出这一极为粗略的想法，目的在于扩大选择的范围，并非否定现有城市已经在进行的改革与发展试验——它也是选择之一。

7-4 民族与宗教

民族、宗教问题，是边远落后地区普遍存在的又一重大问题。从社会经济发展的角度，而不是从单纯控制、防范的角度，重新认识民族、宗教问题，对落后地区的经济振兴，同样至关重要。

民族地区的发展，最根本的还是要靠本民族的进取性和奋发精神。民族自强心理是振兴民族地区

的动力，不是包袱或障碍。在落后地区，目前具有一定文化知识，较易接受新的生产、生活方式，商品生产潜在素质较好的知识分子阶层、干部阶层和青年职工，往往正是民族意识最为强烈的人群。他们比较见多识广，对于由民族落后而导致的事实上的“不平等”深有感触，由此焕发出强烈的民族奋发精神。他们不仅改革意识强烈，而且集传统与变革的因素于一身，是发展与现代化不可或缺的人才。这些社会精英是经济振兴的主力，压制、打击民族意识，恰恰是压制、打击了他们的民族自强心理和积极性。

发挥民族自强心理和民族精英的健康向上作用，关键在于如何对待少数民族固有的传统文化。在民族意识中占首要地位的，是保持、发展本民族固有文化，并以此来取得与其他民族尤其是汉族实际平等地位的欲望。这是民族问题的内层。资金物资的扶助、民族干部的比例等，是民族问题的表层。分清表里，不要舍本求末。光靠花钱买不来民族团结。轻视、歧视少数民族文化，严重伤害民族感情，再多给钱、给职也没用。下一些力气抢救、继承、宏扬少数民族文化，便有了战略主动权，在放开手脚充分利用民族意识、资金物资的援助、干

部中的民族构成、内地人才的引进等一系列棘手问题上就有了更大的选择余地，可以少花钱，多办事，促进社会安定和发展、改革。

事实与分析表明，担心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会延缓社会进步、破坏民族团结，影响祖国统一，是无根据的。把民族地区的发展和现代化理解为内地化和汉化，恰恰会延缓社会进步、破坏民族团结、影响祖国统一。

宗教构成一些少数民族人民基本社会生活中相当重要的一部分。宗教又与一些少数民族文化密不可分，其中包括哲学、历史、语言、文学、艺术、建筑、医药、天文、历算等民族文化的精华。因此，对一些少数民族来说，不可能一方面消灭宗教，一方面宏扬该民族文化，维持该民族人民正常的社会生活。

在今天的这些少数民族地区，宗教已不再是旧制度的支柱，而成为可利用的对象。实行包产到户时，就有不少喇嘛、阿訇劝农民落实党的农村政策的实例。宗教可分为理性的研究和形式化的盲目信仰。宗教的积极作用多出于前者，如发展民族文化、满足群众需求等；而其消极作用多出于后者，如迷信、浪费、宿命论之类的消极思想等。经验证明，

越压制宗教，其盲目崇拜的迷信成分就越大。反之，尊重少数民族文化传统，承认宗教，利用宗教中积极的一面，却能促进民族团结、社会安定和社会发展。在这个基础上，通过宗教改革，来逐步减少、消除其消极因素，并非没有可能。我们曾专门就这个问题在西藏宗教、文化界进行了较多的调查。可以肯定地说，宗教改革在西藏已有一定的社会需求和社会基础，且为一部分上层宗教人士所赞成。但宗教改革不可能在宗教受到压制的情况下自发产生。越压它，它越要团结一致，固守成规，唯恐失传祖宗之法。相反，放开手脚，信仰自由，它就有可能在商品经济的发展、社会需求的增加、以及各教派争论的发展中实现。在西藏佛教史上，曾有过宗教改革，也有过在外族的协助下发展教派和进行一些变革的先例。商品经济的力量是强大的，在樟木、亚东等经商成风的边境口岸，传统宗教的消极影响已经微乎其微。我们相信，在上述前提之下，有可能与少数民族同胞一道，在完成经济振兴的同时，完成又一个历史性的宗教改革和文化复兴。

7-5 两小儿辩日

孔子东游，见两小儿辩斗，问其故。

一儿曰："我以日始出时去人近，而日中时远也。"一儿以日初出远，而日中时近也。

一儿曰："日初出大如车盖，及日中，则如盘盂，此不为远者小而近者大乎？"

一儿曰："日初出日沧沧凉凉，及其日中，如探汤，此不为近者热而远者凉乎？"

孔子不能决也。两小儿笑曰："孰为汝多知乎？"

《列子·汤问》

走向未来丛书

人的发现
增长的极限
激动人心的年代
GEB——一条永恒的金带
现代物理学与东方神秘主义
现实与选择
经济控制论
探险与世界
看不见的手
语言学和现代科学
在历史表象的背后
让科学的光芒照亮自己

人的现代化
大变动时代的建设者
没有极限的增长
西方社会结构的演变
在国际舞台上
昨天　今天　明天
摇篮与墓地
择优分配原理
第三次数学危机
凯恩斯革命
艺术魅力的探寻
西方文官系统
动态经济系统的调节与演化
新的综合

走向未来丛书

富饶的贫困
定量社会学
儒家文化的困境
系统思想
日本为什么“成功”
悲壮的衰落
弗洛伊德著作选
西方的丑学
十七世纪英国的科学、技术与社会
亚布上的创造
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信息革命的技术源流
增长、短缺与效率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正文
封底